





# 列寧選集

17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列寧選集

# 17



---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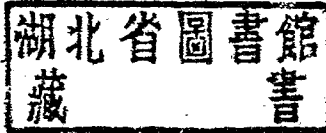
A21/  
-7484

000107

A21/7484

## 目 錄

校者序言



### 第三篇 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二—二三年)

論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與國內形勢 (在五金工人聯合會全俄 代表大會共產黨團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	2
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 (給莫洛托夫的兩則短柬).....	22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上的政治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27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89
給職工會第五次全俄代表大會的信.....	92
在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	94
我們應如何改組工農檢查院 (向第十二次黨的代表大會提 出的一個建議).....	106
寧少勿濫.....	114
論合作社.....	134



## 第四篇 論社會主義勞動

怎樣組織競賽？	146
偉大的開端（後方勞動者所表現的英勇氣概——論『共產主義 禮拜六』）	159
從破壞數百年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192

## 第五篇 關於改善國家機關與 反對官僚主義和官僚 習氣底鬭爭（劉記與信件）

蘇維埃機關行政條例草案	200
給各人民委員部參事會一切委員及人民委員長	205
關於職工會中的官僚主義問題給 M·P·湯姆 斯基的信	206
關於草擬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條例給斯大林的信	208
關於用司法手段與官僚習氣作鬭爭的問題給司法人 民委員長庫爾斯基的信	211
關於人民委員會及勞動國防會議工作底新佈置給茨 魯巴的信	213

## 第六篇 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 革命諸問題

論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蘇俄共產主 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21
---	----

論無產階級的文化 .....	241
決議案草案 .....	241
日記的一頁 .....	244
中央委員會給教育人民委員部內共產黨工作人員的 指示 .....	251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在莫斯科全城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	254
國際勞動婦女節 .....	262
論我們報紙底性質 .....	265

## 校者序言

本卷所收集的，即俄文版六卷本『列寧選集』第五卷第一部份『新經濟政策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總題目下之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諸篇（第一、第二兩篇爲『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見中文版第十六卷）。爲保持總題目底完整性起見，本卷各篇底次序，仍照俄文版排列。列寧底這些著作，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歷史上，都有着極大的歷史的意義。

第三篇『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一項下所收集的一些文獻，主要是討論關於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一九二一年）執行總結和社會主義勝利前途的問題。在『論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式』及『俄共中央委員會向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底政治報告』兩文裏面，列寧將新經濟政策第一年執行的情形，作了個總結，認爲『退却已經終結，問題是在於重新團結力量』，『問題是在於人，是在於選拔人材』，『檢查執行情形』；同時，在講到新經濟政策底以後的任務時，列寧則提出了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前途的問題，並對此問題給了個明確的答案。跟他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有勝利可能的一般觀點相吻合，他指出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之在俄國無產階級國家手中，便十二分地足以保證轉向共產主義』。今

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偉大成就，便充分地證實了列寧的這一立場之正確和否認一國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反革命的託洛茨基主義之破產。

在『給職工會全俄第五屆大會的信』一文裏面，列寧特別強調了重工業底作用，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底基礎，並提出了鞏固這一基礎之任務——實行極端節約和儲蓄，以期逐漸恢復業已破壞的鐵道、機器、建築物等等之任務。在『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的演說』一文裏面，列寧更指出了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巨大成就。他說：『我們已經轉向經濟建設底日常問題之核心本身了』，『在蘇聯，社會主義在現在已不是遼遠的未來底問題了，——我們已經把社會主義拖到日常生活裏面去了。』於是開始採取攻勢了。列寧將最近數年的任務規定如下：『不是在明天一天之內，而是在數年之內，不論如何，我們大家將在一起完成這一任務，要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

其次，『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寧少勿濫』兩文，主要地是講改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認為國家機關乃是工人階級在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事業上，在轉向社會主義事業上的重要武器。這兩篇文章和列寧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鬭爭的幾篇短柬和幾封信，同是列寧關於國家和國家機關學說底重要文件。

最後，『論合作社』一文，其主要旨趣是認為小農經營，基於工業底增長，經過合作社及其最高形式——集體

農場，可以走向社會主義。關於這個問題，聯共（布）曾經跟託洛茨基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半託洛茨基主義的『左傾主義』及各種各樣的調和派，作了無情的鬭爭，而獲得了決定的勝利。今日蘇聯農業集體化底偉大勝利，便光輝地證實了列寧指示之正確與上述各派之反革命的觀點之破產。

『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一文，是講防止異己份子入黨和保持黨的紀律的辦法。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列寧曾經一再強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資本主義增長底條件之下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份子對無產階級底影響之巨大危險性。在這一關係上，託洛茨基主義和半託洛茨基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偏向、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對『左傾』和右傾的調和主義，都是當時聯共（布）黨內的巨大危險。在這一時期，列寧特為這個問題曾經寫了許多論文和信件，在這些文件裏面，他一再指出，黨底統一、布爾塞維克的鐵的紀律、無情的反對小組組織的鬭爭等乃是黨領導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克服困難而走向社會主義的絕對必要的條件。『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一文，便是列寧底這些論著之一。在讀此文時，並可參閱第十六卷『論清黨』一文。

第四篇『論社會主義勞動』一項下所收集的三文，係論述社會主義競賽和『共產主義禮拜六』底意義。這三篇文章，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也都有巨大的意義。在執行第一、第二、第三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千百萬民

衆進行社會主義競賽和斯大哈諾夫運動之巨大浪潮，便是列寧指示深刻和正確底最好的證據。

第五篇『論國家機關之改善與反對官僚主義之鬭爭』一項下所收集的一些短柬和信件，大半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各個時期所寫的。這些短柬和信件，跟列寧底『怎樣組織工農檢查院』、『寧少勿濫』、『論合作社』論文，都是當時最火急的文件。在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底各種任務，只有在國家機關澈底改造之下，只有在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官僚習氣完全根絕之下，才能完成的。

第六篇『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革命諸問題』一項下所收集的主要是關於文化問題的幾篇文章。列寧底這幾篇文章，跟他提出文化問題的其他言論，尤其跟他在政治教育部第二次代表大會和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及『論合作社』一文，有着直接的聯繫。列寧從未狹義地單從文化上提出文化與文化革命問題。他總是跟『消化政治經驗』、跟經濟建設底各種任務、跟生活習慣底改造、跟吸引羣衆——尤其落後羣衆來參加管理工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參加爭取社會主義的鬭爭等直接聯繫起來，考察各種文化問題的。此外，列寧『論蘇維埃共和國內婦女運動底任務』和『國際婦女節』兩文、以及他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有名的『論我們報紙的性質』一文，也都收集在這一篇裏面了。列寧底這些文獻，也都值得我們予以特別的注意。在這些文獻裏面，我們可以找出列寧對這些特殊問題的原則上的指示。

以前各卷，都有『註釋』。這些『註釋』，都是從俄文版譯來的。但是，根據英文版第九卷底聲明，俄文版底『註釋』，正在『澈底修改』；想來，其中一定有不妥之處；而俄文版新版，迄今又未看到，如要等候，勢必延誤其餘各卷底出版，反使列寧底原文受到阻礙，不能達至讀者。因之，爲了迅速出版起見，像英文版第九、十、十一、十二諸卷一樣，中文版最後數卷——即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卷，也暫時省去『註釋』，本卷亦然，尙請讀者原諒！

校者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

第三篇  
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





## 論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與國內形勢

——在五金工人聯合會全俄代表大會共產黨團會議  
上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

同志們！請容許我稍微打亂一下你們素常的進行程序，在今天不來講列在你們會議以及你們大會底議事程序上的那些問題，以便來談談我自己關於政策底主要任務問題的結論和意見。我們向那些不是某一國家機關底正式代表，而事實上却擔負很大一部份的國家工作的人們作報告，已不止一次了。同時，你們也都知道，在大多數的我們國家機關當中，那種真正的事務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底某種代表——自然，在工人階級底前列之一的五金工人，也包括在內的——來辦理的。

所以，我在想，在這種場合之下，打亂一下你們素常的進行程序，不講關於職工會與黨的問題，而講一講政治問題，講一講關於我們的國際與國內形勢的問題，這並不是不方便的。因為，我確信，在我們的國際形勢上，以及在我們的國內形勢上，有一種類似政治上某種轉變的事

情，要求每個黨員方面以及（當然地）每個覺悟的工人方面，予以特別的注意，以便他可以充分地理解這種政治上的轉變，正確地領略這一轉變，並將它實施於自己的工作——蘇維埃的、黨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各種的工作中去。

同志們，自然，你們都知道，熱那亞會議還繼續立於我們的國際政治問題底首位。我並不是這樣堅決地相信，熱那亞繼續立於國際問題底首位是正當的事情，因為當我們說到『熱那亞』的時候，我們是指衆所知曉的將要在意大利熱那亞地方舉行的會議而言；這個會議差不多是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的，但是可惜的，它現在竟陷於不確定的狀態中，誰也不知道（恐怕即令是這個會議底發起人與組織人也不知道吧）這個會議是否有舉行的把握。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向我們自己以及一切對於工農共和國命運稍微關心的人們說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即對於熱那亞會議問題的立場，自最初起就是十分堅定的，而且一直是這樣堅定的。如果某些人不僅缺乏堅定性，而且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決心，缺乏執行其願望的最基本的能力，那麼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自最初起，我們就已經聲明：我們歡迎熱那亞會議的舉行，並願出席這個會議；我們非常了解，而且我們也不絲毫隱蔽，我們是作為商人而到熱那亞去的——因為與資本主義國家通商（直到它們已經完全崩潰時為止），對我們乃是絕對必要的事情，我們到熱那亞去，為的能最正確與最有利地討論這種通商貿易在政治上

適合的條件，此外並無其他。這一點，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也並不是一件祕密，這些國家底政府曾起草了熱那亞會議的最初計劃，並進行籌備。這些國家知道得很清楚：將我們與各個資本主義國家聯繫起來的通商條約的名單，一天比一天長起來了；我們所締訂的實際的商業協定的數目一天天在增長着；很詳細地加以討論的俄國與外國合辦的商業企業（外國各國與我國各個產業部門用各式各樣的合辦方式所辦者）底數目，現在已經是非常巨大的了。因此，在熱那亞會議上主要地將要討論到的問題之實際基礎，資本主義各國早已知道的非常清楚了。如果在這種基礎之上，再點綴一點各種政治談話、預測、計劃等上層建築的話，那麼我們必須理解，這只是一種上層建築而已，這種上層建築多半是由關心於這的人們用人工方法所建立、虛構及實現的。

不用說，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四年多的期間當中，我們已經充分地獲得了實際經驗（即在我們在理論上也充分地知道這一點），使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國家底代表老爺們，他們依照資產階級底舊式外交術底一切規則所玩出的那套外交把戲，會適當地加以估價。我們十分明白，在這套把戲底幕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知道，這種把戲底本質則為通商。資產階級國家是需要與俄羅斯通商的；它們知道，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經濟的相互關係，那麼它們底崩潰將要比迄今它們已經臨到的那種速度更加大踏步地前進；不管它們有一切偉大的勝利，不管它們在全世界的報

紙和電報上，充滿着無邊的誇張，然而它們的經濟却日益在瓦解着，自它們偉大的勝利以來已經四年了，它們連一個最簡單的任務——並非建設新的，而只是恢復舊的——也不能應付，還依然在如何集合三個、四個、乃至五個（熊罷，這個數目是非常之大的，很難有訂立協定的可能）形成一個聯合，以便能夠通商這個問題的周圍繞圈子。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商，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事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最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情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這裏面須要使腦筋更加靈活些，須要拋棄一切共產主義的，或者更確切些說，須要拋棄俄羅斯的奧布羅莫夫主義及其他好些東西。然而，資產階級國家底代表們，他們從事經營商業已達數百年之久，他們的全部社會生活都是建築在商業之上，現在他們又不得不重新來學習經商，這聽來實在是很奇怪的。可是這一點對我們却並不如此可怪：我們早已說過，而且也知道，他們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估計，遠不如我們的正確。他們只是從他們眼前的最近的事情的觀點來估計帝國主義戰爭；可是到他們獲得巨大勝利後的三年，他們却找不到一條打破局勢底出路了。我們共產黨人曾說，我們對於戰爭的估計要更加深刻和正確些，我們曾說，戰爭底矛盾及其災難底影響，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所預料者廣大得多。我們旁觀資產階級的戰勝國，曾經說：它們將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我們的預言、以及我們對於戰爭及其結果的估計。它們曾迷失於或者還不

到四棵松樹中，這種情況並不使我們驚奇。但同時，我們却說：當資本主義國家，如其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一日，我們是需要和它們通商的。我們是將以商人的資格和它們進行談判，我們是能夠這樣做的，這種事實，由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間所締結的通商條約之日益增加的數目可以證明，由商業行為底數目，可以證明了。在這些條約還沒有簽字以前，我們還不能夠公佈它們。當一個資本家商人來到我們這裏，並且說：『在談話還沒有完結之前，這個事件務須保持祕密，勿令第三者知道』時，自然，從商業上的觀點說來，我們是不能拒絕這一點的。可是，我們知道，正在準備中的協定，究竟有多少，單單這些協定的名單，就充滿好幾頁，其中還有與信用卓著的財政集團具體討論過的數十件實際的建議。自然，正聚集在熱那亞的資產階級國家底代表老爺們，知道這一點不亞於我們：不管其他事情底情形怎麼樣，這些國家底政府與其資本主義公司間底聯繫，自然，還是保持着的。甚至它們的鬆弛程度還沒有達到它們知道這一點那麼巨大。

所以，要是我們在外國的電報中，碰到經常的消息，說他們似乎還不確切知道在熱那亞將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們似乎正在發明出某種新的東西，他們似乎將向俄國提出新條件使世界為之震驚等等，那麼就容許我向他們說（我希望我能成功親自在熱那亞向勞合·喬治述說這一點）：先生們，你們拿這一套是嚇不倒任何人的。你們都是商人，很會做生意的，我們還只是在學習經商，而且經

營的很糟糕。然而我們却有着千百件的商約及商約草案，從這些商約和草案中可以看出，我們是在如何經商，我們正在或將締結怎樣的商約，並在什麼條件之下來締結。如果我們在報紙上讀到種種期望嚇倒某人的消息，說將以某種考驗加諸於我們，那麼我們對於這一點是泰然自若地置之一笑的。我們已經把威脅看得够了，而且這種威脅要比商人底威脅嚴重的多，這種商人提出他們的最低的價格，即欲將門砰然關閉。我們已經看到過差不多掌握全世界的協約國方面底大砲威脅。然而我們並沒有爲這些威脅所嚇倒。歐洲外交家老爺們，也許沒有忘記這一點吧。我們並不兢兢於維持自己的外交上的威信，兢兢於保持自己的面子，如像這對資產階級的國家那麼極端重要者。甚至將來我們也不正式地談到這些。然而我們却不忘記這一點。我們任何一個工人，我們任何一個農民，都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也永不會忘記：他是爲了保持工農政權，反對那些幫助武裝干涉我國的一切列強底聯盟而戰的。我們眼前有着這些國家在數年間與高爾察克及鄧尼金所締結的整批條約。這些條約都已經公佈了，我們知道它們，全世界也知道它們。爲什麼從事捉迷藏，把事情弄成這樣，彷彿我們一概都變成了失却記憶者？這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每一個農民和每一個工人都知道，他是在跟這些列強作戰的，都知道這些列強是不能夠戰勝他的。要是資產階級國家底代表老爺們，你們高興以此自娛，不辭浪費你們的紙張（你們的紙張太多了，超過於你們所需要的了）和你們的

墨水，並濫用你們電報及廣播無線電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正對俄羅斯加以考驗』，那麼我們倒要看一看，究竟誰會戰勝誰呢。我們已經一再被人不是用言語，也不是用貿易，更不是用金錢，而是用戰爭來考驗過了。在付了重大的、流血的、痛苦的創傷底代價之後，『一個挨過打的人，抵得上兩個沒有挨過打的』，這句話，我們是堪當承受的，而且這句話不應由我們自己，而應該由敵人來說出的。

在軍事方面，這一點我們是受之而無愧的。但在通商方面，可惜我們共產黨人挨的打還太少；不過我希望在最近將來，這個缺點也會同樣順利地加以補救的。

我說過，我希望親自在熱那亞和勞合·喬洽商談這些問題，並告訴他用不着拿這樣無謂的事情來恐嚇我們，因為這，因此而喪失威信的只有那些實行恐嚇者。我希望我的病不要妨礙了這事，我的病，已經有幾個月不許我有直接參與政治事務之可能，而且它又完全不允許我去執行我所擔負的蘇維埃職務。我有理由期望，在幾個星期之後，我能返任，去幹自己的直接的工作。然而在幾個星期之後，他們之中的三四個人，關於他們向全世界所宣佈的，關於他們已經商議好的，能不能再得到協定，——我對於這一點還不能確信的。我甚至敢斷言，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會相信這一點的，不僅這樣，甚至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一點，因為當操縱全世界的戰勝國列強，在它們已經聚會很多次——它們會議底次數是多到無數的，甚至歐洲資產階級的報紙也在嘲笑這一點——之後又集於坎尼斯(Cannes)

的時候，他們也不能夠說出他們究竟應當怎樣，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

因此，若不從外交上的跳背戲底觀點，而從實踐任務底觀點來看，託洛茨基同志曾經最正確地規定了形勢。在接到如下消息——即熱那亞會議業已完全準備妥貼，業已完全商量就緒，只是資產階級政府中某一政府底動搖（它們好像都變得不可解地動搖似的），才不得不將會議暫時延期——的次日，他就發出了以下的命令：『每一紅軍士兵，必須要澈底地了解這種國際情勢；我們確實知道，他們中間有一種固定集團，它希望試一下武裝干涉；我們必須提高自己的警覺性，加以密切的注意，每一個紅軍士兵都必須了解什麼是外交把戲，什麼是武器底力量，這種武器底力量一直到現在，曾經決定了一切階級的衝突。』

讓每一個紅軍士兵都知道什麼是這套把戲，什麼是武器底力量，那時我們再瞧吧。不論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中，資本主義已經崩潰了，然而許多不無勢力的政派集團，還是可以企圖來玩弄這一套把戲的。如果各國政府極不堅定，不能準時召集會議，那麼誰知道這些政府將會落在什麼人的手中呢？我們知道，在這些國家當中，有着有勢力的政黨、有勢力的個人以及經濟巨頭，他們都是期望戰爭的，我們深深地知道這一點，經濟條約底真正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我們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們已經忍受了很多嚴重的困難，我們知道新的戰爭企圖，會給我們招致何等的不幸和痛苦；然而我們說，我們準備還要忍受這一



次，就來試一試吧！託洛茨基同志發出他的堅定的命令，而以代替外交上跳背戲底見地，他所得出的結論，就在於向每一個紅軍士兵重新說明國際的情勢，說明熱那亞會議因意大利內閣底不穩而延期，那就是戰爭底危險。我們要做到，使每個紅軍士兵都要了解這一點。要做到這一步，在我們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在俄羅斯不僅從報紙、傳單以及命令上，而且從他自己的鄉村裏不知道這的那種家庭，那種紅軍兵士，是很少找到的，在他自己的鄉村裏，每個紅軍兵士都曾經目擊了殘廢者，都曾經目擊了支持這次戰爭的家庭；同時，在自己的鄉村裏，每個紅軍兵士，都看到了歉收，都看見了可怕的飢饉與破產，都看見了極度的貧乏，他們都知道促成這一切一切的是由於什麼，雖然他們並沒有談到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巴黎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將所有這一切，一概都諉之於布爾塞維克之不良的品質。現在可以說，他們的情緒，再沒有比反抗（這是從輕的說法）那些將高爾察克及鄧尼金的戰爭強加於我們並支持該戰爭以反對我們的人們的情緒來得強烈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需要再成立新的鼓動宣傳委員會了。關於熱那亞會議的問題，須要將事情底本質與資產階級所廣為傳佈的新聞紙上的虛妄報導，嚴格地區別開來，他們以為這個會議是一種可怕的炸彈，然而他們却嚇不倒我們，因為我們把這種炸彈已經看見的很多了，有時它們甚至不值得我們報之一笑。凡將我們視作戰敗者，而加強以某些條件的企圖，那是一件頂愚蠢的事情，不值得予以

答覆的。我們向列強說：『作為商人的我們，是懂得友誼關係的，我們知道你們對我們負有何種義務，並知道我們對你們負有何種義務，而且我們知道你們合法的以及甚至增大的利潤，究竟是多少。我們已經接到好多建議了，不論三四個戰勝國的列強怎樣從中阻撓，顯露其頭角，然而我們的商約數目却在增長着，而且將繼續增長下去的，這次會議的延期，你們將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這樣，你們給你們自己的人們證明你們自己不知道你們需要什麼，證明你們，你們患着所謂意志病。這種病症就在於你們不懂得經濟與政治，我們對這種經濟與政治的估計要比你們深刻些。』自我們作過這種估計以來，轉瞬間已經十年了，可是此後的破壞與無秩序，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直到現在還依然不明白。

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們已經造成的形勢，我們可以十分堅定地說：我們曾經所開始的退却我們現在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着呢。够了！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並不掩蓋這個事實，即：新經濟政策乃是一種退却；我們所做的要比我們能夠容忍的過分些，不過鬭爭底邏輯原來就是如此。要是誰還能記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月）間的事，或者要是誰在當時在政治上尚未度過而後來聞知了一九一七年的形勢，那麼他一定知道當時在爾澤維克曾經向資產階級作過多少妥協的建議。他們說：『先生們，你們的事情是在瓦解着，我們將要掌握政權，並且要把它保持下去。你們是否意欲考究一下，如

說的，你們怎麼不演出醜劇而能調整事情呢？』我們知道，不僅有過醜劇，而且還有叛亂底企圖，這種叛亂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煽動和支持的。他們從前曾說：

『我們此刻正要將政權交給蘇維埃。』日前我在一本巴黎的雜誌上（在那上面有着很多關於這類事情的材料）曾讀到克倫斯基反對車爾諾夫的一篇文章，克倫斯基寫道：

『難道我們曾經把持了政權嗎？在民主會議底時期，我就聲明過，要是有人願出來，成立清一色的政府，那麼政權就可以毫無震動地移交給這個新政府了。』

我們並未拒絕單獨地取得政權。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間，我們就已經說過這樣的話了。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月）間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們曾經實現了這一點。那次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曾獲得了布爾塞維克的大多數。當時，克倫斯基乃訴諸地主，慌忙奔向克拉斯諾夫，想要集合軍隊進軍彼得格勒。我們曾經稍稍地把他們攪擾了一下，現在，他們却無禮地說：『你們這般無禮的人，僭奪者，劊子手！』我們回答說：『埋怨你們自己去吧，朋友們！不要在想，以為俄國的農民和工人已經忘記了你們的行動了。你們於十一月（十月）間以極絕望的形式向我們挑戰尋釁，爲了報答起見，我們當時曾進行恐怖和三倍的恐怖；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還要施用恐怖的，如果你們再試幹一下的話。』這種辦法是完全必要的，任何工人和任何農民對這一點都沒有絲毫懷疑的；除掉那些驚惶失措的知識份子以外，沒有一個人對這一點有所懷疑的。

在空前的經濟困難底情況之下，我們被迫不得不跟超出我們力量百倍的敵人作戰；用不着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非常的共產主義的辦法方面，所作的，不得不超出所需要的範圍以外；我們這樣作，是迫不得已的。我們的敵人以為，他們可以置我們於死地，他們以為他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可以迫使我們屈膝的。他們說道：『我們不作任何的讓步』。我們回答說：『如果你們以為我們不敢採用極端的共產主義的辦法，那就錯了。』我們曾經敢於這樣作，而且我們這樣作了，並且我們勝利了。現在我們說，我們再不須保持這一陣地了，我們正在退却着，因為我們所獲得的，已足够使我們保持必要的陣地了。以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為首的一切白衛軍，都歡躍起來，說：『啊哈！你們在退却了！』我們說：『讓你們高興吧，你們不過是以此自慰罷了。』如果我們的敵人自足自滿，而不去從事於具體的工作，這對我們是有利的。你們歡躍欣喜吧，你們以幻想自慰，可使我們處於更有利的境地。我們已經獲得了龐大的陣地了，如果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止，我們沒有爭得這些陣地的話，那是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都沒有退却的空間的原故。我們是在和農民聯盟之中保持了政權，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在戰爭以前向你們所提出的條件，那麼在戰爭以後你們將要得到更壞的條件了。這些在一九一七——二一年的外交、經濟與政治史上都確切地記錄下來了，因之，這並不是自吹自擂。這只是事實的陳述，只是

提醒你們一下罷了。如果資本家老爺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月）間接受了我們的建議，那他們所有的也許比現在要多五倍的。你們打了三年仗了。所得的結果如何呢？你們還想打仗嗎？我們深深地知道，你們當中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打仗的。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由於絕望的飢饉，由於目前工業底狀態，我們不能保持我們在一九一七——二一年所爭得的一切陣地。好多陣地我們曾經放棄了，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這一退却，就我們向資本家所作的讓步一點而言，已經終止了。我們曾經權衡了自己的力量和資本家底力量。就跟俄國及外國的資本家締結協定一點而言，我們曾作了好多模範的偵察運動，我們說——而且我希望並相信黨的代表大會也會正式地以俄羅斯領導政黨的名義同樣說：『我們現在可以停止我們經濟上的退却了』。足够了！我們再不往後倒退了，將着手於適當地展開和配合我們的力量。我說我們正在停止我們經濟的退却，並不是說我會忘記掉我們所處的那極端的困難情形，要拿這來鎮定或安慰你們的。關於退却限度以及我們是否是在停止這種退却的問題，這並不是關於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什麼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什麼困難，我們知道，在像俄羅斯這樣一個農民的國家當中，飢饉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知道，我們還不能夠應付由飢饉所引起的災難。我們知道，在一個被迫不得不從事通商，和被迫不得不發行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多量紙幣的國家當中，財政恐慌是什麼意思。我們知道這些困難，我們知道這些

困難是很大的。我並不害怕說，這些困難是無窮盡的。但是這絲毫嚇不倒我們。相反的，我們倒從下面我們公開地向工人和農民所說的幾句話中吸取了自己的力量：『這些就是面對着你們的困難；這就是從西歐列強方面襲來的威脅着我們的危險。要好好地工作，用心地注意我們的任務吧。』即使我們正在停止我們的退却，但是這也不是說，我們是不知道這些危險的。我們是正視這種危險的。我們說：『主要的危險就在這裏，由飢饉所招致的災難，須要把它醫治好。我們還沒有醫治好這些災難。我們還沒有克服財政恐慌。』因此可說，我們不應把停止退却一類的話理解為：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奠立了(新經濟政策底)基礎了，我們可以從容地向前邁進了。不，基礎還沒有樹立起來。我們還不能泰然地望着將來。我們被戰爭的危險所包圍着——關於這種危險我已說過多次了——我們還被更大的內部的危險所包圍着，在國內還有着經濟的危險，這種危險就在於農民底可怕的破產，就在於飢饉，就在於財政的紊亂。這些危險都是非常巨大的。我們還要作巨大的努力才行。可是如果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我們還是能夠作戰的。但是進行戰爭對他們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一九一八年，他們很容易地挑起戰爭，並且在一九一九年他們將這個戰爭繼續下去也同樣是容易的。然而到了一九二二年為止，水、血，已經流了好多了，局面完全不同了。西歐的工人與農民，已經完全不像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那個樣子了。愚弄他們，告訴他們：我們是在和德國人作戰，而布爾

塞維克則不外是德國的走狗而已。——這樣說已經不可能了。我們並不會因我們的經濟地位而陷於驚惶失措之中。目前，我們與俄國及外國資本家所締結的協定已經有幾十起了。我們知道，在過去以及在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些什麼困難。我們知道，俄國的資本家爲什麼會同意締結這些協定。我們知道，這些協定是在什麼條件之下締結的。這些資本家底大多數是當作實利的人，當作商人締結這些協定的。而我們也是當作商人來訂這些協定的。凡商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會考慮到政治的。如果他不是完全野蠻的國家底商人，那麼他就不會與不穩定和不大可靠的政府有商業上的往來的。這樣作的商人，已不是商人，而是傻子了。不過在商人中間絕大多數並不是傻子，因爲商業鬭爭底全部邏輯，已將那些傻子從商業戰場上驅逐出去了。如果從前我們的估計是：『鄧尼金打了你，現在須要證明你是能够擊敗鄧尼金的』，那麼在今天，我們的估計却是：『商人打了你，現在須證明，你能够迫使他和你從事交易的』。我們已經證明這一點了。我們已經和俄國的以及西歐的極大的資本公司締結了許多協定了。我們知道，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他們也知道，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工作底任務，稍稍變化了。因此，我想關於這一點再略略說幾句，以補充我的已經略嫌過長的報告。

由於熱那亞表現動搖的這種形勢（人們以爲這種動搖是不能預見其止境的），並當我們在對國內政策上作了這

樣多的讓步的時候，我們應說：『够了！不要再作任何的讓步了！』如果資本家老爺們以為遷延的愈久，則他們所得到的讓步愈多，那麼我再重複一句，我們就要告訴他們：『够了！到明天你們連什麼東西也得不到了！』如果蘇維埃政權及其勝利底歷史，還沒有教他們學到什麼東西，那麼就隨尊便吧。我們這一方面已經作了我們所能作的一切，並向全世界將這一點宣佈過了。我希望，大會也能批准，我們將不再行退却了。退却已經告終了，因此之故，我們的工作也跟着改變了。

須要指出的，就是在討論這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迄今還可以看出，頗多的神經質，甚至幾乎是病態；起草了各式各樣的計劃，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決議。關於這一點，我想引舉下面的一件事情。昨天，我偶然地在『消息報』上讀了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詩。我並不是他的詩才底崇拜者，雖然我完全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是個門外漢。不過從政治的以及行政的觀點看來，我好久沒有感受到這樣的滿意了。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詩裏面，譏笑開會，對那些不斷坐着開會的共產黨員大加嘲弄。關於詩的方面，我不大知道；然而關於政治，我敢保證它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我們確確實實是處在無窮無盡地開會、設立委員會、起草計劃的狀態中（必須指出，這種情形是極其愚笨的）。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俄國生活型——奧布洛莫夫。他總是躺在床上，心裏草擬計劃。從那時以來已經經過好久的時間了，俄羅斯已經起了三次革命；但奧布洛莫夫們却



還保留下來，以迄於今，因為不僅地主中間有奧布洛莫夫，而且農民中間也有奧布洛莫夫，不僅農民中間，而且知識份子中間，不僅是知識份子中間，而且工人與共產黨員中間，也有奧布洛莫夫。只要看一看我們怎樣開會，怎樣在各個委員會裏工作，就可以說：老奧布洛莫夫還依然是有的，應當長久地清洗刷新、督促鞭策他，以期成爲一種有用之人。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不存任何幻想，來檢查我們所處的地位。我們不要摹倣那般以大寫字母來寫『革命』這個字眼的人，如像社會革命黨人所作的。但是我們可以重述馬克思底話：在革命期間，會作出不少的蠢事來，有時還要作的多些。我們革命家應當學會冷靜地和大膽地來看這些愚蠢的事情。我們在這次革命當中，已經作出了好多不可磨滅澈底勝利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這些，我們實用不着忸怩不安，或神經過敏。現在的形勢是這樣的，即我們憑藉所進行的偵察，對於我們已經作了的來作一檢查；這一檢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必須作爲我們繼續向前進步底出發點。現在我們既須要堅持反對資本家的鬭爭，那我們就須要堅決地走上我們的新道路。我們須要這樣地來建立我們的整個組織，即不要使沒有商業經驗的人，來領導我們的商業企業。我們往往使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員來領導一個機關，他被認爲是一個正直而謹慎的人，在爲共產主義而進行的鬭爭中是經過鍛鍊與考驗的，他是一個爲了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坐過監獄的人，因此之故，他被置在某一國家托拉斯中爲領導者，但是他不會做

生意。他具有共產黨員所應有的一切不可爭辯的品質，然而商人却可以欺騙他，而且欺騙得非常巧妙。因為將一個最可珍貴的優秀的共產黨員（他的忠誠，除瘋人以外，任何人都不會加以懷疑的）安置在這樣一種地位，這是無益的，這種位置，是應該派一個機敏的、認真作事的店員來擔任，此種人應付他的工作，比一個最忠實的共產黨員要好得多。我們的奧布洛莫夫主義，正表現在這裏。我們派了具有一切優良品質但對該項工作却完全不適宜的共產黨員去執行實際工作。在我們國家機關裏面，有多少共產黨員呢？我們有着巨量的材料，大部頭的著作，這些材料和著作也許使最嚴正的德意志學者為之欣喜；我們有着像山似的文件報告，這些文件報告如黨史委員會統統加以研究，就須得用五十年乘五十年的時間，但是，在實踐上，你在一個國家托拉斯中却得不到一點東西，你不知道什麼人對於什麼事情是應該負責的。我們的命令足夠多了，我們下一道命令，正像馬雅可夫斯基所描寫的那樣迅速，但是命令底實際的執行情形，從沒有加以檢查。我們的共產黨的負責工作人員底決議，是否執行了？我們會不會處理這種工作？不然，他們是不會的，所以，我們對國內政策底中心不得不加以改變了。我們的會議和委員會都是些什麼呢？它們往往只是一種遊戲。自我們開始清黨，並向我們自己說：『打倒混入黨內的升官發財份子和竊賊們！』以來，我們的事情有些改善了。我們趕出去的大約十萬人左右，這是非常好的，不過這還只是開始罷了。在黨底代表

大會上我們將要澈底討論這個問題的。我想，到那個時候，那些現在只知組織什麼委員會，而不去進行，也不會進行實際工作的成千成萬的人，將要遭受到同樣的命運的。在我們這樣清洗之後，我們的黨將從事於實際工作，並將這種實際工作理解作如同在軍事方面把它所理解的一樣。自然，這並不是幾個月，而且也不是一年的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顯出鐵石一般的堅定性。我們並不害怕說，我們工作底性質已經改變了。我們內部的最兇惡的敵人，那就是佔據負責的（後來便是不負責的）蘇維埃位置並作爲一個公正人而受到一般尊敬的共產黨員。『他雖可口，但不能進口』，他不學習和遲延主義進行鬭爭，他不會和它進行鬭爭，他掩護遲延主義。我們廓清這種敵人，並經過一切覺悟的工人和農民來找求這種敵人。所有非黨的工農羣衆，都應當追隨於共產黨先鋒隊之後，來反對這種敵人，反對這種柏斯托柯夫主義和奧布洛莫夫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應有任何的動搖的。

最後，我再做一個簡略總結，以結束我的演說。熱那亞的把戲，在熱那亞周圍所進行的跳背戲，是不會迫使我們有絲毫動搖的。我們現在已經不會中計，上他們的圈套了。我們要走到商人那裏去，同意於作生意，仍繼續我們的讓步政策；然而這些讓步底限度已經規定了。迄今，我們在協定中給予那般商人的，在我們的立法上就退後一步一點說來我們所作的，以後我們將不再作了。

因此之故，我們在對內政策，特別是在經濟政策上的

主要任務，也要來一種變化。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新的命令，不是新的機關，也不是新的鬭爭方式。我們所需要的，乃是檢查我們工作人員底適當性，檢查實際執行的程度。下一次的清黨，將要輪到那些自以為已是行政官的共產黨員了。所有那些只知成立這種委員會，只知開會，和進行談話，而一點都不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最好是派到宣傳、鼓動、以及其他有益的工作部門中去吧。大家都在草擬什麼特別而奇妙的東西，藉口新經濟政策，需要發明一種新的東西出來；把派給他們的工作，都擱起來了，交他們掌管的錢，並不設法節省分文，把一個戈比變為兩個戈比；而只知草擬億兆乃至兆兆蘇維埃計劃。現在我們正應進行鬭爭，以反對這些毛病。檢查人，檢查工作底實際執行情形——這一點，而且唯有這一點，乃是目前我們整個工作，我們整個政策底中心之所在。這並不是幾個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幾年的事情。我們應當正式地以黨的名義說明，在目前，工作底中心是在什麼地方，並且依此來改組我們的隊伍。如果我們這樣作的話，那時我們在這個新的領域中，一定像從前在布爾塞維克的，無產階級政權（有農民羣衆所擁護）所作的一切工作領域中一樣，我們也將成為勝利者。

## 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

——給莫洛托夫的兩則短柬——

### (一)

莫洛托夫同志：

請將我的以下的提議，提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我認爲，將新黨員的候補期限予以延長，是極端重要的。季諾維也夫對工人曾規定入黨的候補期爲六個月，對其他的人，則規定爲十二個月\*。我提議：僅對於那些實際上曾在大的產業企業中作工不下十年的工人，始得規定其候補期爲六個月。對於其他一切工人，須規定其候補期爲十八個月；對於農民及紅軍士兵，則規定爲兩年，對於其他的人則規定爲三年。特殊的例外，只有經過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底共同同意，始能加以允許。

我認爲將季諾維也夫所提議的那樣短的候補期限，不

---

\* 係指季諾維也夫在聯共（布）第十一次大會上所作『關於鞏固黨』的報告之提綱而言。

加以改變，那是很危險的。毫無疑義地，就大工業底意義說來，我們常常將那些沒有絲毫經驗的人們，作為工人來看待。那些偶然地在最短的期間轉化為工人的真正小資產階級份子，往往也算在工人一類。一切聰明的白衛軍，都很確定地抓住了這樣一種情形，即是：我們黨的所謂無產階級性質，在事實上絲毫也不能保證黨來反對和避免小所有者份子在很短時期內可能的優勢。由於我們中間流行着不精密及無系統的工作方法，短促的候補期，在事實上將表示對於候補黨員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真正考驗過的共產黨員一點，完全不加以任何鄭重的檢查。如果在黨內我們有三十萬到四十萬的黨員，那麼這個數目就嫌太多了，因為一切材料都指出了現時黨員訓練修養水平底不夠。所以，我竭力主張有延長候補期限的必要，並主張委託組織局起草一些並嚴格實施的規章，這些規章，要真正使候補期成爲一種極嚴重的考驗，而不是一種空洞的形式。

我想，這個問題，在代表大會上應當特別縝密地加以討論。

列寧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 (二)

莫洛托夫同志：

（在新黨員入黨條件問題提交代表大會討論以前，請將此信向中央委員會底一切委員宣讀一下。）

讀了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全會關於新黨員入黨候補期限

的決定之後，我希望在代表大會上對這個決定能加以辯論。可是，我恐怕我將不能出席代表大會講話，因此，請將我的以下的意見加以宣讀。

無疑地，我們的黨目前就自己成份底大多數講，是不够無產階級的。我想任何人對這一點都不能加以爭論的；只要簡單地參看一下統計表，就會證實此點的。自戰爭爆發以來，俄國的工廠工人，就成份講，比從前更少帶着無產階級的性質，因為在戰爭期間，凡願逃避軍役的人，一概都跑進工廠去了。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另一方面，就一般和中等水平說起來（如果我們就我們黨員中絕大多數的水平而言），那麼同樣無可置疑地，現在我們的黨，比起在獨立的階級政策迅速醒覺的這樣困難時際，尤其在農民佔絕大優勢之下為真正無產階級的領導所必需的那種程度來，在政治上還是很少訓練的。其次，還應當注意的，即在目前這個時期，加入政府黨的引誘力是非常之大的。只要回憶一下『目標轉換』派底一切出版物，就可以相信連絲毫無產階級的氣味都沒有的人們，現在竟為布爾塞維克底政治上的成功所吸引。如果熱那亞會議能給我們以新的政治上的成功，那麼小資產階級份子與極端敵視一切無產階級的份子，其對黨的壓力，將還要大大增長起來的。對於工人規定六個月的候補期限，絲毫也不能停止這種壓力，因為再沒有比人工地安排佈置這樣一個短的候補期限更容易的事情了；尤其是在我們的條件下面，對於很多知識份子以及半知識份子的參加到工人的隊伍中來，更

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事情。從上面所說到的一切，我得出一個結論來（在我的眼中，因白衛軍完全有意估計到我們黨底非無產階級成份之故，這一結論，更其增強了），就是說：我們應當大大地增加候補期限；假使我們對於工人入黨的候補期，規定為六個月的話，那麼為了不自欺欺人起見，我們就必須將『工人』這個名詞規定成這樣，即只有那在事實上根據他們的生活地位具有無產階級心理的人，才配稱工人這個名詞。如果沒有在工廠中作過多年的工——並無其他的目的，而只是由於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底一般條件——則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漠視現實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當承認：在目前，黨底無產階級政策，並不決定於它底黨員底成份，而決定於可以叫作黨的老衛士的那區區少數人所享的巨大的無限的威信。只要這區區少數人當中有點極輕微的內部鬭爭，那麼，這一威信即使不被摧毀，但不論如何也要大大減弱的，而黨決定政策的能力將不依賴於它了。

因此，必需：（一）增加一切候補期限；（二）特別詳細地規定：候補黨員應如何通過候補期，檢查候補期確實執行過而並非一種空洞形式的具體的和實際的條件，應該是些什麼；（三）在決定新黨員入黨事件的機關中，務須創造大多數有能力而合格的工作人員；（四）接收新黨員的決定，不僅須得省委的同意，且須經省監察委員會的同意——這一點須使之成爲一個規定的條件；（五）還應製定某種辦法，以便幫助黨清除那些完全不是自覺地執行



無產階級政策的黨員。我並不是提議來舉行一次新的總的清黨，因為我以為這在目前在實踐上是辦不到的事；但是我認為，尋求一些實際上清黨的手段，即減少黨員的數量，那是必要的。如果對於這件事情能稍加以思索的話，那麼，我確信有很多適當的辦法是能夠想出來的。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要求凡讀到這封信的中央委員，給我一個答覆，即使給人民委員會某某祕書打個短短的電話也可以。

列寧·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容許我將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不自年初開始，而自年底開始。在目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是熱那亞（Genoa）會議的問題。但是關於熱那亞會議問題，我們的報紙上已經說得很多很多，同時，我在三月六日的演說裏面（這篇演說，已經發表了）\*；也已經講過了，因此關於這個問題，要是你們不特別要我再作解釋時，那就允許我不再詳細說明了。

關於熱那亞的一般問題，你們都是很熟習的，因為報紙關於這個問題，已經化費了很多的篇幅——依我看來，甚至太多了，竟使我們的一般建設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工作之現實的、實踐的及迫切的需要，受到損失。自然，

---

\* 見本卷『論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勢』一文。

在歐洲，在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他們樂於把關於熱那亞問題的一切無價值的廢話，拿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充塞人們的頭腦。這一次（雖然不僅是這一次），我們竟效法了他們，而且效法得太多了。

我必須指出：中央委員會曾經採取了很慎密的辦法，從我們最優秀的外交家中來組織代表團（在目前，我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蘇維埃外交家了，不像在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初期那樣了）。中央委員會曾向我們出席熱那亞會議的外交家們，作成了十分精密的指示；這些指示，是經過長久時間製定的，我們曾經再三加以討論。用不着說，這裏的問題無論如何是一個競爭勝負的問題——我不說這是一個軍事的問題，因為軍事這個名詞，易於招致誤解的。在資產階級的營壘中間，有着一種傾向，想要把熱那亞會議解散；這一種傾向，較其他傾向要強大得多。還有着別種傾向，這些傾向希望熱那亞會議，無論如何，得以召集成功。在今天，後一種傾向是佔了上風的。最後，在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陣營中間，還有一種傾向，這一傾向可以名之謂和平主義的傾向，整個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應當算在這一傾向裏面。資產階級底這一陣營，企圖擁護一些和平主義的建議，並草擬有類似和平主義政策的一些東西。對於這種和平主義，我們共產主義者有着一定的見解，這種見解，在這裏是無須加以說明的。自然，我們到熱那亞去，不是以共產主義者的資格，而是以商人的資格去的。我們需要做生意，他們也需要做生意。我們希望，

我們的生意能對我們有利，他們則希望，他們的生意能對他們自己有利。不論這個鬭爭怎樣在展開着，但是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的外交家底手腕。

很明白的，雖然我們是以商人的資格到熱那亞去的，但是和我們談判的究竟是傾向於以戰爭來解決問題的那個資產階級營壘底代表者，還是傾向於和平主義（從共產主義的見地看來，它雖然是最惡劣和經不起輕微批判的）的那個資產階級營壘底代表者，這對於我們是不無關係的，要是誰不能辨識這種區別，把自己的策略適應於這種情形，以期達到實踐的目的，那麼，他就是一個壞的商人。

我們到熱那亞去，抱着實踐的目的——擴展通商貿易和創造貿易得以最廣泛最順利發展的條件。但是，我們却不能保證熱那亞會議成功。要保證這，那是可笑而妄誕的事情。然而我必須指出，對於目前熱那亞的可能性加以最冷靜最謹慎的估計，我想，毫不誇大地說，我們是可以達到我們的這個目的的。

如果我們在熱那亞的談判的對方，相當聰明而不太頑固的話，那麼就參與熱那亞會議好了；如果他們要立意堅持他們意見的話，那就不開熱那亞會議，亦未嘗不可。然而，我們總會達到目的的！

一切資本主義列強底最迫切、最緊急、最實踐的及近年來日益顯露出來的利益，都要求發展、調整與擴張對俄國的通商。即有這種利益，那麼就會爭議、會吵嘴、會分化而為各種結合的——這種分化，是非常可能的——可

是，到了最終的時候，這種基本的經濟上的需要，終會爲它自身開拓出一條道路來的。我想，關於這件事情，我們是可以安心的。我不能斷定在什麼日期，我不能保證取得勝利，但在該會議上，我們可以十分確定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世界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適當的通商關係之發展，不可免地要繼續下去的。在這裏某種阻礙是有可能的——在我的報告中，在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將說到這一點，但是，我想，關於熱那亞的問題，就以這些爲限吧。

不用說，那些願意更詳盡地研究這個問題和不滿意於報紙上所發表的代表團名單的同志們，可以選舉出一個委員會或小組，來仔細披閱中央委員會底一切材料，一切通訊和指示。自然，我們所草擬的那些細目，只是有條件的，因爲直到現在，還不大確切知道，究竟誰將坐在熱那亞的會議席上，究竟在會議上將提出什麼條件，——或是先決條件，或是保留，將都要加以解釋的。在這裏討論這一切的一切，那是非常不適當的，甚至我想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再重複說一遍，大會可以通過一個小組或委員會，來儘量搜集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切文件——不論已經發表了的或中央委員會所有的。

我不再多說了，因爲我確信：我們最大的困難，並不在這個問題上面。這並不是全黨所必須集中其主要注意力的問題。歐洲的資產階級報紙，狡猾地並有意地吹噓和誇大這個會議底重要性，用以欺騙廣大的勞苦羣衆（一切這些自由民主的國度及共和國中，資產階級報紙底十分之九

都是這樣作的)。我們也略略受了這種報紙底影響。正和一向的情形一樣，我們的報紙還屈服於舊的資產階級的習慣之下，不願採用新的、社會主義的方法，我們所喧嚷的東西，超過於這個問題分內所應得的東西。就事情底本質而言，在共產主義者看來，特別是在經過了如我們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經過的那樣嚴重年份的共產主義者而言，在目擊過像那時以來我們所看見的這樣嚴重的政治結合的共產主義者看來，熱那亞的問題，實在不是一種什麼大的了不起的困難。關於這一個問題，不僅在中央委員會中，並且在我黨的黨員中，我想不會有任何不同意或爭論的地方。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即使在他們中間具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看來，關於這個問題，實在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地方。我再重複說一遍：我們是以商人的資格到熱那亞去的，目的在於獲得發展貿易的最有利的形式；這種貿易已經開始了，正在進行着，而且，即令有人能強制地阻礙其發展於一時，但在這種阻礙之後，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繼續發展下去的。

所以，關於熱那亞的問題，僅以這些簡略的陳述為限。現在，我來講一些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在去年曾經是主要的政治問題，就是在來年也將是主要的政治問題。我認為（至少，我的習慣是這樣的），在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中，我們不僅僅應當講到過去一年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而且還應當講到這一年間所得的有什麼主要的、基本的、政治教訓，以便我們能夠正確地決定自己的來年的政

策，以便我們能够在來年學得一些經驗教訓。

當然，主要的問題，乃是新經濟政策。過去一年就是在新經濟政策目標之下過去的。如果在這一年當中，我們有什麼重大、緊要、而不可磨滅的成就的話，那麼，這只是在於我們從這個新經濟政策的一些原則上學會了一點東西。在過去的一年間，我們確實在新經濟政策領域以內學會了很多東西。我們是否真正學會了，以及究竟我們學會了多少，對這一點的檢查，大概將由此後發生的一些事變（很少依存於我們意志的這類事變，比如當前的財政危機，即其一例）來證明。我認為主要的是應當把以下的三點，作為一切議論、總結過去一年經驗，以及為來年獲得實踐教訓底基礎，這是我們談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所必須注意到的。

第一，首先對我們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乃是對我們是否與農民經濟真正建立聯繫一事之考驗。在我們革命發展底前一個時期，我們的一切注意力和我們的一切力量，主要地都傾注於擊退侵略底任務，或差不多為這一任務所吞沒，那時我們還無暇想到這種聯繫；我們還要思索別的事情。當抵抗被世界帝國主義巨大力量立即窒死的危險這一絕對緊急而迫在眉睫的任務擺在面前的時候，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只好而且也應當忽視此種聯繫的。

向新經濟政策底轉變，是在上次大會上非常一致地決定了的，甚至這種一致性，較之我們的黨內解決其他問題更來得顯著（應當承認，一般說來，我們的黨是以它的一

致著稱的)。這種一致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了，對社會主義經濟採取新的進路之必要，已經絕對成熟了。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紛歧並且從種種不同的見地來估計目前形勢的人們都一致地、很迅速地、毫不躊躇地同意於下邊這一點，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經濟，走向建設社會主義基礎的真正進路我們還是沒有的，而尋得這條進路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新經濟政策。由於軍事事件發展的原故，由於政治事件發展的原故，由於資本主義在舊的文明的西歐發展的原故，以及由於在殖民地內社會政治條件發展的原故，我們遂在這樣一個時期，即在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雖不是最落後但是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的時期，首先舊的資產階級的世界打破了一個虛隙。我們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經營小規模的個人農業的。在我們所規定的共產主義社會化的綱領中，我們能夠立即實施的幾點的建設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廣大農民羣衆所已作的範圍以外；我們曾經使這般廣大的農民羣衆坦負了很重的義務，理由是：戰爭在這一點上，不容許有任何的動搖。就整個說起來，這個理由是為農民所接受了，雖然我們曾犯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一般說來，農民羣衆都認識和理解到以下這一點，即：爲了保衛工農政權防止地主底侵犯，爲了不要被資本主義的侵略所窒死（這種侵略有奪去革命底一切收穫之威脅）起見，教農民坦負巨大的負擔，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在國有化、社會化了的工廠、工場和國營農場中建立起來的經濟與農村經濟之間，却沒有任何的聯繫。



在上一屆的黨代表大會上，我們就明顯地看到了這一點。我們把這一點看得是這樣地明顯的，就是黨內，關於新經濟政策不可避免的問題，沒有過任何的動搖。

在國外俄國人各種黨派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對我黨的這一決議加以評價，把這一類的評價看一下是很可笑的。在這種評價當中，僅有一個很空洞的差別，就是：生活在過去的他們，現在還在囉嗦，左派共產主義者直至現在還在反對新經濟政策。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又記起了在一九一八年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般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自己所已經忘記了的事情，他們依然再四追憶這些事情，相信：這般布爾塞維克都是一些狡詐而虛偽的傢伙，似乎他們把他們自己陣營內意見紛歧的情形，向歐洲隱蔽了。你讀這時，不禁會說：『讓他們去自欺欺人吧！』如果他們這樣地來設想我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話，那麼根據這些就可以判斷出這般逃到國外去的似乎最有教養的老頑固份子底覺悟程度了。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的陣營中間，並沒有過任何爭論，所以沒有是因為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有採取別的辦法底實踐上的必要，乃是每一個人都明白的。

與農民經濟的聯繫，與我們要努力創造的新經濟的聯繫，我們還是沒有的。這種聯繫，現在是否有呢？還是沒有的。我們只是正在接近於這種聯繫罷了。新經濟政策底全部意義（我們的報紙，並不在應找尋的地方來探求新經濟政策底意義，還往往繼續在任何一個地方去尋求它），

就在這裏，即發見我們正以最大努力在創造着的那種新經濟底聯繫。我們的功績，也就在於此；沒有這一點，我們就不成其為共產主義革命者了。

我們正以全新的方法來着手建立新的經濟，任何舊的方法，都是拋棄不顧的。如果我們不曾着手建立這種新經濟的話，那麼，在最初的幾個月，在最初的幾年當中，我們也許就被人完全擊敗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將固執於這樣一點，就是我們既以這樣無限的勇氣開始了這，那麼我們將來也要務必這樣繼續下去。有什麼理由要我們這樣下去呢？這裏沒有任何的理由。

從最初起我們就說過：我們要幹一番十分新的事業，假若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發展的國家底工人同志們不能迅速幫助我們的話，那麼我們的事業將要難以置信的困難，而且毫無疑義地會犯許多的錯誤。最主要的是，要能冷靜地會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裏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麼，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偏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處理我們的在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的。

在目前，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適當地領略融化往年的經驗。這一點是必須作到的，而我們也正要去作的。如果我們無論如何要想達到這個目的的話（我們確是想達到這個目的，而且我們是一定會達到這個目的的！），那麼我們就應當知道：新經濟政策底基本的、決定的、使其餘一切都服從自己的任務，——就是建

立我們業已着手建設的那種新經濟（雖然建設的很不好，很不熟練，但是在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上面，在新的生產與新的分配底基礎上面總是着手建設了）千百萬的農民依此而營其生計的與農民經濟之間的聯繫。

這種聯繫過去是沒有的；這種聯繫是首先應當建立起來的。一切必須服從於這個任務。我們還不得不考究一下：究竟新經濟政策在建立這種聯繫上，在它沒有摧毀我們曾經不熟練地着手建立起來的一點上，它成就的程度怎樣。

我們是跟農民共同建設我們的經濟的。我們應當好幾度地改造這種經濟，將它建設成這樣，即，使它能夠成爲我們關於大工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工作跟每個農民所經營，限每個農民可以掙脫貧困，而不寄托於幻想（因爲，幻想怎樣能使他跳出和解脫直接的最痛苦的餓死危險呢？）這樣進行的工作之間的聯繫。

這種聯繫，我們一定要把它表明出來，以便我們能夠明白地看到它，以便全體人能夠看到它，以便全體農民羣衆能夠看到現在他們所過的悲慘的、空前破產的、空前貧困的痛苦生活跟人們爲了達到遼遠的社會主義理想而進行的工作之間，有一種聯繫存在着。我們要這樣的來幹，就是使每個單純的普通勞苦的人都能明瞭他已經獲得了一些改善，而且他之獲得此種改善，是跟地主政權與資本主義時代少數農民所獲得的根本不同的，在地主政權與資本主義時代，每一改善步驟（無疑地，那時是有過改善的，而

且有過很重大的改善的)，都是跟對農民的侮辱、愚弄、及嘲笑，跟對羣衆的暴行分不開的，這種暴行，沒有一個農民是會忘記的，而且在俄羅斯，在幾十年之間也不會忘記的。我們的目的，就在於恢復聯繫，用行動向農民證明：我們是從他們所明白、所熟悉、及在他們貧困之下他們所能立即到達的東西來開始的，而不是從遼遠的、從農民意見上看來是空想的東西來開始的。我們必須證明：我們是能夠幫助他們的；我們必須證明：在破產、貧困及飢寒交迫的小農處於悲慘境況的時際，共產黨人是能夠馬上真正協助他們的。或者是我們向農民證明這一點，或者是農民使我們趨於死滅。二者必居其一，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新經濟政策底意義，就是這樣；我們全部政策底基礎，就是這樣。這也就是我們過去一年實施新經濟政策所得的主要的教訓，也就是我們來年的主要的所謂政治法則。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在體驗了這種事情之後，自然，他們是不能不貸予的。全體農民是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的。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麼我們就等一等吧，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的。應當知道：農民之國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兌現（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我們

的親愛的統治者，你們在延期這麼多月和這麼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夠有所作為的，這一點，你們也曾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歸根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底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底命運的。

我們能否完成我們當前的任務呢？這種新經濟政策是否適合呢？如果這種退却認為是正確的，那麼在退却之後，和農民羣衆攜手起來，並且和他們一同，雖是緩慢一百倍，但却更加堅定與不動搖地往前進行，以便他們能夠時刻看到，我們總是在前進着。如是，我們的事業將成爲絕對不可戰勝的了，而地球上任何勢力也不能夠戰勝我們了。在第一年當中，我們還不會作到這一步。這是應當十分爽直地說出的。而且我深信（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使我們能夠很清楚地很確實地得出這個結論來）：如果我們能夠領會到新經濟政策中所包含的巨大危險，並將我們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最弱的方面去，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解決這個任務的。

與農民羣衆攜手起來，與普通勞苦農民攜手起來，雖然拿比我們所夢想的速度慢得不知若干倍的速度，開始前進；但是整個羣衆在實際上確是和我們共同前進的。如果我們這樣作，這種前進運動總會到來一種我們現刻所夢想到的速度。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第一個基本的政治上的教訓。

第二個，比較特殊的教訓，就是用國有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競賽底考驗。現在，我們正在成立合辦公司（關於合辦公司，在後面我還要提到的），這種合辦公司，和我們全部的國營商業以及我們全部的新經濟政策一樣，乃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對商業方法底應用，對資本主義方法底應用。這種合辦公司底意義，就在於確立了資本主義方法與我們的方法之間的實踐的競賽。你試在實際上將二者加以比較吧。一直到現在，我們曾經起草了好些綱領，作了好些諾言。然而這在當時是十分必要的。沒有綱領和諾言，要進行世界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白黨連孟塞維克在內，非難我們這一點，那麼這只是表明：孟塞維克和第二國際以及第二半國際底社會主義者們，他們是完全不懂得一般革命底發展是怎樣進行的。除了經過這以外，我們是不能開步走的。

不過現在問題就在於：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工作，加以嚴重的檢查，但這種檢查，是和經共產黨人自己所設立的監察機關所作的那種檢查方法不同的，雖然，這些監察機關都是非常壯麗的，雖然它們在蘇維埃機關體系上，在黨的機關體系上，差不多都是理想的監察機關。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從大眾經濟底見地出發的檢查。

資本家是能給我們供給物品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他們侮辱了我們，他們掠奪了我們。那般不知共產主義是何物的單純的工人和農民，都

是知道這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能够供給物品的，你們能嗎？你們是不能這樣作的。』這是我們在去年春季所聽到的話，雖然這種話不常常是顯明的，但是這種話却成爲去春全部危機底基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們所担負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有很多工人——在去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純最致命的批評。這就是爲什麼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的這一點，這舊的一點，竟獲得了這樣重大的意義。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併肩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地活動着，他們唯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正試用着新的方法：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爲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不兌現的事情，已經叫共產黨人作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曾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大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端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

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

這就是第一個教訓，也就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底第一個主要的部份。我們是不會經營事業的。這在過去一年之內已經證明了。我很願意引證幾個國營托拉斯（用屠格涅夫這樣大大稱賞的漂亮的俄國文字表示出來的字眼）★底實例，藉以證明，我們是怎樣會經營事業的。……

很遺憾地，由於種種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我染病的關係，關於報告底這一部份，我不能詳細地加以敘述，只想把我的信念說一說，這種信念，是根據對於正在發生正在進行着的事物的觀察來的，在過去一年間，我們很顯然地證明了我們是不會經營事業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教訓。或者在來年，或者是我們予以相反的證明，或者是蘇維埃政府將不能存在下去。而最大的危險，就在於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了這一點。如果一切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結論。但是，人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並且人們相信：如果有人作那種想法，那他一定是

★屠格涅夫時常譏諷當時在俄國官廳文件中所用的粗陋的文字。這裏，列寧是在譏諷在蘇維埃報紙上所用的那種粗陋的簡縮字的；例如，在這種場合，『國營托拉斯』一字，它們不用『Gosudarstvenni Trest』，而代以『Gosarest』一字。



個不發展的人，是沒有學習過共產主義的，——也許正在理解着，正在學習着。不是的，請原諒吧：問題並不在於農民或非黨的工人還沒有學會共產主義，而在於曾經需要發展綱領並號召人民來執行這個偉大綱領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需要證明：在目前的困難情況之下，你在實踐上能夠幫助工人和農民底經濟，使他們可以看到，你是能夠作競爭的。

我們已經開始創辦的合辦公司，俄國的及外國的私人資本家和共產黨人都是參加的，這種合辦公司，乃是可以適當地進行競爭的形式之一，這種形式可以表明：我們是善於與農民經濟建立聯繫而並不弱於資本家，我們能夠滿足農民經濟底需要，而且照目前農民經濟的這個樣子，並在它的一切愚昧之下能夠幫助它們向前推進的，因為在一個很短促的時期內要改造它們是不可能的。

怎樣一種競爭，作為絕對迫切的任務，而面對着我們，由此就可想而知了。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關鍵之所在，而且就我的信念說來，也是黨底政策底全部實質之所在。我們有着很多純粹政治上的問題和困難。並且你們都是知道這些問題和困難的：這就是熱那亞會議的問題及武裝干涉底危險。困難是很大的，但是和這一個困難比較起來，那些困難是算不了什麼的。在那些地方，我們已經看到了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在那裏我們已經學會了很多東西，我們已經體驗過了資產階級的外交。孟塞維克在十五年以來所教給我們的，就是這一類的東西，從這個當中，

我們也學會了一點有益的東西。這並不是新奇的。

在經濟領域中，我們要作的事情是這樣的，就是現在要支持與單純的店員底競爭，與單純的資本家底競爭，單純的商人底競爭，這一些人會跑到農民那裏去，而對其共產主義是不會加以爭辯的，請大家想一想吧：不爭辯共產主義，而只是爭辯：要是需要供給物品，正當地作生意，善於建設的話，那麼我就要提高價格，而共產黨人，或許會把價格提得更高些，或許會把價格提高到十倍。這類鼓動，在目前就是事情底本質，這就是經濟根源之所在。

我重複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裏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使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事為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人的自負心在這裏還依然存在着，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最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心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卻不會做買賣，因為

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A B C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為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為四十個金字塔所注目，則無論如何是為歐洲的四十個國家所注目）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革命家，却不僅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並不知道怎樣去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麼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懂得這一點，以後應從A B C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夠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地從頭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碰壁了，那麼你再重新開始，假使必要的話，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十次這樣做下去，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為止，不要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矜持，而驕傲於人，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吧——很善於從事於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却是不會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幾百共產黨的及蘇維埃的頭銜及『爵位』，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為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小不足道的。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這種技能上，比任何一個老店員都要少些。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們必須開始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麼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所造成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繫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場所造成的……這一考試，是極嚴重的，因為在這裏，我們可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遭受失敗的。

問題就是這樣的，也只能是這樣的；因為在這裏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而這個競爭又是具有決定性的競爭。我們有着種種打破我們政治上和經濟上困難的方法和出路。我們可以誇耀地說：直到此刻為止，我們曾經善於按照種種的情況，在各種配合上來利用這種方法和出路。可是現在，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請允許我毫不誇張地向你們說這樣的話，因為在這一點上，這實在是『我們必須遭遇到的最後而堅決的一次戰鬥』，這一戰不是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爲了反對國際資本主義，我們還將遭遇到許許多多『最後的戰鬥』——不是的，而是反對俄國的資本主義，反對從小農經濟發展起來，爲小農經濟所助長培植的東西。這裏，在不遠的將來，有一種戰鬥將要迫在眉睫了，這個戰鬥的時日，還是不能加以確定的。在這裏，『最後而堅決的一戰』已經迫近了；在這裏，任何政治上

的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曲折迂迴的道路是沒有的，因為這是和私人資本作競爭的一種試驗。或者在這次與私人資本作競爭的試驗中，我們考試及格而獲勝；或者我們遭受完全的失敗。爲了進行這一試驗，我們有着政治上的權力和無數經濟上的以及其他的資源；除技能而外，一切應有盡有。我們是沒有技能的。如果我們從過去這一年底經驗中作出一個簡單的教訓，將它作爲我們在一九二二年整個一年的指導路綫，那時，我們便可以克服這種困難了，雖然這一困難比較前邊所述的一種困難大的多，因爲事情本身全繫於我們自己的。這並不是什麼外部的敵人。這一困難就在於我們自己不願意認那強加於我們的不愉快的真理，我們踏入那必須踏入的不愉快的境地：要開始從頭學起。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我們必須從新經濟政策所得出的第二個教訓。

第三個，補充的教訓，就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可惜得很，布哈林同志竟沒有出席這次代表大會，我倒很樂意和他論辯一下，不過這種論辯還是延遲到下一次大會好了。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我認爲我們的報紙以及我們的黨，一般地都犯了一種錯誤，就是我們陷入到知識份子羣，陷入到自由主義裏面，而斤斤於如何理解國家資本主義，並致力於研求舊書了。這些舊書所寫的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些舊書所論及的，乃是關於在資本主義下面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從來還沒有過一本書曾經論到在共產主義下面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甚至馬克思關於

這個問題也沒有想到講一句；他逝世後，不曾遺留下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明確的引用文句或不可爭辯的指示。所以，現在我們自己不得不打破這種困難。要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把我們的報紙作一鳥瞰，如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企圖作的那樣，那就會覺察到，它們把目標弄錯了，完全看到別一方面去了。

根據一切經濟學的書籍看來，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那時國家政權直接使某些資本主義企業隸屬於自己。而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依靠於無產階級，它給與無產階級以一切政治上的優先權利，它通過無產階級將下屬的農民羣衆吸引到自己的周圍來（你們都還記得，我們已經開始由貧農委員會作這種工作了）。因此，國家資本主義會使好多好多人發生誤解的。爲了防止這種誤解起見，應當切記以下這種基本的東西，即是：我們自己現在所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論在任何理論或任何文獻上，都是沒有論到過的；這理由很簡單，因爲一切與這個名詞有關的普通概念，都是適應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權的。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已經脫棄了資本主義軌道而尙未走上新軌道的社會。但是領導這一國家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了。我們都不願理解：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是我們自己，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善於加以限制，善於規定它界限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和國家相聯

繫着的，而這個國家，不外就是工人，不外就是工人底先進的部份，不外就是先鋒隊，它就是我們自己。

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應當加以一定限制的資本主義，然而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能夠加以這樣的限制。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究竟將成爲怎樣一種東西，這是依賴我們自己以轉移的。我們的政治權力是足夠的，是十分充足的；我們手中的經濟資源也是足夠的；但是那提拔出來、以便直接領導、決定界限、分開自身、使別人服從自己、而不使自己服從於人的工人階級，其先鋒隊底技能却是不夠的。所需要的只是技能，而缺乏的也正是技能。

這樣一種形勢在歷史上是絕對空前的，這種形勢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有着充分的政治權力，而與這並行的却是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底要點，就在於我們要理解這是我們能夠容許而且應當容許的資本主義，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而且應當加以限制的資本主義；因爲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廣大的農民羣衆和對於私人資本是必要的，它從事買賣的方法，應當能滿足農民意需要。把事情需要弄成這樣，就是使資本主義經濟及資本主義週轉能夠照常進行，因爲這對人民是必要的，沒有它，人民底生存將成爲不可能。其餘一切對於他們，對於這個營壘，都不是絕對必要的；其它一切他們都是可以妥協的。你們是共產黨員，你們是工人，你們是担任管理國家的無產階級底自覺的一部份，你們是能夠作成這樣的，就是：掌握在你們自

己手裏的國家，能够依你們所定的方針去行動。是的，我們已經度過一年了，國家是在我們的掌握中；但在過去的一年間，國家在新經濟政策上是否依照我們的方針而行動的呢？不，不是這樣的。然而，我們却不願承認這一點：國家並沒有依照我們的方針而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機器不聽從指揮了：正如一部汽車，不是依着駕駛它的人所駛行的方向而行，而是依別的什麼人所指示的方向而行的，這人也許是祕密的，也許是違法的，也許是只有上帝知道的，也許是投機牟利者，也許是私人資本家，也許他們都是，然而不管怎麼樣，這部車總是不依駕駛者所想像的那個方向前進的。這就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所必須切記的最基本的事項。在這個基本的領域中，應當開始從頭學起，只有在我們已經澈底地理解和體會了這一點的時候，我們才能够保證我們能學會這一點的。

現在，我來講停止退却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演說中已經講過了。一直到此刻為止，對於當時我所說的話，不論在黨報上，或在同志們給我的私人信件上，或在中央委員會上，我還沒有聽到過任何反對的意見。中央委員會曾贊同我的計劃，這一計劃就在於在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向這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應該着重地強調地提出這個停止退却的問題，並且請求代表大會應該以全黨的名義發出一個務須履行的指令。我們退却已經一整年了。我們現在應該代表黨來說：——『足够了！』退却所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



終結着，或者說，已經終結了。現在提出了另一個目的——改編力量。我們已經到達了新的陣地；整個說起來，我們執行退却的秩序是很好的。誠然，各方面想把這種退却轉化爲一種潰敗的聲浪是不不少的。有某些人——例如說，名爲『工人反對派』（我認爲他們並沒有權利採用這個名稱）這個團體底幾個代表——曾經說：我們在某些部份上，退却得不適當。由於他們過度熱心的結果，他們原想進入這一個門，而結果却墮到另一個門裏面去了，現在他們已經明白地發現這一點了。在當時，他們並未看到，他們的活動不會幫助我們糾正我們的運動，而在事實上他們的活動僅有一個意義——散佈恐慌，阻礙有紀律地執行退却。

退却是一樁難事。特別是對於那些習慣於進攻的革命家，特別是在他們已經習慣於進攻數年而獲得巨大勝利的時候，特別是在他們被其他國家成日只幻想開始進攻的革命者所包圍的時候，退却是一種困難的事情。他們當中有某些人，看到我們實行退却，竟然可恥地幼稚地流淚了，例如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屆擴大的全會上，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些有着最善的共產主義情感及共產主義進取心的同志，也因優秀的俄國共產黨人正在實行退却——只要想一想——而痛哭了。也許我現在已經不能理解這種西歐的心理了，雖然我以一個政治亡命者的資格，在這些美麗的民主國家中，曾經消磨過很多的歲月。也許從他們的觀點看來，這一點很難理解，以致流淚了。但是無論如

何，我們從不會感情用事的。我們都很明白：正因為我們許多年來進攻的很順利而且獲得了好多非常的勝利（而且這一切的一切，又是在一個破壞不堪及缺乏物質先決條件的國度中成就了的！），所以才實行退却來鞏固我們的這一進攻——這一退却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我們獲得的勝利已經很多了。我們不能保持我們一舉而攻取的一些陣地。而另一方面，也正因為我們只是在工農羣衆熱情的最高潮中一舉而攻取了這樣多的陣地，所以，我們才有這麼多的餘地，使我們能够作極遠的退却，就是直到此刻我們還能退却的很遠，而不至失去主要的和基本的陣地。整個講起來，退却是以極好的秩序進行了的，雖然驚惶失措的聲浪連『工人反對派』也在內（它的極大的損害也就在這裏）——曾經引起了我們的局部部隊的截斷，紀律的敗壞，退却秩序之破壞。在退却中，最危險的事情就是驚惶失措。當全軍（這裏，我是比喻的說法）作總退却時，它的士氣和進軍時的士氣是絕不能相同的。在退却的每一步，你都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消沉的情緒。我們甚至有過這樣的詩人，他們描寫莫斯科飢寒交迫的情形：『從前的一切都是光明而美麗的，可是現在却充滿了買賣與投機牟利。』像這一類詩人底傑作，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

自然，這是由於退却所產生的。嚴重的危險也就存在這裏：在一個勝利的大進攻之後，要實行退却是極端困難的：在這裏關係是完全不同了；在勝利的大進攻的場合，即令你不維持紀律，每個人仍會自動地衝上前去的，然而

在退却的場合，紀律就必須是更加自覺的了，而且百倍地必要，因為當全軍作總退却時，它不大清楚，它看不見究竟在何地停止，它只看見退却，因之，有時少許驚惶失措的喊聲，已足以使人人潰走了。在這裏危險是非常之大的。當一個真正的軍隊實行退却時，要架起機關槍來，當秩序井然的退却一變而為混亂的退却時，就立即發出『開槍！』的命令；這是對的。

如果在我們執行一個極端困難的退却並且萬事都依賴於維持良好秩序的這種當兒，有任何人吠聲吠聲，招致陣營的混亂——即令他是出自最善良的動機——在這個當兒，對於最小的違犯紀律的行動，也必須加以嚴厲、苛刻、無情地懲罰。這一點不僅適用於我們黨內的某些事情，而且更適用於像孟塞維克這樣的人士，也適用於第二半國際底一切老爺們。

在前幾天，我在『共產國際』第二十期上曾經讀到拉可西同志底一篇論奧托·鮑爾（Otto Bauer）（鮑爾在某一時期，曾經是我們的教師，但他與考茨基相同，在戰後也變成了一個可憐的俗物）底一部新著作的文章。鮑爾現在寫道：

『好了，他們現時正在向着資本主義退却了；我們老早就說過，俄國的革命不過是資產階級革命罷了。』

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都在說教這樣的東西，當我們說我們要槍斃說這一類話的人時，他們都感到驚異

了。他們都爲之驚愕不止；然而問題實在是很明顯的：當一個軍隊在退却時，比在進攻時，百倍地需要紀律，因爲在進攻時，人人都是踴躍向前的。如果在目前這種場合，人人都開始向後潰走，那必然要立時覆滅的。

恰恰是在這樣的時候，——作有秩序的退却，明確規定退却底限度，不驚惶失措，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當孟塞維克說：『你們現在正在退却中；至於我呢，——我總是贊成退却的，我的意見正和你們一致，我正是你們的人，我們一齊來退却吧。』我們這樣回答他說：『凡對孟塞維主義作公開擁護者，我們的革命法庭必須治以死罪，否則，它就不成其爲我們的法庭了，它究竟是誰人的法庭，那只有天知道。』

他們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們喊道：『這些人們是多麼專制啊！』他們直到現在還以爲：我們迫害孟塞維克，是爲了他們曾經在日內瓦攻擊過我們。但是，如果我們是這樣作的話，那我們保持政權連兩個月都不可能的。事實上，鮑爾、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底領袖們、及孟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底這種說教，恰是他們原有的本質：『革命太過火了；我們老早已經說過你們現在所說的話；讓我們再來說一次吧。』我們這樣地回答他們：『因爲你們說了這樣的話，讓我們把你們禁閉起來吧。還是抑制住不發表你們的意見好了，否則，如果你們在目前的情況下面，當我們正處在比白衛軍直接侵入時還更加困難的條件之下，你們要公開發表你們的政見時，那麼，對不

起，我們將把你們當作白衛軍底最壞的最有害的份子加以處置。』我們絕不要忘記這一點。

當我說到停止退却這一點的時候，我的意思並不就是說，我們已經學會經營商業了。反之，我的意見倒正與此相反。如果我的話竟產生出這樣的印象，那麼這正表明我的話是被誤解了，這證明我還不能適當地表白我的思想。

不過，問題是在於：因新經濟政策底結果而我們中間所造成的那種神經過敏與無謂驚擾的情形，萬事都要重新作起並要適應一切事物的願望，務須加以終止。我們現在有着好多合辦公司了。誠然，這種合辦公司，爲數很小，我們與外國資本家，曾經合辦了九個合辦公司，這些公司都曾經國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加以認可的。此外，梭可尼柯夫委員會又認可了六個合辦公司，北方木材托拉斯(Severoles)也認可了兩個。如是，現在經各種政府機關認可的公司計有十七個，其資本金達數百萬盧布（自然，在所有這些機關當中，還有着很多混淆的情形，因之，在這裏某種障礙是有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與俄國及外國資本家合辦的公司。這些公司的數目還是很少的。這種小小的然而實際的開始，却表示一點：即人們是從共產黨人底實踐底觀點來評價他們的，並不是像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樣的最高機關來評價他們的、自然，中央監察委員會是一種極好的機關，現在我們畀予它以更多的權力。然而當這些機關對共產黨人加以檢查時，——那請想像一下吧，便沒有人承認他們在

國際市場上的權威了。當普通的俄國資本家及外國資本家與共產黨人成立合辦公司的時候，我們就會說：『我們終於能夠作出一點事情來了；不論這怎樣的不好，不論這怎樣的可憐，然而就開步走一點說來，我們終於作起來了。』自然，這還是很不夠的，只要想一想吧：自從我們宣稱我們要把一切精力（據說，我們是持有很大精力的）放在這件事情上面以來，已經有一年了；而在這一年當中，我們努力進行的結果，只不過組成了十七個公司而已。

這一點正表現出我們是如何的拙劣與不熟練，正表現出奧布洛莫夫主義還有多少；由於這種奧布洛莫夫主義，我們不可避免地還要受人打擊的。我還要再重複說一遍，雖然如此，但開始已經有了，偵察工作已經作過了。如果為資本家活動所必需的基本條件還沒有具備的話，那麼資本家是不會到我們這裏來了。即使他們中間僅有很小一部份人來了，但這也表現出我們已經獲得了部份的勝利。

自然，他們在這些公司裏邊還會欺騙我們，還會把我們欺騙成這樣，即在數年以後我們才能辨別清楚。但是這並沒有什麼關係。我並不是說，這是一種勝利；這只是一種偵察工作，這種偵察表示出我們已經有了競技場，已經有了一塊土地，我們現在可以停止退却了。

這種偵察工作規定了與資本家所訂立的契約，其數目是微小不足道的，然而契約終於訂結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行動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再不要神經過敏、驚惶失措與無謂驚擾了。我們接二連三地收到很

多短信和電話，紛紛詢問：『我們既實行新經濟政策，那麼可否把我們重新組織一下呢？』人人都在喧嚷着，結果，弄得紛亂不堪了；沒有一個人來作實際的工作；人人都在不斷地討論如何能使自身適應於新經濟政策，以致毫無實際的結果可說。

可是商人們都在嘲笑着共產黨員，而且他們多半還在紛紛議論着：『在以前，他們有說服首長，現在他們有饒舌首長了。』至於資本家譏笑我們，說我們已經遲了，已經錯過機會了，這是毫不容置疑的，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需要以大會的名義認可這一指示的。

退却已經告終了。活動的主要方法，與資本家共同工作的主要方法，已經擬定了。我們已經有了範例，雖然這些範例在數目上還是很少很少的。

再不要囉嗦和討論新經濟政策了；讓詩人們去爲自己寫詩吧，他們之所以爲詩人者，正在於此。經濟學家，却不要再空談新經濟政策，而應努力增加這種公司企業底數目，檢查善於跟資本家作競爭的共產黨員的數目。

退却已經終止了；現在的問題，是在於重新配合力量了。這就是大會所必須通過的指示，這一指示應當把那種紛亂不安的情形，加以結束。沉着一點，不要作無謂的幻想吧，那將要算在負號以內的。在實際上，需要證明：你的工作，不亞於資本家。資本家們爲了發財致富，正在與農民建立了經濟的聯繫；你們爲了加強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底經濟力量，也必須與農民經濟建立一種聯繫。你們勝過

資本家的一點，就是：國家政權是在你們的手裏，許多經濟上的手段也是在你們的手裏，你們只是不善於利用這些東西，更冷靜一點觀察事物吧。拋棄那些華美的、莊嚴的共產黨員的法衣吧，簡單地坐下來學一點簡單的事情，那時，我們就一定能够擊敗私人資本家的。我們有國家政權；我們有巨大的經濟資源；如果我們擊敗了資本主義，而與農民經濟建立聯合，那時我們將成爲絕對不能戰勝的力量了。那時，社會主義的建設，將不是那叫做共產黨的滄海一粟，而是全體的勞苦羣衆底事業了。那時，一個普通的農民都會看見，我們是在幫助着他的；那時他將聽從我們的領導。這種步調雖然是百倍地緩慢，然而它却是百萬倍地堅實與可靠的。

這就是，在怎樣的意味上須要說停止退却的原故，而且不論在那一種形式上，這個口號都可以正確地變爲大會的決定的。

因此之故，我願意再講一個問題，即是：什麼是布爾塞維克底新經濟政策，是進化呢？還是策略？『路標更換派』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如你們所知道的，該派是在俄羅斯僑民中間的一種派別——社會政治派別，其領導者是立憲民主黨底幾個巨頭，前高爾察克政府底幾個閣員，這些人們相信蘇維埃政權正在從事於建設俄羅斯國家，因之，應當追隨於蘇維埃政權之後。他們議論道：『但是這一蘇維埃政權是在建設怎樣的一種國家呢？共產黨人說，他們正在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並向我們担保說，這



是一種策略：布爾塞維克在困難的時期要利用一下私人資本家，此後，對於他們的財產將要一概加以沒收的。布爾塞維克喜歡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而在事實上，這並不是策略，而是進化；是一種內部的蛻變；他們是走向普通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我們是應當支持他們的。歷史是依着各種不同的道路前進的。』

他們中間有幾個人以共產主義者自稱，但是有些——連烏斯提雅洛夫 (Ustryalov) 在內——是比較爽直的。他大概是高爾察克政府中的一位閣員。他和他的路標更換派同志底意見並不一致，他說道：『關於共產主義，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但是我斷言，那並不是他們的策略，而是進化。』我認爲，這位烏斯提雅洛夫這樣率直的說法，對我們是極有益處的。我們——由於地位的關係，尤其是我——每天都可以聽到很多甜蜜的、共產黨的謊言——『共產謊言』——之類的話；因此我們有時簡直厭惡，達於極點。現在我得到的却不是這種『共產謊言』，而是一期『路標之更換』(Smena Vekh)。該雜誌很率直地說：『事情絲毫也不是如同你們所想像的那種情形，在事實上，你們是正陷在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泥沼中去了，這裏將是一些寫滿口號標語的共產主義的旗幟。』這種話對我們是非常有益的，因爲我們在這幾句話中所看到的已不是簡單的重複我們在自己週遭經常所聽到的那些話；而簡直是階級敵人底階級真理了。去讀一讀這一類的東西是很有益的，因爲這類東西並不是因爲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裏只允許

這樣寫而禁止那樣寫而寫出的，而是因為這確實是一種階級真理，由階級敵人粗暴地率直地說出來的階級真理。

『我是贊成擁護俄國的蘇維埃政權的——烏斯提雅洛夫說，雖然他是一個立憲民主黨員，一個資產階級人物，並曾援助過武裝干涉——我是贊成擁護蘇維埃政權的，因為它已經走上了可以導向普通的資產階級政權的道路了。』

這是非常有益的話；我以為，我們應當把它切記在心裏。路標更換派這樣說話，比他們當中某些人差不多以共產主義者自稱（在這種場合，很難分別開來——他究竟是信仰上帝呢，還是信仰共產主義革命），對我們要更好些。應當爽直地說：這樣坦白的敵人是有益的。應當很坦白地說：烏斯提雅洛夫所說的那些事情是有可能的。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切種類的轉化；依靠於信念底堅決、忠誠、及其他精神上的優良品質，在政治上並不是很嚴重的事情。有極少數的人，他們往往具有優良的精神上的品質，但是決定歷史的結局的則是廣大的羣衆，如果這極少數的人不能和他們接近，那麼他們有時對付這少數人是不很客氣的。

像這樣的實例，是不勝舉述的。因此，對於路標更換派底這種率直的說法是應當表示歡迎的。敵人說出了階級的真理，而指出了那擺在我們面前的危險。敵人正在努力使這種危險成爲不可避免的危險。路標更換派將成千成萬的各種資產者或蘇維埃公務人員——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底參與者——底心情，和盤托出了。這是一個基本而現實的

危險。所以，主要的注意力應當集中在真正『誰戰勝誰』這個問題上面。關於競爭的問題，我已經說過了。現在，對我們的正面的襲擊是沒有的；我們的咽喉還沒有被敵人扼住。明天究竟如何，我們還不知道，但是在今天說來，手執武器來進攻我們之事還是沒有的，可是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鬭爭，却較前百倍地激烈而且危險了，因為我們不能經常清楚地知道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友人。

我並不是從共產主義的同情心底見地，而是從經濟形態及社會制度形態的發展底見地，來講共產主義的競爭的。這並不是競爭，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卓絕的、猛烈的，雖不是最後的但是也是你死我活的鬭爭。

這裏，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裏？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十分足夠的。這裏你很難找到某人，他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商業機關當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裏。企業底租讓，在某些地方雖有廣泛地發展，然而一般說來，它所起的作用尚不足道；整個說起來，它底力量還是非常微小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經濟力量，實在是足以保證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究竟缺乏什麼東西呢？缺乏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國事的那部份共產黨員底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為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

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例，那麼我們就要問一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否能夠說：那些共產黨員是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裏發生的事情，正如同我們在童年時代從歷史課本上所知道的一個故事：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底文化如何呢？在這裏，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較高於戰敗的民族，則前者強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強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底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他們全體又都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他人的文化了呢？是的，在這裏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小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底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他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狡猾的怠工者有意將他們抬上這樣的位置，以利用他們作為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為這一點是我們必須

加以承認的，因為在現時，這正是問題的焦點所在。我認為這一點，也正是我們在過去一年間所得的政治上的教訓，而一九二二年的鬭爭，仍將要在這一旗幟之下進行的。

蘇俄與俄國共產黨底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為是在領導人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麼他們自然就能够學習，因為這是能够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想望的相去甚遠。

我們自宣佈新經濟政策以後，提在議事日程上的競爭，是極端嚴重的競爭。這種競爭，似乎是在一切國家機關中進行着，但在事實上，它仍是兩個不可能調和地彼此敵視的階級之間的鬭爭底一種形式；這種競爭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鬭爭底一種形式；這種競爭是一種還沒有完結的鬭爭，而在文化方面說起來，它甚至在莫斯科各中央機關中都還沒有終結。因爲，資產階級的官吏往往比我們最好的共產黨員知道的更多些，這些共產黨員雖握有一切權力和機會，但他們却絲毫也不會利用他們的權利和他們的權力。

我很願意從托多爾斯基 (Alexander Todorsky) 的一本小冊子裏面引用一節話。這本小冊子，是很久以前，於俄國蘇維埃革命第一週年紀念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

日在凡謝岡斯克城(是提凡爾省的一個縣城)出版的。就外表看來，這位凡謝岡斯克的同志是一個黨員。我在很久以前就讀過了這本小冊子，我不敢保證在引用該小冊子時，我不會犯錯誤。在書中，他敘述了他怎樣着手設備兩個蘇維埃工廠的事情，爲了遂行這個目的起見，他以當時流行的那種方法——用剝奪自由並沒收其財產的威脅辦法——任用了兩個資產階級份子。他們被請參與恢復工廠的事業。在一九一八年我們怎樣吸引資產階級一事，大家都知道，毋庸再述，現在，我們又用別的方式來吸引他們。但是，他從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事實僅僅作了一半。單單戰勝資產階級，等待他們，還是不夠的；應強制他們來替我們工作。』

這是說的很出色的幾句話。這幾句出色的話表明出：甚至在凡謝岡斯克城，即使在一九一八年，對於勝利的無產階級和戰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關係已有了正當的理解了。

要是我們打擊剝削者，擊敗和征服他們，這只是作了一半。在莫斯科，在一百個負責的工作人員當中，總有九十人幻想：全部的問題，就在於打擊，使他們無害於我們並且征服他們。然而關於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白衛軍所說的話，往往被認爲僅僅是要使他們無害於我們，打擊他們（或者，不僅是打他們的手，而且還打他們別的地方），並且征服他們。但是，這還只作了事情底一半。甚至在這位凡謝岡斯克的同志說這句話的一九一八年，這

只是事情底一半；到了現在，它甚至還不到四分之一了。我們應當這樣來處理事情，就是強制他們來替我們工作，不要弄得使負責的共產黨員都佔據領導位置，都獲得頭銜，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問題底全部本質，就在這裏。

單用共產黨員的力量，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種幼稚的、絕對幼稚的觀念。共產黨員只是大海中的一滴，只是人海中的一滴而已。只有當他們不僅在全世界歷史的方向底意義上正確地決定了道路時，他們才能够循着他們的道路領導人民大眾。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曾經絕對正確地決定了我們的道路；每個國家都可以證實我們曾經正確地決定了道路，也在我們的祖國，在我們的國度裏，我們也應當正確地決定這種道路。這一道路不僅取決於這，而且取決於將來不會再有武裝干涉，取決於我們能够給予農民以商品而換取他們的糧食。農民會這樣說：『你們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你們保衛了我們的祖國；因此我們願意聽從你們，但如果你們不會經商和管理的話，那麼請滾開吧！』是的，這正是農民們將要說的話。

如果共產黨人會用別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依照他們要走的道路來領導資產階級前進時，我們便能够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要是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為他無所不知，以為：『我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我們曾經戰勝了過比任何店員都厲害得多的敵人，我們曾經在前綫上作戰，並且打敗了厲害得多的敵人』，那麼，這種佔優勢的情緒一定要致我們於死命的。

要是我們只是使剝削者無害於我們，打擊他們，解除他們的武裝，那麼這是事情底最不重要的部份。這是應當要作的。我們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和我們的法庭，不要那樣萎靡不振的幹，如他們以前所作過的，而要記住：它們是為全世界敵人所包圍着的無產階級法庭。這是不大困難的，在大體上我們已經學會這了。在這裏，應當再加以若干推進，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勝利底第二部份，即用非共產黨員的人手來建立共產主義，善於在實際上幹那在經濟上應當作的事情，——這就是與農民經濟建立聯繫，滿足農民底需要，以便使農民會說：『不論怎樣艱苦和困難，不論飢餓如何痛苦，但是我却看到，政權雖是一個不習慣的政權，但是從它却獲得了實際的、真正實在的利益。』務須辦到這一步，即：使我們與之合作的那些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倍的大批份子，能夠這樣來進行工作，為的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為的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為的能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底中心關鍵就在這裏，因為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曾經理解了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底廣大羣衆對吸引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這種意識。關於這一點，曾經發過多少通告書，寫過多少東西呢？在過去一年間，究竟作了多少呢？什麼也沒有。在我們黨內的一百個委員會中，可以說很難有五個委員會能夠表現出自己的實際的成績來。我們是怎樣地落後於目前擺在日程上的那種需要之後，我們是



怎樣地依然生活於一九一八及一九一九年的傳統中。這兩年乃是偉大的年代，在這些年代曾經作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事業。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回顧這些年代，而不能看到目前擺在日程上的是怎樣的任務，那麼這就是覆亡——不容置疑的、絕對的覆亡。全部的問題，正在於我們不願承認這一點。

我現在願意舉出兩個實例，來表明我們管理的情形是怎樣的。我已經說過了，拿國營托拉斯之一作為例證，是較為正確的。但是請原諒，我不能使用這個正確的方法，因為要能引用那樣的實例，就須要極具體地研究一下至少是關於一個國營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沒有可能作這一研究，因此，我只好引用兩個小小的實例。一個實例，是關於莫斯科消費合作社指責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為官僚主義一事；另一個實例，是關於頓巴斯（Donets）流域的事情。

第一個實例是不十分適切的，不過最好的例子我沒有可能引舉了。我用這個實例可以說明我的主要的意思。正如大家從報紙上所知道的一樣，在最近幾個月中，我沒有可能直接處理事務；我未曾在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工作。我臨時和罕有的到莫斯科去一趟，我總是看見對於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那種怨聲載道的情形。我毫不懷疑地認定，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一定作得很不好，該機關的官僚習氣一定是很厲害的。當怨言來得特別厲害時，我極想把這樁事情考究一下，——援引一個具體的實例，

明瞭事情的底細，確定事情的真相，稽查這個國家機關何以不善於運轉的原因。

莫斯科消費合作社，需要購買一些罐頭食品，於是一個法國人便出現了。我不知道，他之願幹這是否爲了國際政治底利益和獲得了協約國領袖底諒解，或是爲蒲昂卡雷（Poincare）及蘇維埃政權底其他敵人所認可（我想，在熱那亞會議之後，我們的歷史家將會究明這一點的。）但是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都參與了這次的交易，這却是事實，因爲法國資產階級底一個代表者來到莫斯科，出賣了罐頭食品。莫斯科正陷於飢餓中，在夏季到來時，將陷入於更可怕的飢餓狀態；肉類沒有運來，而且，就我們鐵路人民委員部底真相說來，大概任什麼東西都不會運來的。

有人願接受蘇維埃通貨，出售罐頭肉類食品（這肉類食品是否已完全酸敗不能食用，日後的調查，將會證明）。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簡單的呢？可是，如果從蘇維埃的見地來適當地加以觀察時，這事情却不是這樣簡單的了。我不能親自來探討這次事件，只是審問了一次，現在我手邊有件報告書，敘述這次著名事件如何發展的情形。二月十一日，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根據加米業夫同志的報告，通過了一個願從國外購買食料品的決議案，這就是這次事件底開始。自然，如果沒有獲得俄共中央政治局底同意，這位俄國的公民怎能決定這樣的問題呢！請設想一下吧：四千七百個負責的工作人員（這只是根據人口調查

所知道的數字)，如果沒有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底同意，他們怎麼能決定從國外購買食料品這樣的問題呢？自然，這是一件超然的事情。顯然地，加米業夫同志十分理解我們的政策以及我們所處的實際情況，因此他並沒有過於信賴多數負責的工作人員。他開始就捉住了牡牛底角——如果捉住的不是牡牛，則無論如何是政治局——而且一下子就獲得了以下的決議（我沒有聽到，關於這一點在會議上會有任何討論），這個決議說：『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對於自國外輸入食料品的願望，乃至對入口稅，務須加以注意……』等等。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底注意力，確是灌注在這一件事情上面了。事情便開始進行了。這是二月十一日的事情。我記得，在二月底，或差不多那個時候，我適在莫斯科。我聽到了什麼呢？——怨言，莫斯科同志們底絕望的怨言。『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這樣問道。『我們無論如何買不到食料品。』為什麼呢？『因為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底官僚習氣。』我已經很久沒有過問事情，而且我不知道關於這件事情政治局已經通過了決議；我只是叫事務主任加以調查，設法找到一個文件交給我。當克拉辛抵莫斯科時，這個事件才告一結束。加米業夫和他討論到這個問題；事情辦妥了，罐頭肉類食品買成了。一切都好，結局也很好。

至於加米業夫和克拉辛能夠商議妥貼，正確決定俄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所需要的政治路線一點，我沒有絲毫的懷疑。如果關於商業問題上的政治路線，已由加米業夫和

克拉辛兩人決定了，那麼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將成爲世界上最好的共和國。但是絕不可每件買賣，都把政治局委員加米業夫和克拉辛——後者正忙於關於熱那亞會議前的外交事務，這種事務，需要巨大的過度的勞力——這些同志拖在裏面，叫他們去向一個法國公民購買罐頭肉類食品。這樣的工作方式是不可以的。這並不是新的方式，並不是經濟的方式，也不是政策，這只是開玩笑而已。現在我手頭有着關於這次事情調查的報告。甚至我接到了兩個報告：一個是人民委員會的總務主任戈布諾夫及副主任米諾石尼柯夫所作的報告，另一個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所作的報告。老實說，我不知道何以國家政治保衛局對此事也感興味，也不大相信這樣做是否適當，但是對這一點我現在不擬加以深究了，因爲我恐怕這樣一來，不需要再作新的調查了。所重要的，只是關於這次事件的材料已被搜集起來，現在我手頭已經有這些材料了。

當二月底我來到莫斯科時，我曾聽到這樣苛刻的怨言，說：『我們不能購買罐頭食品』；而同時，在立堡（Libau），却有一艘滿載罐頭食品的船，甚至以真正的罐頭食品換取蘇維埃的通貨！像這類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如果這些罐頭食品還沒有完全腐爛（我現在強調『如果』這個字眼，因爲我還不能確定關於這一點我將不再作第二次調查了；這次調查底結果，我們將在下屆代表大會上加以報告），如果這些罐頭品沒有變壞，且已買的話，那麼我就要問：爲什麼這件事情沒有加米業夫和克拉辛就

不能解決呢？從我現有的報告中，我得悉：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曾將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投入監獄。從這個報告中，我又得悉：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曾經向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說：『將來，除非公正人在面前，我將不向你講話了。』讀了這個報告之後，我回憶起二十五年以前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有不得不做起律師一件事來。我是一個祕密的律師，因為我是官廳流放的，依法不得再行執行律師的業務；但是因為在那個區域裏沒有其他的律師，人們遂常來訪問我，告我以某些事情。可是，在理解他們所說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上，我感到了最大的困難。有一次來了個婦女，自然，她先從她的親戚說起，但是很難弄清楚問題的真相。於是，她又說了一條白母牛的故事。你告訴她：『帶一個抄本來。』她於是走開了，埋怨着：『不拿一個抄本來，他是不願聽我的話的。』在我們那批被流放的人中，常常講起這個抄本的笑話來。然而我還能夠獲得某些進步；人們來看我時，就帶一些必要的文件，我就能夠推知問題究竟在那裏，他們埋怨的是什麼，使他們感到煩惱的是什麼。這是二十五年以前在西伯利亞一個距離最近的火車站還有幾百俄里的地方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在革命三年之後，在蘇維埃共和國底首都，為了購買罐頭食品，還需要有兩個調查，需要有加米業夫及克拉辛底置喙，以及政治局底命令呢？究竟缺少什麼呢？政治權力嗎？不是的。錢也是有的，因之，他們既有經濟權力，又有政治權力。一切必要的機關都是具備了

的。那麼，缺少的到底是什麼呢？缺少的乃是莫斯科消費合作社以及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每一百工作人員中九十九個工作人員底文化教養。這些工作人員，我對他們並無任何異議，而且我認爲他們都是很好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都不能很有文化地來處理事情。

當我最初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向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個書面建議：據我看來，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以外——你們知道這些委員，是不能加以侵犯的——應將莫斯科各機關中的一切工作人員，在莫斯科最壞的獄中監禁六小時，將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則監禁三十六小時才好。現在才弄明白：究竟犯罪的是些什麼人還沒有找到，但事實上，從我所說的當中就可以很顯然地看出來，這些犯罪的人你是發現不出來的。這只是普通的俄國知識份子的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只是因循苟安、雜亂無章罷了。起先，他們胡衝亂撞，以後又想想，到了沒有結果時，他們就奔訴於加米業夫，奔向政治局了。自然，一切困難的國家問題都須提到政治局去討論解決——關於這一點，此後我還要說到的——但是應當事先想一想然後再來作。如果你要求解決某種事件時，那麼你就應當看看文件，首先，你可以打一個電報；在莫斯科，還有電話，你可以打一個電話給相當的機關，送一個繕本給茨魯巴，說：『我認爲這件事是非常迫切的，我將採取一切辦法來反對任何官樣文章。』應當仔細地想一想這種基本的文化素養，應當深思熟慮地來處理事情。如果事情在兩分

鐘電話的談話中不能一下子解決，那麼你可以將文件搜集起來，說道：『如果你表現官僚習氣的話，那我會把你送到監獄裏去的。』沒有絲毫的考慮，沒有任何的準備，只是通常的奔走忙亂，雖有好幾個委員會，然而一切人都感到精疲力竭，困病交加；事情只有當加米業夫和克拉辛晤談的時候，才能進行。這種情形是很典型的。這不僅在首都莫斯科所特有的情形，而在其他首府，在一切獨立共和國及各個特別區的首府裏，也有同樣的情形。不僅在各省會，就是在各地都經常地在作着同樣的事情，甚至更壞得一百倍。

在我們的鬭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漂亮地告訴你關於革命鬭爭，關於全世界革命鬭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正直，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正直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事情底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那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

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懲辦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見，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担保，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情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向怠工者作過激烈的鬭爭，就是在現在，這一鬭爭還擺在我們面前。自然，怠工者是有的，這是對的，我們應當跟他們進行鬭爭。但是，當形勢成爲如同我所描述的那樣的時候，難道可以跟他們作鬭爭嗎？這樣作時，會比任何怠工都更有害些，怠工者所需要的，正是兩個共產黨員關於在什麼時候要求政治局作購買食品原則指示的問題，互相爭論，以便乘隙而入。如果某一聰明的怠工者，圍繞在這個或那個共產黨員的周圍，或挨次地接近他們，並以讒言襄助他們，那麼事情會終結的。這樣，事情將注定永歸失敗的。——應該歸咎誰呢？誰也不應歸咎，因爲兩個負責的忠誠的革命者——共產黨員，正在那裏爭論去年降雪的問題，正在那裏爭論關於何時向政治局請求購買食品原則指示的問題。

我們所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就是這樣。凡在資本主義大企業中受過訓練的店員，都是會作這樣的事情的，然而在一百個負責的共產黨員中，却有九十九個人不會這樣



作，也不願理解他們沒有這種技能，應當從ABC學起。除非我們對這一點有所理解，除非我們又重新坐在預備班裏從頭學起，否則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解決目前成爲我們全部政策之基礎的經濟問題的。

我要引舉的另一個實例，就是關於頓巴斯的事情。你們知道，這是我們全部經濟底中心，是我們全部經濟底真實基礎。除非我們復興頓巴斯，除非將它提高到應有的水平，否則就根本談不到俄國大工業底復興，就根本談不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爲社會主義是只有依靠大工業方能建立起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中央委員會上已經注意到了。

這個區域，並沒有不合法的，可笑的，妄誕的將小問題提到政治局裏來，所提出的乃是真正絕對迫切的事情。

中央委員會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我們全部經濟底這樣現實的中心、根基與基礎裏邊，人們是否是真正有條有理在工作；而領導中央煤業局的，毫無疑義的，不僅是忠誠的人，而且是真正有教養且有巨大能力的人；即使我說他們都是富有才能的人，我也沒有說錯的，所以，中央委員會的注意力應當灌注到這裏來。烏克蘭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是很好的，但是在黨的關係上，它有時——最客氣的說法應當是怎樣的呢？——却採取一種迂迴曲折的道路，我們不得不設法知道知道他們，因爲那個地方的人是狡詐詭譎的，他們——我且不說他們會欺騙中央委員會——會設法離開我們的。爲了明瞭所有這一切起見，我們

曾在這裏的中央委員會上加以討論，發見了磨擦和一些意見不和之處。在烏克蘭，有一個小礦山利用委員會。自然。在這個委員會與中央煤業局之間，有着很厲害的磨擦。不過，我們中央委員會，還有着若干經驗，而全體一致地決定不撤換領導人物，如有磨擦的話（直至最細微的情形為止），即隨時報告我們，因為，在這區域中我們有着不僅忠誠而且能幹的人，須要援助這些人，以便他們能够學會（假定他們還沒有學會的話）。結局是，在烏克蘭召集了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總之一切事情都由此發生了。我要求烏克蘭的同志們給我一些情報，並特別請奧爾強尼基茨同志（中央委員會也同樣要他去）至烏克蘭一行，調查一下究竟。顯然地，那裏曾經發生了一種陰謀和混亂狀態，這種情形，如果黨史委員會要把它弄清楚，即用十年時間亦所不能。但是在事實上，結局是，不管有中央委員會底一致通過的指令，而這個集團終於為另一個集團所代替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大概說來，這個集團的一部份，雖然他們具有高尚的品質，但却犯了某種錯誤。在管理方法上，他們是過於熱心了。在那裏，你須得應付工人們。所謂『工人』，人們往往以為這是指工廠無產階級而言。但在這裏，却全無這樣的意味。自戰爭爆發以來，在我國，跑到工廠裏去的人，並不是無產階級出身的；他們為了隱隱自己，逃避戰爭，才跑進了工廠，難道目前我們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已經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到工廠裏去的那種情形了嗎？這是不對的。依據馬

克思的話說來，這是不錯的；然而馬克思所寫的，是就自十五世紀起整個資本主義而說的，並不是就俄國而說的。在六百年間他的話是對的，但對於當代的俄國就不對了。那些跑進工廠裏去的人，往往不是無產者，而是各式各種偶然的份子。

要善於適當地佈置工作，以便不落人後，以便避免可能發生的磨擦，以便使管理工作不至與政治分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因為我們的政治和管理工作，是在於使全部先鋒隊跟整個無產階級羣衆及整個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如果誰忘記了這些輪齒，如果誰完全浸沒於管理工作中，不知其他，則結果一定將蒙受極端的不幸。頓巴斯工作人員所犯的錯誤，和我們的其他錯誤比較起來，雖是極微小的，然而它却是一個標本的實例。這一例子證明：中央委員會全體一致的要求是：『讓這個集團仍繼續存在下去；將一切糾紛（連同極小的衝突在內）一概提交到中央委員會上來，因為頓巴斯流域不是一個偶然的區域，而是一個極重要的地帶，沒有這個地帶，社會主義的建設，將只成爲一種虔誠的願望罷了。』然而，我們的全部政治權力，中央委員會底全部權能，結果，却是不夠的。

自然，這次是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犯了錯誤；此外，還鑄成了許多別的錯誤。

這個實例表明了：問題底要點並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終斷。這正是感到缺乏的

東西，錯誤正在這裏。

我以為，當我們談到我們的革命和估計到革命底命運時，我們應當嚴格地把革命所已經完全解決了的問題，跟從資本主義分不開的進入世界歷史時機的問題分別開來。我們的革命就有這樣的情形。讓孟塞維克和奧托·鮑爾——第二半國際底代表人物——去盡量高呼『他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吧；不過，我們說，我們的任務却在於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正如某一個白黨的報紙所說的一樣，在我們的國家機關中，四百年來積滿了腐敗污濁的東西，而布爾塞維克却在四年之間，將這類腐敗不堪的東西一掃而空了。這正是我們的偉大功績。然而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做了什麼呢？他們連什麼也沒有做。不論是在我國，或是在先進的開明的德國，甚至連中世紀時代的腐敗與污濁都不能根絕的。但是他們對於我們的這一偉大的功績，却加以非難。將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我們的不可分割的功績。

現在，關於戰爭的話傳播得很廣。例如，職工會——改良主義的職工會，正在通過反對戰爭的決議案，它們正在以號召罷工反對戰爭相威脅。近來——如果不是我弄錯的話——我曾經在報紙上讀到一段電訊，說，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在法國衆議院曾發表演說反對戰爭，並謂工人們寧可起而暴動，而不願置身於戰爭底漩渦中。已不能像我們於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宣言』中所作的那樣來提問題了。只有俄國革命才表明了：怎樣能夠脫出戰爭，要這樣

作時就需要什麼樣的努力，這就是說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脫出反動戰爭。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解決這一類的問題時，人類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在戰爭當時千百萬人被無辜屠殺的事實，如果戰爭爆發起來，這一幕大屠殺的慘劇，又將重演於世。我們正生活在二十世紀，不是爲了這個或那個政府的利益，而是爲了推翻這個政府，以革命方法來脫出反動戰爭的唯一人民——那就是俄國人民，正是俄國革命拯救了俄國的人民。俄國革命所獲得的一切，是不能動絲毫的。地球上任何一種力量，都不能從我們手裏把革命所贏得的東西奪去，正如地球上任何一種力量，都不能把蘇維埃國家所已經創立的東西從我們手裏奪去一樣。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好幾百年以來，國家都是依據資產階級的形式式建立起來的，現在歷史上第一次才發見了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我們的機關或許是拙劣的，然而據說最初發明出來的蒸氣機也是拙劣的，而且當時甚至不知道這架機器能否轉動。不過，問題底要點並不在這裏；問題底要點在於它已經被發明出來了。即使最初的蒸汽機就形式說是不適用的，然而唯其如此，我們現在却有蒸汽機了，即令我們的國家機關是非常拙劣的，然而它却已經創造出來了，最偉大的歷史的發明已經作成了，無產階級型的國家已經創造出來了。因此，儘管讓整個的歐洲和成千成萬的資產階級報紙廣播說，我們全國如何混亂和貧困，並說在我們國家中勞苦大眾只是忍受痛苦；然而全世

界的一切工人却都傾向於蘇維埃國家了。我們所得到和不能移轉的偉大勝利，就是這樣。但這種勝利，在我們共產黨的代表者看來，却還只是一個開始罷了。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這個任務是否已經完成了呢？不，還沒有。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的基礎。那些以為我們已經具有社會主義基礎的共產黨員，是極端錯誤的。全部的問題，就在於要堅實地、明確地、冷靜地把那構成俄國革命底全世界歷史功績的東西，跟我們所作得很拙劣的東西分別開來，跟還沒有創造出來的東西、跟我們還需要數度加以變更的東西分別開來。

政治事件，往往是非常複雜和紛亂的。這些事件可以拿來和一條鏈子相比。要把握整個鏈子，僅僅捉住一環是沒有用的。也不可能人工地只選擇你要把握的一環。在一九一七年，主要的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於脫出戰爭，——這是全國人民所要求的，而這一點則掩蓋了其它一切。革命的俄國終於達到了脫出戰爭的目的。雖曾經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因此，人民大眾底根本要求却估計到了，這一點就給了我們以多年的勝利。……蘇維埃政權乃是一個更加民主、更加接近於勞苦羣衆的政權——每個人民都感覺到了這一點，農民也領悟到了這一點，每一個從前綫上歸來的士兵，也都深深地理解了這一點。不論我們在其他方面作出了多少荒謬和背理的事情，然而我們曾經顧及到了這個主要的任務，這證明了一切萬事都是對的。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主要的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主要的問題是在於軍事的抵抗。這時，稱霸世界的協約國列強，曾經進攻我們，企圖殺我們。當時，不需要任何宣傳，每一個非黨的農民都理解，究竟什麼樣的事情正在發生着。大地主來了。共產黨人是善於跟他們作戰。所以，就大體言之，農民都是擁護共產黨人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會獲得勝利的原由。

在一九二一年，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有秩序地退却。因此，曾需要嚴峻的紀律。『工人反對派』說道：『你們輕視工人，工人們應該顯示出更偉大的主動性來。』但是，主動性應該在於有秩序地退却和嚴格地維持紀律。誰要是表現驚慌失措和違犯紀律的樣子，那就等於斷送了革命，因爲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叫那慣於獲得勝利、抱有革命觀點及理想、而在精神上將每一種退却都視爲恥辱的人執行退却一事了。因此，最大的危險，是在於違犯井然有條的秩序，而最大的任務，也就在於保持良好的秩序。

那麼，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什麼地方呢？現在主要的問題——我願意以此來結束我的報告——以改變方針說來，並不在於政策；在講新經濟政策時，關於這一點說的簡直太多了。所有這一切完全是空話。這是一種最有害的妄談，自實行新經濟政策起，我們已經在設法整頓、改造舊有機關，而成立新機關了。這是最有害的妄談。我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是：形勢底核心是在於人，是在於選擇人了。習慣於反對瑣屑事務、反對有精深教養的革

命家，不去改造機關，而重視個人作用的革命者是很難理解這一點的。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到達這樣一種形勢，對於這種形勢的政治意義，我們必須冷靜地加以估計；我們已經前進得這樣遠，以致我們不復能保持住一切的障地，而且也不應保持了。

在過去的幾年間，我們國際地位曾經大大地改善了。我們所獲得的蘇維埃型的國家，乃是全人類底一大進步，共產國際每天從各國所接到的新聞，都確切地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都絲毫不懷疑這一點。可是就實際工作說來，情形却是這樣的，就是：除非共產黨人給予農民羣衆以實際的援助，則他們勢將不能擁護共產黨人了。注意底中心並不在於立法，頒佈更好的命令等等。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以頒佈命令爲宣傳底形式。人們時常嘲笑我們，布爾塞維克並沒有理解到，他們的命令是沒有被執行的；全部白黨的報紙都充滿了這一類揶揄嘲弄的話，不過這一時期是合法的，當時布爾塞維克已經取得了政權，而向全體農民及全體工人說道：『這就是我們想要怎樣去管理國家的東西，這裏是一個命令，試一試吧！』從最初起，我們就以命令佈告的形式，把自己的關於政治的概念，一下子灌輸給單純的工人和農民了。結果是，我們在人民大眾當中獲得了巨大的信任。這是革命開始時所必要的一個時期；沒有這個時期，我們便不能矗立在革命浪潮底最高峯，而要作爲尾巴了。沒有這個時期，想要在新的基礎上面成家立業的工人和農民便不會信賴我們了。但是這個時期現在



已經過去了，而我們却不願理解這一點。現在，如果我們還在發佈命令，創設或改變這個或那個機關，那麼農民和工人就會對我們加以嘲笑的。現在，一個單純的工人和農民，對這都已經不發生任何興趣了，他們是對的，因為在目前，重心已不在這裏了。現在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你，再不應拿這一點去接近人民了。雖然坐在國家機關裏面的我們，往往沉溺於瑣屑的事務工作，然而，這却不是我們必須把握的一環，問題底核心並不在這裏，而是在於人們被佈置得不適當，是在於一個極會幹革命的負責的共產黨員，現在竟要來幹他一竅不通的工商業工作了，而且他們還會妨礙我們看到事情底真相，因為在這些共產黨員底背後，往往隱藏着惡徒和騙子。問題底關鍵，就在於我們對於那執行的情形作一實際的檢查。這是一件平凡而微小的事情，這是一件小的事情；然而我們是生活在最偉大的政治變動之後，而且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即我們在若干時間內還要生存在資本主義制度當中，因之，主要的事情並不在於狹義的政治（在報紙上所談到的政治，只是一種政治上的妄談，其中連絲毫社會主義的氣味都沒有），主要的事情也不在於決議中，更不在於機關和改組。如果必要時，我們一定會這樣作的，然而不要拿這些東西走向人民；而挑選需要的人物，並檢查實際的執行情形。人民所重視的，正在這種地方。

在民衆當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民衆所意識到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

則，共產黨是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更不能領導廣大羣衆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坍台崩解了。在目前，一般人民和勞苦羣衆都視爲對他們自身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對於他們的絕望的貧困與飢餓予以實際的援助；並表明農民所需要和所習慣了的生活改善，確實在進行着。每個農民都知道市場和商業貿易。我們還不能採用直接的共產主義的分配方法。因爲爲了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工廠和裝備還是不夠的。由於這種原因，所以我們必須要經過商業的媒介將農民所需要的東西給予他們，而且要能夠和資本家一樣地給予他們；否則民衆對於這樣的管理，再不能忍受下去了。這就是目前形勢中的主要問題。如果再沒有什麼預期不到的事情發生，那麼這一點應在三個條件下面成爲我們在一九二二年工作中的最主要的核心。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沒有武裝干涉。爲了避免武裝干涉，我們曾進行了自己的外交，可是雖然如此，武裝干涉每天都是有可能的，我們應當切切實實地時加警戒，而且爲紅軍的利益計，我們應當忍受某種犧牲（不待說，我們是在一定限度之內忍受這種犧牲的）。和我們對立着的是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他們正在尋求殺死我們的方式。至於我們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則他們無非是資產階級底走卒。他們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財政危機不過於嚴重。財政危機日益逼近了。當我們討論到財政政策問題時，你們就會聽到這的。如果財政危機過於嚴重和困難的話，那麼，我們

勢將要把許多東西重新加以變更，將一切力量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如果財政危機不過於嚴重的話，那麼它甚至可能是有益處的：它會把一切國營託拉斯中的共產黨員加以刷新。只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樣作。財政危機將要震撼各個機關和企業，其中不勝任和不適當的，首先要坍台的。只是不要忘記，不要把一切責任都加到專門家的頭上去，以為凡負責的共產黨員，都是很好的，都是在前線上打過仗而且一向工作得很好的。因此，如果財政危機不過於深刻，那麼它在刷新商業機關中的一切共產黨員這一點上（不是像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檢查委員會那樣的刷新方法，而是依它應有的方法）倒是有利的。

第三個條件，就是要在這個時期當中，不犯任何政治上的錯誤。自然，如果我們確實犯了政治上的錯誤，那麼在這種場合，我們的一切經濟建設勢將分崩離析，而我們自身也不得不來從事糾正錯誤以及領導問題的爭論了。如果我們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的話，那麼在最近將來主要的任務，將不在於命令佈告，也不在於狹義的政治，更不在於機關以及這些機關的組織，——如果必要的話，負責的共產黨員與蘇維埃的機關會從事於這種工作的——，而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在於選擇適當的人物和檢查執行命令的情形。如果我們在這一關係上能夠學會一些東西，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作出一些實際有益的事情出來，那我們必能再一次地克服一切困難的。

最後，關於我們最高機關以及黨對於這些機關態度問

題底實際的方面再講幾句。在黨和蘇維埃機關之間，曾經造成了一種不正確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曾經向你們舉過一個實例，藉以表明人們如何把具體的小問題，竟提交到政治局去討論決定。要正式打破這一點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我國從事管理的只有一個唯一的政府黨，對於一個黨員的埋怨、控訴，不能加以禁止。因此，往往把人民委員會上議及的一切問題，又提到政治局裏面來了。關於這一點，主要地應該由我負責，因為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間的聯繫，大部份是經過我個人來保持的。當我迫不得已從工作上引退時，結果就使這兩個車輪不能一下子轉動了；爲了保持人民委員會與政治局的這種聯繫起見，加米業夫遂不得不肩起三重的負擔。因為在最近將來，我多半還很難於恢復工作，因此，一切希望便都寄託在以下這個事實上了，就是：在目前，我們設有兩個副主席——茨魯巴同志（他是德國人醫治好的）和李可夫同志（德國人簡直把他醫治得太好了）\*。結果判明，甚至德國的皇帝威廉，對我們是有益的；我並沒有期望這一點的。威廉有位外科醫生，這位醫生給李可夫同志施用了醫治的手術；他割去了他的最壞的一部份，留在德國，而把他的最好的部份保留下來，把他完全醫好之後送還給我們。如果這個辦法在將來能夠繼續下去，那麼事情是會進行得很好的。

---

\*茨魯巴和李可夫在不久以前曾在德國施行手術。

——俄文版編輯部註

開玩笑的話暫且拋在一邊，現在來說一兩句關於主要指令的問題吧。關於這一點，中央委員會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大會對這個問題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並批准下面的指示，就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須丟掉一切瑣屑的事情，提高負責的工作人員底工作。各個人民委員長必須對他們的工作負責，不應將這些問題首先提交人民委員會會議，其次又提交政治局。在形式上，我們不能廢止向中央委員會訴苦的權利，因為我們的黨是唯一的政府黨。不過，我們一定要停止將每一件小事都提交中央委員會去的習慣；我們一定要提高人民委員會底威信，使各個人民委員長——而不是副委員長——多多參加工作。就年來我未能作到的一點說來，應當改變人民委員會工作底性質；即對於檢查命令的執行一事，多加注意。我們將有另外的兩個副主席了，即李可夫同志及茨魯巴同志。李可夫在軍需品委員會工作時，曾推動了工作。茨魯巴曾經組織了我們最好的人民委員部之一。就執行命令和負責一點說來，如果他們兩人能以最大的注意力，用在加緊各個人民委員部的工作，那我們一定會獲得某些（即使是微小的）進步的。我們有十八個人民委員部；其中，約有十五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到處找不到很好的人民委員來，如果人們能更多地對這些問題加以注意，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李可夫同志必須成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委員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一員，因為在這兩個團體之間，一定要保持聯繫，否則主要機輪的轉動是無效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須要注意：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下的委員會數目，必須加以減少，以便它們能夠知道並解決它們自己的事情，而不要分裂為無數的委員會出來。在不幾天以前，曾實行清洗這些委員會。這樣的委員會有一百二十個。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必要的呢？只有十六個。然而這不是第一次的淘汰。那些領導的同志們對他們的工作並不負責任，不執行人民委員會議的決議，而且不知道他們對於這一點應當負責，他們隱藏在這些委員會的後面。在這些委員會裏面，就是鬼也想不出辦法來。任誰都不知道工作的進行究竟怎樣，不知道究竟誰應該負責；一切事情都弄得混淆起來，到了最後，一個決議通過了，依據這個決議，則一切人都應該負責。

因此，還必須指出，對於各特別區執行委員會，所附設的經濟會議底自治與活動，還須要加以擴大與發展。俄國行政上的劃分，在目前已依據科學的理由予以實施；經濟條件、氣候、社會條件、以及獲取燃料的條件、地方工業等等，一切一切都曾經考慮到了，根據這種劃分，曾建立起了區經濟會議和特別區經濟會議。自然，在某些地方對此加以變更是可以的，但是這些經濟會議的威信，則必須加以提高。

其次應當設法使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更有力地進行工

---

★勞動國防委員會係依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成立的。其任務在於調整並指導各個經濟人民委員會的活動。

作，更經常地循序舉行全體會議，此種全體會議的時間應當延長一點。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應該討論有時因無絕對必要而匆促提交到人民委員會議去的法律提案。最好是展緩這些議案的討論，使地方的工作人員去仔細思索這些議案。對於那些草擬這些議案的人們，則必須向他們提出更嚴格的要求。這一點我們還沒有做到。

如果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期限能夠延長一些，那麼這些會議就可以分為各組和小委員會，以便能更嚴密地檢查工作，並就我的意見看來，要力謀做到那能構成目前政治形勢底中心問題及根本要點：即將重心移到適當地選擇人物及檢查命令之實際的執行上面來。

應當意識下面這一點，而且我們一定不要害怕意識這一點，即是：在百分之九九的場合之下，那些負責的共產黨員所就任的職務，是他們現在還不適任的職務，必須要承認：他們還不能履行他們的責任，現在他們必須坐下來從頭學起。如果承認了這一點，而且，要是我們有着充足的學習的機會——就一般國際形勢判斷起來，我們是有時間來學習的——那麼無論如何，我們都要這樣幹的。

## 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 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同志們！大會的工作現在已近於完結了。

拿這一次代表大會與前一次代表大會加以比較時，首先看到的第一個區別，就是這一次代表大會的更大的團結性。更大的一致性、更大的組織上的統一性。

只有上一屆代表大會底一部份反對派之一小部份，曾將他們自己置身於黨外了。

關於職工會問題和新經濟政策問題，在我們黨內沒有發生爭論，或差不多沒有發生任何不同的意見。

我們在這一屆代表大會上所獲得的基本而主要的『新的』成就，就在於它提供了生動的證據，證明了我們敵人底不正確，他們不倦地再三斷言說，我們的黨已趨於衰老，我們的黨正在失去着它的智力之柔韌性和其全部有機體之柔韌性。

不，我們並沒有失去這種柔韌性。



根據俄國以及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我們應當前進，應當向敵人作勇敢、迅速而斷然的攻擊的時候，我們便作了那樣的攻擊。如果必要時，我們將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作下去的。

我們用這種方法會將我們的革命，提高到在世界上還是空前未有的崇高地位。地球上任何一種力量，無論它還能陷幾千萬幾萬萬的人民於何種災害、貧乏與痛苦的境地——但是它總不能奪回我們革命所得的基本勝利了。因為這些勝利現在已不是『我們的』勝利，而是全世界的歷史的勝利了。

當一九二一年春天判明我們革命底先鋒隊有脫離人民大眾、脫離農民羣衆（它應當靈活地領導他們前進）的危險的時候，我們就全體一致並堅決地決定實行退却。就整個說起來，在過去一年間，我們是以井然有條的革命的秩序實行退却的。

在一切先進國家裏邊，正在成熟着無產階級革命，這種革命，如果不能把英勇作戰和進攻的技能，與依良好的革命秩序進行退却的技能結合起來，則它將不能解決它的任務。我們革命底第一階段之經驗，即英勇進攻底經驗，毫無疑義的，對於各國的工人是適用的，同樣，我們鬪爭底第二階段之經驗，即退却之經驗，在將來，至少對於若干國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適用的。

現在，我們決定認為這種退却已經告終了。

這就是說，我們政策底全部任務，又依新的方式提出

來了。

現在，全部問題底中心就在於：先鋒隊不應懼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的任務，不應懼怕坦白承認自己修養之不夠，技能之不夠。現在，全部問題的中心就在於以無比廣泛與強大的整體前進，即不外與農民一齊前進，以行動、以實踐、並以經驗給他們證明看，我們是在學習，我們將學會去援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的。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之下，在目前的俄國生產力狀態之下，我們是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不過是很緩慢地、小心謹慎地、實事求是地來解決它，千百次地在實踐上檢驗每一步驟罷了。

即使在我們黨內，有某些聲浪反對這種極端緩慢與極端謹慎的進步，但是這些聲浪也只是一些孤立的聲浪而已。

整個的黨已經理解到，而且它現在正以行動證明，它已經理解到在目前惟有這樣建立自己工作之必要。我們既然已經理解了這一點，那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我們的目的的！

現在我宣佈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

## 給職工會第五次 全俄代表大會的信

親愛的同志們：

這是久病之後，我第一次向一個代表大會致詞——雖然是書面的。因此，請容許我僅限於向你們致熱烈的敬禮，並關於我們工業以及我們共和國底情勢和任務略講幾句。我們的情況是特別地困難的，因為我們缺乏恢復固定資本，即機器、工具、房屋等等的手段；而社會主義底主要基礎，又正是這種工業，所謂『重工業』。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通常是藉借債方式來恢復這種固定資本的。然而，除非我們恢復資本家及地主的私有財產，否則，人家是不願給我們借款的；但是這一點，我們是不能幹的，也不會這樣幹的。所留下的只有一條長遠而極端困難的道路，即是：慢慢地從事儲蓄，增加租稅，以便逐漸恢復被毀壞了的鐵路、機器及廠屋等等。現在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們一國，才是勞苦農民在工人領導之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堅決地拒絕資本家的領導，這些資本家，以各式各種關於

民主、自由等等的花言巧語為掩飾，而在實際上則是力謀鞏固資本家及地主底私有財產。創立區區少數富有者底統治，——這些區區少數富有者，曾經瓜分了整個世界，現在他們相互間又在為了重新瓜分世界、為了奴役幾萬萬比較落後的弱小民族的人民，而在鬭爭着。

只要我們孤立一天，那恢復我們國民經濟的任務，便一天非常沉着地擺在我們肩頭上。務須要使一切工人與農民竭盡全力工作；我們的國家機關，現時依然不够健全，務須加以改善，使之低廉，以便騰出一點力量，藉以改善勞苦羣衆底生活狀況，並逐漸地恢復我們的被帝國主義戰爭及國內戰爭所破壞了的經濟。

每個自覺的農民和工人——他們由受我們艱苦的生活條件之影響，或由於受我們國家建設過度緩慢之影響，有可能傾向於意志消沉——試回想一下最近過去資本家及地主統治的時期吧。這一回想一定能恢復他的工作勇氣的。用盡一切力量，加緊並改善我們在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唯一的保全工農政權的方法。謹致  
同志的敬禮！

V·烏理亞諾夫（列寧）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 在莫斯科蘇維埃 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同志們！我不能早些來出席你們的會議，覺得非常遺憾，非常抱歉。據我所知道的，在幾個星期以前，你們就準備給我一個參觀莫斯科蘇維埃的機會。但是我沒有作到這一點，因為在大病之後，從十二月起，用專家底名詞來說，在一個長久的期間，我失去了工作能力，由於工作能力之減少，我就不得不將我這次的演說，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延緩了。如你們所知道的，起初我曾經將工作底大部份，放置在茨魯巴（Tsurupa）同志底肩上，此後，又放在李可夫同志底肩上，到後來，又不得不將其餘的工作，放在加米業夫同志的肩上。可以說，打一個比喻（我剛用過的），加米業夫同志突然担负了雙重負擔，可以說——將我們的比喻繼續下去——加米業夫同志是一匹有能力的駿馬。然而我們却仍不能讓他負着兩重重荷，我焦急地期待着茨魯巴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回國的時期，以便屆時我們

能够將工作分配得更加公平一些。由於工作能力減低的緣故，我在審查各種事務上所用的時間，遠過於我一向所用者。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當我不得不完全卸脫工作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年底了。那時我們已經改行新經濟政策，同時那時判明，這一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我要說，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雖然從一九二一年年初起，我們已經改行新經濟政策了，從我們開始這個轉變以來，已經有十八個多月了，我認為現在應當是我們大多數的人應該依據新條件，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底條件，來重新佈置我們工作的時候了。

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的改變是最少的。在這一方面，我們仍繼續着我們從前已經所採取的方針，而且我以為我可以公正地說一句，我們把這一方針繼續得很澈底，而且有着極大的成功。關於這一點，無須給大家詳細報告：海參崴底收復及隨之而發生的示威運動，以及你們日前在報紙上讀到的國家聯邦宣言，都證明了並且很清楚地表明：我們在這一方面是不需要加以任何改變的。我們是走在一條明白規定了的道路上，我們已在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面前，保證了我們的勝利，雖然它們當中有幾個國家直到現在還在準備宣佈他們是不願與我們共桌而坐的。不過經濟關係以及外交關係都正在調整着，而且應當調整，必須調整的。凡企圖阻礙建立這種關係的國家，都有落後的危險，而且在某些極端重要的事情上面，有陷於不利地

位的危險。這一點，不僅從報紙上，而且在其它方面，現在我們都看得很明白了。我想，到外國去的同志們都能相信，所發生的變化是多麼巨大的。在這一點上，用一個舊的比喻來說，我們並沒有換車情事——既沒有改乘火車，也沒有改乘馬車。

如果說到我們的國內政策，那麼，在這裏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季曾換車一次——這次換車，是由於極端重要而確實的情況所使然的，當時在我們中間關於這一問題，並沒有發生任何爭論或意見的不同——所以，這次換車，現時還在繼續予我們以若干困難，而且我要說，它還在繼續予我們以極大的困難。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懷疑這種變化之必要——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生任何懷疑——這也不是因為我們對於採用新經濟政策的企圖能否給我們以所預期的成功一點，有所懷疑。我可以十分確定地說，不論在我們黨的隊伍中，或在廣大的非黨的工農羣衆的隊伍中，關於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懷疑的。

在這一點上，問題並未呈現出任何的困難。困難是由於以下的事實而發生的：即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其解決往往需要吸收新人物參加，需要採取特殊的手段和特殊的方法。我們之間有人關於這件或那件事情底正確性，關於這個或那個方向的變化，還有所懷疑；這裏必須指出，這兩者在相當長的時期，還會存留下去的。『新經濟政策！』一個多麼奇怪的名詞啊！這個政策所以稱做新經濟政策，是因為它是向後轉的。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退却，宛若向後

退一樣；然而我們之所以爲此，正是爲了開始後退，然後才能更有力地向前躍進。僅僅是在這一個條件之下，我們才後退而採取了新經濟政策。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應當在什麼地方，應當怎麼樣來重新配合、適應、和重新組織我們的力量，以便在我們退却之後，開始更頑強的向前進攻。爲了能够依照正常的次序進行所有這一切行動起見，正如俗諺所說的，在我們決定着手做以前，須要不只度量十次，而要度量一百次。爲了應付在解決我們的一切任務和問題的時候所遭遇到的難以置信的困難，我們就必須這樣作。爲了達到我們已經作過的地步，我們曾經遭受了多少犧牲，這一點你們是很知道的；同時你們都知道，國內戰爭曾經拖延到多麼長久，它曾經消耗了多少力量。所以，海參威底收復，已向我們表明了（海參威是離得很遠的，然而它是屬於我們的城市！），已向我們所有的人表明了一種傾向於我們，傾向於我們勝利的普遍願望。此處和彼處——兩者都是蘇俄的領土。這種願望，使我們解除了進攻我們的國內及國外的敵人。在這裏，我是指日本說的。

我們已經爭取到了一種很確定的外交環境，它不是別的，正是全世界所承認了的外交環境。這一切請你們聽吧。你們都看到了它底結果；然而爲了達到這一步，曾經需要多少時間啊！我們現在已經獲得了我們的敵人在經濟政策和商業政策上對我們權利的承認。商務協定的締結，便證明了這一點。



何以在我們走上所謂新經濟政策道路的一年半之後，竟會發見在這個道路上前進是這樣難以置信地困難，其原因我們是可以知道的。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底條件之下，這個國家所受戰爭的蹂躪是這樣之大，它逸出常軌是這樣之遠，它蒙受和忍受的損害是這麼之多，以致於我們現在不得不從微小微小的百分比，戰前的百分比，來開始我們的一切計算。我們把這個尺度應用於我們的生活條件中去，有時我們應用得很躁急、很激烈，而且總相信這裏有着無窮的困難。在這裏我們所提出的任務，跟普通的資產階級國家底條件比較起來，更顯得廣大。我們之所以提出這種任務，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不能期望很富足的國家對我們有所援助的（而這種援助在這種條件之下面是常有的）。在國內戰爭以後，人家把我們置在幾乎封鎖底條件之下了，換一句話說，人家告訴我們：『我們不能與你們建立我們通常所建立且為資本主義世界常所具有的那種經濟上的聯繫。』

自我們採取新經濟政策以來，已經有一年半多了，自從我們締結第一件國際條約以來，已經過去了很多很多的時間了。但是直到現在，整個資產階級和一切政府還在繼續對我們實施封鎖。當我們進入新的經濟情況中時，我們不能期望任何別的東西，但是我們對於採用新經濟政策的必要，以及對於我們能够自力更生地達到成功的目的這一點，却沒有任何的懷疑。時間愈久，則愈明白：資本主義國家過去曾經給我們及將來它們將給我們的任何幫助，

不僅不剷除這種條件；而且，在大多數的場合之下，它多半還要加強這種條件，還要加劇這種條件的。『孤立無援』，我們向我們自己這樣說。『孤立無援』——和我們有交易往來，和我們訂立契約、及和我們已經開始談判的幾乎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這樣說。特殊的困難，也就在這裏。我們應當意識到這種困難。在三年以上的極端艱苦與英勇的工作中，我們已經建立起了我們的國家制度。在我們迄今所生存於其中的條件下面，我們從未返躬自問：我們不會破壞得太厲害吧？我們從未返躬自問：不會犧牲很多吧？——因為犧牲太多了，因為我們當時所開始的鬭爭（這一點你們都知道得很清楚，在這裏我沒有加以詳細敘述的必要），乃是反對舊社會制度的生死的鬭爭，而我們之反對這個舊社會制度，又是給我們自身爭取生存與和平發展的權利。我們已經獲得了這種權利了。說這樣話的人，不僅僅是我們；也不僅僅是可以被指為同情我們的那些目擊的證人。不，不是這樣的，在大多數場合之下，這一點並不是同情於我們（這自然囉），而是同情於鄧尼金，同情於海參崴的英雄們，同情於佔領地等等的英雄們的那般人所承認了的。現在我們在很仔細地注意我們的任務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理解：現在主要的任務，乃是不放棄已得的舊的勝利。我們是不會放棄我們舊的勝利當中的任何一種的。同時，我們又站在一種完全新的任務之面前；舊的老的可能成爲一種障礙。這一種任務，是最難理解的。但是爲了要學會怎樣工作起見，我們必須要理解它；而且在必要的

時候，還要完全翻轉過來。同志們！我想，這些話和口號是明白易解的，因為在我迫不得已而離開的將近一年的期間當中，在你們手裏既然存在着這種具體的任務，你們就不得不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並爲了種種的原因，對它加以討論和思考。我確信關於這一點的深思考慮，只能使你們達到一個結論，就是：現在要求我們還須有更多柔韌性，這種柔韌性我們從前在國內戰爭底競技上早已顯示過了。

我們不應拋棄掉老的舊的。我們曾經作了好多讓步，這些讓步使我們與資本主義列強立於同等地位，這些讓步使得這些列強能夠和我們建立關係，保證了它們的利潤——有的時候，甚或保證了它們可以獲取較它們在權利範圍以內可以得到的更大的利潤。在不幾天以前，報紙上曾經討論了英人烏爾夸特(Urquhart)所提議的租讓問題，而烏爾夸特則直至最近爲止，在國內戰爭中差不多始終都是反對我們的。他說道：『在反對俄羅斯的國內戰爭中，在反對竟敢於剝奪了我們某些某些東西的那個俄羅斯本身的國內戰爭中，我們將會達到我們的目的。』但此後，我們却不得不與他有所來往了。我們並未拒絕他們，而且我們以莫大的愉快接受了他們；可是我們說：『請原諒吧，那我們已經爭取到的東西我們是不願交回的。我們的俄羅斯是遼闊廣大的，我們的經濟可能性又是衆多的，我們認爲自己不拒絕你們的親切的提議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像冷酷的商人一樣要討論它們的。』誠然，我們初次的談話是毫無結果的，因為由於政治上的理由，我們不能夠同意他

的提議。我們只好報之以拒絕。只要英國人不承認我們參與討論韃靼尼爾海峽問題的權利一天，我們應當報之以拒絕，但是，在我們拒絕這種提議之後，我們就應當立刻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底實質。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對我們是否有利，締結這種租讓，對我們是否有利，要是有利，那麼應當在什麼條件之下。我們還應該討論到代價的問題。同志們！這正明白地表明出：我們現在看問題的方法，與我們從前看問題的方法比較起來，有着怎樣的不同。從前一個共產黨人說：『我要獻身革命』，這在他看起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雖然這往往並不是那麼簡單的。現在擺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的，却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任務了。現在我們應當打算到一切事情，而你們之中每個人也都應當學會怎樣去打算。我們必須打算一下：在資本主義環境之下，我們怎樣才能保證我們的生存，怎樣才能從我們的敵人那裏獲得利益；而我們的敵人，自然，是要做生意的，他們從沒有忘記怎樣討價還價，而且他們將議價還價以取償於我們。我們並不忘記這一點，我們並不幻想：某一商業底代表者會一變而為羔羊，在變成羔羊之後，他們會無報償地給我們厚施恩惠的。這種事情是絕不會有的，而我們也不希望這一點，我們所期望的，則是我們既已習慣於抵抗，而且在這裏我們既已脫離困難，那麼我們就有能力經商、獲利、跳出困難的經濟局面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我們應當為完成這一任務而努力。我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明白地理解到：在新的與舊的之間，究竟存

在着多麼大的鴻溝。不論這條鴻溝有多麼大，但是我們還必須理解（雖然我們在戰爭中已學會了戰術的運用），我們現時所面對着的策略運用，我們現時所參與其中的策略運用，乃是一切策略運用當中最困難的一個。然而唯其如此，這次的策略運用，又顯然是最後的一次。我們應當在這裏考驗自己的力量，並表明我們不僅是在背誦我們昨天所學到的科學，我們不僅是在重溫舊的功課。請原諒吧，我們已經開始重新學習，而且將要學習下去，以便能達到確定而顯著的成功。並且我以爲，爲了這種重新學習起見，現在我們應當再一次彼此堅決地宣誓：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名稱之下是向後轉了，而且我們之向後轉爲的是不放棄任何新的東西，同時又爲的給資本家以這樣的利益，這種利益可迫使每個國家，不管它如何地敵視我們，來和我們發生交易和來往，克拉辛同志曾經與烏爾夸特——這位武裝干涉底領袖和堡壘——作過多次談話；他說烏爾夸特在盡了最大努力企圖在俄國恢復舊制度之後，竟與他（克拉辛）共桌而坐，並且開始說道：『什麼代價呢？多少呢？多少年呢？』這雖然距簽定好多租讓協定，從而進入十分確切而不可動搖的（從資產階級社會的觀點看來）條約關係還很遠，但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已經接近了這一點，我們差不多已經接近了這一點，然而還沒有到達罷了。同志們！這是應當承認的，不可自大自滿。我們距完全達到使我們足夠健強、獨立、與非常有把握的地步還遠得很，這裏所謂非常有把握，就是我們不懼怕任何資本

主義交易，而確信不論交易怎樣困難，但是我們都可以締結，都可以洞悉它底實質，並予以解決的。因此，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開始了的政治的工作與黨的工作，仍須繼續下去，因此，我們務須拋棄舊方法而採用絕對新的方法。

我們還保留下了舊的機關；現在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依據新的路綫來改組這些機關。我們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一點作到，然而我們必須這樣來佈置事情，就是把我們所有的共產黨員，加以適當的分配。須要使這些共產黨員成爲那些機關底主人，不要變成這些機關底奴隸——如同目前往往所作的那樣。掩飾這一點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公開地承認這一點。正當我們踏上商業道路，正當我們不把社會主義當作莊重繪好的偶像來處理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與困難，就是這樣的。我們必須要採取正確的方向，我們須要把一切東西加以檢查，我們必須要廣大的羣衆，全國人民把我們的道路，檢查一下，使他們能夠說：『是的，這比舊的制度好的多了。』我們所加與我們自身的任務，就是這樣的。我們的黨，和全國人口比較起來，只是一個小小的集團，然而它已經擔負起這個任務了。這一沙粒，居然樹立了改造一切的任務，而且它已在改造着。我們已經證明：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一件人們正在努力企求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都看到了這一點；這已經是完成了的。須要這樣來改造一切，就是使大多數的勞苦者，大多數的工農羣衆，都能夠說：『並不是你們稱揚你們自己，而是我們稱揚你們。我們是說：你們已經達

到了至善至美的結果，此後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決不會再夢想返回到舊制度去了。』但目前還不是這樣的情形。所以，新經濟政策仍舊繼續成爲今日主要的、迫切的、超乎一切的口號。我們切不可忘記昨天所學到的任何一個口號。我們可以很冷靜地、絲毫不躊躇地向任何人說到這一點；我們所採取的每一步驟也證明這一點。但是我們仍應使我們自己適應於新經濟政策。我們須要善於改正新經濟政策底一切壞的方面——這些方面，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這裏無需加以列舉了——要善於將這些壞的方面減低到一定的最小限度；要善於細心地安排一切。我們的立法便給了我們以能够這樣作的一切機會。我們是否能够適當地佈置工作呢？這個問題還依然完全沒有解決。我們正在研究它。我們黨報底每一期，都有着不下十篇這樣的文章，這些文章都說，在某某工廠裏邊，某某工廠主有着某種租借條件，但在經理是我們共產黨員同志的地方，也有這樣的條件。那是否有收入呢？那是否合算呢？我們已經到達了日常工作問題底關鍵，這是一種巨大的收穫。現在社會主義已不是遼遠的將來底問題，也不是一張抽象的圖畫，或一個偶像了。關於偶像我們依然還保留着那種舊的非常不好的意見。我們已將社會主義導入於日常生活之中了，這裏，我們須要善自處己，無惑於事。這就是我們目前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時代底任務。請容我用表明以下確信的方法來結束我的說話吧：不論這個任務是如何的困難，不論它和我們以前的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的新，不論這

---

個任務會予我們以怎樣多的困難，但是我們大家不是在明天一天之內，而是在幾年的期間一定能够完成這個任務的，我們一定能够使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的。



## 我們應如何改組工農檢查院

——向第十二次黨的代表大會提出的一個建議——

無疑地，工農檢查院對於我們是一種非常巨大的困難，這種困難，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我想，那些正在解決這種困難的同志們，否認工農檢查院底有用和必要，是錯誤的。但是，同時，我却並不否認，關於我們的國家機關以及改善這個機關的問題，乃是一個非常困難、還遠沒有得到解決、而同時又極端迫切的問題。

除外交人民委員部之外，我們的國家機關大都是舊國家機關底遺物，它極少受到重大的改變。我們的國家機關只是在表面上輕輕地加以潤色，而在一切其他方面，它是我們舊的國家機關中的最典型的舊東西。爲了尋求真正刷新這個國家機關的方法起見，我以爲我們必須對於我們國內戰爭的經驗加以注意。

在國內戰爭最危險的時機，我們是怎樣行動的呢？

我們將我們黨的最優秀的力量，集中到紅軍裏面去；我們動員了我們最優秀的工人；我們在作爲我們專政底最

深根基的地方去找尋新的力量。

據我的信念，我們必須依同樣方法來求得改組工農檢查院之道。我建議我們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應當採用下面的改組計劃，這個計劃是以我們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之特殊的擴大為基礎的。

我黨中央委員會底全體會議，已經顯示了一種它要發展而成爲類似最高的黨的代表會議的趨勢。它平均每兩月不過開會一次，而中央委員會的經常工作，如一般所知，是由我們的政治局、我們的組織局、以及我們的書記處等等來進行的。我認爲，我們應當走完我們這樣走上的道路，將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完全變爲一種最高的黨的代表會議，每兩月召開會議一次，中央監察委員會亦得列席。中央監察委員會則必須依照以下的方針，與改組了的工農檢查院底基本部份合併起來。

我建議代表大會應從工人和農民當中，選出七十五到一百個人，作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底新的委員。被選出的人與中央委員會的普通委員一樣，在黨的方面應受同樣的審查，因爲他們將與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享有同等權利的。

另一方面，工農檢查院底全部工作人員，則必須減至三百名至四百名。這些人在正大無私以及在關於我們國家機關的知識方面，加以考驗，此外，對於他們的關於一般科學的勞動組織原則的知識，特別是關於行政工作與事務工作原則的知識，須加以特殊的考驗。

根據我的意見，工農檢查院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這一

合併，將有利於這兩個機關。一方面，工農檢查院可以因此而取得崇高的威信，至少它將不亞於外交人民委員部。而另一方面，我們的中央委員會，連同中央監察委員會，則將澈底走上變為高級黨的代表會議的道路；在本質上它已經走上這個道路了，而且在兩種關係上，為了能夠適當地完成自己的任務起見，它也應該將這個道路進行到底，這兩種關係，第一就是：它的組織和工作底有計劃性、合目的性及有系統性；第二就是經過我們最優秀的工人和農民而與真正廣大的羣衆所保持的聯繫。

我預料將有一種反對的意見，這種反對意見不是直接地便是間接地從那些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成為陳腐機關的範圍出發的，這就是說，抱此種反對意見的人，正是主張以至今存在的那種不可能與不適當的革命前的方式來保存我們機關的人們（順便說一下，我們現在竟有了歷史上所罕有的機會來規定為產生激烈的社會變革所必要的時期了，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五年之間能夠作出什麼來，究竟什麼需要更多的時間）。

這種反對意見是這樣的，即是認為我所建議的那種刷新工作似乎將要招致一種混亂的狀態；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將徬徨在一切機關底周圍，不知道到何處去，也不知道幹什麼，更不知道走向什麼人，一定要到處引起無組織的狀態，使工作人員離開他們的經常工作，等等，等等。

我認為，這種反對意見底惡毒的原意是十分明顯的，

實在沒有加以答覆的必要。用不着說，中央監察委員會底主席團、工農檢查院底人民委員及其參事會（在這種場合之下，以及我們中央委員會底書記處），爲了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共同正確地組織他們的人民委員部和它的工作起見，將需要一年以上的頑強的工作。根據我的意見，工農檢查院的人民委員及其全體參事會，仍能（而且應當）保持這樣的狀態，來領導整個工農檢查院的工作；連歸他『派遣』的全體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也包括在內。依照我的計劃，保留下來的工農檢查院的三四百工作人員，一方面應該執行工農檢查院其他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補充委員下的純粹祕書的工作；別一方面，他們應當是高度熟練、經過特別考驗及特別可靠的，他們可以有很高的薪金，以便使他們可以完全脫離工農檢查院工作人員目前那種確實不幸的（這是從輕的說法）情況。

我確信，如將全部工作人員減少到我所說的那個數目，可以把工農檢查院工作人員底品質和它全部工作的品質改善好多倍；同時，它又可使人民委員及其參事會得以把他們的力量完全集中到組織工作以及系統地與堅實地提高這種工作的品質上去；這種事情，對於我們的工農政權和我們的蘇維埃制度，是極端必要的。

在另一方面，我並且認爲，工農檢查院的人民委員，應該研究一下，將高級的勞動組織研究所（中央勞動研究所、科學勞動組織研究所，等等），有的加以合併，有的加以調整。這樣的究研機關，在我們的共和國裏面，有不下十

二個之多。過度的單調和因此而產生的合併的想望，將成爲有害的事情。相反的，在這裏應當在合併所有這一切機關而爲一個與在這些機關中每個相當獨立條件之下將它們劃分適當的界綫之間，找出一個合理而適宜的中間東西。

無疑地，就與羣衆的聯繫說來，就其工作底規律性與有效性說來，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從這種刷新當中所獲得的利益，將不下於工農檢查院所獲得的利益。到那個時候，政治局底會議將會有（而且應當）更嚴密與更負責的準備，一定數目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在一定期間當中或依照一定的組織計劃，亦可出席這種會議。

工農檢查院底人民委員，應協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這樣來分配它的各位委員底工作，就是使他們當中有的有出席政治局會議和審查提到政治局批閱的一切文件之責任，有的有分出工作時間致力於理論修養、及科學勞動組織研究之責任，有的有實際參加監督與改善我們國家機關——自上級的國家機關起，到下級的地方機關止等等——之責任。

我又認爲，中央委員會底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底委員，由於這種改革的結果，將更能好多倍地明瞭各方面的情形，將更能好多倍地準備政治局底會議（凡有關於在這些會議上所要討論的一切文件，必須在政治局會議前一日，送交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切委員；惟極端迫切的場合則爲例外，但這時須有通知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特殊方法以及解決這些事件的特殊方法）

——除這些政治上的利益之外，還產生了一種利益。這種利益，就是：對於我們中央委員會之純粹個人的與偶然的情景底影響，將要減少了，因而分裂底危險也減少了。

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已成長為一個嚴格集中化了的和有高度權威的集團，但這個集團底工作，還不是在適合於此種權威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我所建議的那種改革，將能除去這種缺點，以一定人數須出席政治局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應當形成一個堅實而嚴密的集團；這個集團，要『不顧面子』，從事注意無論什麼人底威權，都不能妨礙到他們提出質問、查看一切文件、及一般地保持自身能夠獲得一切事情的通報和監督事務之是否適當地進行。

自然，在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裏面，社會制度是以兩個階級——工人與農民——底合作為基礎的；在農民當中，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允許有新經濟政策下的致富份子即資產階級了。如果在這些階級之間發生了嚴重的階級的爭端，那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樣一種分裂底根據，並沒有必然地奠基在我們的社會制度裏面；我們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黨底主要任務，即在於要對可以促使分裂的那種情況，加以極密切的注意，並設法阻止之，因為歸根到底，我們共和國的命運，將決定於下面這一點，即：農民羣衆是跟工人階級一同前進，並忠實地保持他們與工人階級的聯盟呢，還是他們容許新的資產階級在自己與工人階級之間進行分裂，使自己離開工人階級。我們愈是明白地看到這二者必取其一的道路，我們

---

的一切工人和農民愈是清楚地理解到這一點，則我們避免分裂的機會亦愈多；這種分裂，是足以致蘇維埃共和國於死命的。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 寧 少 勿 濫

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的問題上，我的意見認為，工農檢查院不應追求在量的方面的發展，並且不要操之過急。一直到此刻為止，關於我們國家機關的質的方面，我們很少予以深思和關心，因之在現時，對於我們國家機關底特別認真的修養之關懷，並將具有真正現代品質——這就是說，不亞於最好的西歐模範的質量——的人材集中到工農檢查院裏面，這將是十分正當的事情。對於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來說，自然，這種條件是太遜色了；但是，最初的五年簡直已經把不信任和懷疑塞滿我們的腦袋了。我們不禁不由己地將不信任和懷疑，加到那些人的身上去，那些人，例如說，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是說得很漂亮，很了不起的；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只要有真正的資產階級的文化就足够的了；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只要沒有資產階級以前的特別凶惡的文化，即官僚主義的文化，或農奴的文化，等等，那就好了。在關於文化的問題上面，急躁與忙亂乃是最有害的事情。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許多青年的



著作家與共產黨員，應當好好地思索一下。

如是，關於國家機關的問題，我們現在應當從我們過去的經驗當中得出以下的結論，這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面，最好還是進行得緩慢一些。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竟是這樣的可憐——更不要說是可憎的了——，以致於我們開頭須要緊密地思考一下，怎樣來與它的缺陷作鬭爭，在這裏，我們要記牢，這些缺陷底根源是在於過去，而過去的東西雖然已經顛覆了，但是還沒有消滅淨盡，它還沒有置在變成遙遠的過去的過去之階段以內。正是在這裏我提出了關於文化的問題，因為在這些事情上面，我們應當認為只有在文化中、在社會生活中、在習俗中被吸收和融化了的東西，才算是達到了的成就。可以說：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的最好的東西，還沒有被人好好地思索過，還沒有被人好好地理解過，還沒有被人好好地體會到，只是被急忙地抓來的，並沒有為經驗所檢驗過、所考驗過、所證實過，並沒有鞏固起來，等等。自然，這在革命的時代，這在使我們於五年之內從沙皇制度轉到蘇維埃制度的這樣的急劇變動之下，是不能不如此的。

我們須要及時地醒悟。對於過於迅速的進步，對於任何誇張，等等，我們都須要加以有益的懷疑，須要想到，對於我們每一小時所宣佈、每一分鐘所作、以及後來每分鐘都證明它們不大牢固、不大堅實、不可理解的前進步驟，都要加以檢查。在這裏最有害的，莫過於急躁。最有害的，莫過於依賴於這樣的假定之上，即以爲我們知道很

多東西，或依賴於這樣的假定之上，以為我們有着足以建立一個真正新的國家機關——這個機關將真正能當社會主義、蘇維埃等名而無愧——的任何大量的要素。

不，這樣的機關，甚至這種機關的要素在我們還是少得很可笑的。我們必須記牢：建立這樣的機關要不吝惜時間，而要花費很多很多年的光陰的。

在建立這樣的機關上，我們所有的要素是什麼呢？這只有兩個。第一，就是為爭取社會主義鬭爭所吸引的工人。這些份子所受的教育還是不夠的。他們很願意為我們建立起更好的機關來，但是他們不知道應當怎樣去作。他們是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他們自己迄今還沒有造成為進行這種工作所必要的這種發展，這種文化；然而為了進行這種工作所必需的東西，却恰恰就是文化。在這裏，武斷或突擊，大胆或勇猛，或是一般任何最好的人類的品質，都是無濟於事的。第二，就是知識、教育、及學習底要素，不過，和一切別的国家比較起來，我們的這些要素是非常不足道的，是小得可笑的。

同樣，在這裏，不要忘記：我們還傾向於太熱心，還太心急地；等等，來補償這些知識了（或者是太傾向於設想我們可以補償這些知識了）。

為了刷新我們的國家機關起見，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向我們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即：第一，學習，第二，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然後加以檢查，以便使我們的科學，不致於成為死的字句，或時髦的詞句（在我們之間，這種

情形是時常發生的，這一點實毋庸掩飾），以便使科學真正變成爲我們生活的血肉，實實在在地而且完全地變成爲我們生活的一個構成要素。總之，我們所要提出的，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所提出的那些要求，而是鄭重地和正當地向那以發展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度爲己任的國度所提出的要求。

從上面所說的那些話裏面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使改善我們國家機關底武器——工農檢查院成爲一個真正模範的機關。

爲了使它能夠達到必要的水平起見，則須要遵從這樣的規則：『在你剪布以前，先要把你的布量七次。』

爲了達這一目的，就必須以最大的謹慎、思慮、和知識，把我們社會制度中所有的最好的東西，應用於建立新的人民委員部。

爲達這一目的起見，須要使我們社會制度中所有的最好的份子，亦即第一，先進的工人，及第二，真正有教養的份子（對於這些人，我們能夠保證他們不致於言而不行，不會說出任何一句違反良心的話），爲了達到鄭重地向自己提出的目的，不要害怕任何困難，不要畏避任何的鬭爭。

我們忙碌於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已有五年的時間了，然而這只是忙碌奔走而已；在過去的五年間，這種忙碌奔走只是證明了它的沒有用處，或者甚而至於證明了它的徒勞無功，或者甚至證明了它的有害。這種忙碌奔走，

只造成了工作底表面；然而在事實上，它只是填塞了我們的機關，填塞了我們的腦筋罷了。

在現在這種時候，這種情形應當加以改變了。

須要遵從這種定則：『量不妨少一點，但質須要好些。』須要遵從這種定則：『在兩年間，甚而至於在三年間得到良好的人材，較之在匆迫中從事工作而沒有得到任何人材的希望，實在要好些。』

我知道，遵從這個定則，並將這個定則應用到我們的情況中來，這將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我知道，相反的定則將會經由千百個孔穴或漏洞在我們中間盛行起來。我知道，在這裏將來須要予以巨大的抵抗力，須要顯示出極度的頑強性、持久性，而至少在起頭數年，這裏的工作將會是非常無益的；可是我却確信，只有用這樣的工作，我們才能够達到我們的目的，只有在達到這樣的目的之後，我們才能够創立起一個真正配得上稱作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等等名稱的共和國。

或許，許多讀者以為我在第一篇文章★裏面所舉的作為例子的那些數目字，是太小了。我相信，為了證明這些數目字之不够，可以作出許多估計或計算來。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把一件事情放在所有這些以及別的計算之上，這件事情就是真正可為模範的品質底利益。

我認為，就我們的國家機關而言，這樣的時候現在終

★指『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而言。

於來到了，這時，我們應當在這上面適當地、非常認真地來工作，這時，這種工作之最壞的特徵，便是匆促。這就是爲什麼對於增大這些數目字，我要給以強烈警告的理由。相反地，在我的意見看來，對於數目字，我們倒必須特別節用才對。我們不妨坦白地說，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目前沒有享有一點威權底影兒。人人都知道，比我們工農檢查院組織得更壞的機關是再沒有的了，人人知道，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面，從這個人民委員部是任何東西都期望不到的。如果我們真正想要樹立一個目的，要在幾年之內建立起這樣一個機關——這個機關，第一，將成爲足爲模範的機關；第二，它能取得每一個人的絕對的信賴；第三，它將向一切的各色各種的人們證明，我們已經有效地證明了如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一個最高機關底工作底正當——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把上面這一點，深深地記在腦筋裏面。在我的意見看來，我們應當一下子並且不可挽回地拋棄任何一般的公務員人數標準。工農檢查院的工作人員，我們必須根據最嚴格的考驗，加以特別小心的選擇。事實上，建立這樣一個人民委員部，在它裏面，工作多少總算是進行着，但它却享受不到人們絲毫的信任，它所說的話僅享有極端微小的威權——這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我認爲，我們主要的任務，就在於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造工作當中，盡力避免這一點。

我們吸引來當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那些工人們，必須是毫無瑕疵的共產黨員，而且我認爲，還應當長期地訓

練他們，教給他們學習他們工作的方法和目的。其次，在這種工作中，還須有一定數目的祕書來做助手，這些人，在委任他們擔任職務以前，須要給以數度的考驗。最後，我們決定以例外方式，一下子置於工農檢查院工作人員地位的那些公務人員，須要合乎下列的條件：

第一，他們必須經過幾個共產黨員的推薦；

第二，他們必須經過一種關於我們國家機關的知識的考試；

第三，他們必須經過一種關於我們國家機關問題理論原則，關於行政管理科學的原則，關於公事事務程序等等方面的知識之考試；

第四，他們須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及其祕書處協同工作，以便我們能夠對於這個整個機關的工作，加以保證。

我知道，這些要求須要以特別巨大的努力為前提，而且我很害怕工農檢查院裏的大多數『實行家』，將會說這些要求是辦不到的，而對這些要求加以蔑視，漠然置之。我却要問現在工農檢查院的任何一個領導者，或任何與它多少發生一些聯繫的人，他能不能衷心地告訴我：在實踐上像工農檢查院這樣一個人民委員部，它的必要性是什麼呢？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幫助他去獲得一種對比底知識或感覺。或者是根本就不值得去從事我們所常有的許多改組工作之一，如像幹改組工農檢查院這樣沒有希望的事情；或者是我們用緩慢的、艱苦的、不平常的方法，並用

經無數次的考驗，來真正地給自己樹立一個任務，以便創立一種真正足為模範的機關，這個機關，不僅因為地位和名稱要求如此，而能獲得一切的各式各種人的敬重。

如果我們不能忍耐，如果我們不打算在這個任務上面花費幾年的時間，那麼，最好我們還是不要從事這種工作了。

在我的意見認為，應當從我們關於最高勞動研究所等等所倉促成立的機關中，僅僅選取最低限度的少數，檢查它們是否佈置得適當，並使之繼續工作，以便這樣工作能夠真正與現代科學的高度水平齊平，並給予我們以它的一切保證。那時，在幾年之內，我們將會毫不空想地希望獲得這樣一種機關，——這個機關將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即它能夠有系統地，百折不回地從事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而享有工人階級、俄國共產黨、以及我們共和國全體人民大眾底信任。

對此事的準備工作，現在就可以開始了。如果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同意目前刷新底計劃，那麼它現在就可以進行準備的步驟，以便不慌不忙，也不放棄對一度作過者之改進，而有系統地工作下去，直至這個任務完成為止。

在這裏，任何不澈底的解決，都是絕對有害的。在實質上，以任何其他考慮為出發的工農檢查院公務人員的任何標準，都不外是以舊的官僚主義的考慮，以舊的古老的偏見，以已經被加譴責而引來嘲笑的东西等等為根據的。

在實質上，在這裏問題，是這樣的：

或者是我們現時證明給人們看，我們在國家建設上已經認真地學會了某些東西（在五年中間，學會某些東西並不是毛病）；或者是我們證明給人們看，我們對此還沒有成熟到足夠的程度。如果情形竟如後者，那不值得担負起這一任務了。

我認爲，在我們現有的這種人力之下，假定我們已經學會足以有系統地重新來建立起一個人民委員部，那並不算過分的。真的，這個人民委員部將要成爲我們整個國家機關的模範的。

現在應當立刻宣佈競賽，要編纂出兩部或兩部以上的關於一般勞動組織，特別是關於行政管理工作組織的教科書。這可拿我們已經有的耶耳曼斯基的書作爲基礎，雖然在這裏必須順便指出，他是顯然同情於孟塞維主義，而不適合於編著蘇維埃政權所用的教科書的。其次，可以克爾任柴夫的書作爲基礎；最後，現有的部份的教科書中，有些還可以適用的。

可資送幾個有修養和公正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搜集文獻，並研究這個問題。若資送人們到美國或加拿大去成爲不可能時，我便舉出英國。

可設立一個委員會，來起草工農檢查院候補工作人員考試用的最初計劃；同樣地，爲中央檢查委員會的候補者，也須草成這樣的一個計劃。

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辦法，不論對於工農檢查院的人民委員，或者對於它的參事會委員，或者是對於中央監察



委員會的主席團，都不會招致任何的困難。

同時，須成立一個預備委員會，來選擇可以充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候補者。我希望，我們在現時，能夠從一切機關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中間以及從我們蘇維埃學校的學生中間，為這個位置找到足夠的候補者來。事先，排斥這兩類當中的任何一類，都是不對的。或許，可讓這個機關有多樣的成份，這種成份將結合好多品質，將結合各種不同的特長。因此，在這裏擬定候補者名單這個任務，將需要很大的工作。例如，要是一個新的人民委員部，統由一種類型的人，比方說，統由具有官僚派頭的一類人來組成，不是把具有鼓動者性格的人除外，便是把其主要特色為擅長交際，或具有打入某種圈子中去的的那種人——而這種圈子，却往往為彼種典型的工作者所不能打入進去的——等等，等等除外，這自然是一種不應有的事情。

× × ×

我想，如果我把我的計劃拿來與一個研究院型底機關加以對照，那我將我的意見說得最好。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們，在其主席團底領導之下，將來應該有系統地審查政治局底一切文件。同時，他們在檢查我們機關——自很小的、私人的機關起，到最高級的國家機關止——事務底各種工作上，也必須適當地分配他們的時間。最後，對於理論的研究，即對於他們意欲獻身的工作組織之理論的研究，以及或是在老同志領導下，或是在最高勞動組織研究

所教師領導下的實際工作，都屬於他們的工作範疇以內。

可是，我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只以這種研究院式的工作爲限。除此以外，他們還應當準備以下這種工作，這種工作，我毫不客氣地把它叫做訓練捕捉騙子手之類——我不說是騙子手，然而却是和它類似的東西——，以及想出特別計策以掩蔽自己行動、辦法等的工作。

要是這樣的建議在西歐的機關裏邊，會引起空前的憤慨，引起道德上的憤怒底感覺等等的話，那麼我希望，我們還不要這樣的官僚主義化，以致於能夠作出那樣的事情出來。我們的新經濟政策還沒有能夠獲得人們的這樣的尊重，就是在這裏可以捕捉某人的念頭之下，會感到一種不快。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是不久以前才建立起來的，而且我們還堆着這樣一堆廢物，就是在下面這種想法之下，很難引起任何人的不快，這種想法就是：在這種廢物中間，藉某種詭計的帮助，藉偵察工作（有時會達到十分遙遠的根源）的帮助，或經迂迴的道路，尙可進行挖掘工作，即使引起某人的不快，那麼我們也可以相信，這樣的一個人，是會成爲衆人的笑柄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新的工農檢查院，將不會有如法國人所謂『Pruderie』的那種品質，這種品質，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可笑的輕薄，或者是可笑的虛誇；這種品質，乃是我們蘇維埃的以及黨的官僚主義的拿手好戲。這裏，可以順便說一下，就是我們不僅在蘇維埃的機關裏面，而且也在黨的機關裏面，都有着官僚主義。

我在上面曾說，我們必須在最高勞動組織研究所中學習、再學習等等，這並不是說，我是以學校方式來理解『學習』二字的，或者說，我只是以學校式的學習的念頭爲限。我希望，任何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不要懷疑我，說我在這種場合之下，竟會拒絕把『學習』這種字眼，了解爲使用某些半滑稽的手段，了解爲使用某些巧妙的辦法、某種詐欺手段、或某種與此類似的東西。我知道，在西歐那種端莊和嚴肅的國家裏面，這樣一種念頭，會引起人們的反感和驚異的，任何一個規矩的官吏，都甚至不會同意允許討論有這種念頭的。我希望，我們還不要這樣的官僚化，我希望，這種念頭的討論，在我們之間，能引起娛樂愉悅之感。

真的，爲什麼不把使人們高興的東西和有用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呢？爲什麼不利用某種滑稽的或半滑稽的計策，來揭穿某些可笑的、某些有害的、某些半可笑的、和某些半有害的等等東西呢？

我認爲，如果我們的工農檢查院對這些主張能加以考慮的話，那麼它將會得到很大的收穫的；同時，我認爲我們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工農檢查院參事會，所藉以獲得他們某些最光榮的勝利的一連串的計策，將由於我們的未來的檢查院主義者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義者在優雅而呆板的教科書裏面未曾完全述及的地方的冒險而大大豐富起來的。

×

×

×

怎樣能够把一個黨的機關和一個蘇維埃機關合起來呢？在這裏有沒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呢？

我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代表我自己提出，而是代表我在上面——當我說到，我們不僅在蘇維埃的機關裏面，並且在我們黨的機關裏面，都有着官僚主義者的時候——所示意的那些人提出的。

可是，如果這是爲我們工作的利益所要求的話，那麼，當真，我們爲什麼不應當把這兩個機關聯合在一起呢？我們不是都已經看到，像在外交人民委員部這種機關中，這種合併曾經是非常有益的嗎？它不是從最初起就這樣實施的麼？關於我們爲回答國外列強的『行動』所應採取之『行動』，俾得預防它們的奸計（如果我們不使用一個較此更加不敬的名詞的話）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從黨的觀點在政治局裏面談論過嗎？難道蘇維埃機關與黨的機關底這種靈活的聯合，不是我們政治當中偉大力量的一種源泉嗎？我認爲，凡是已經證明其自身是正當的東西，凡是已經在我們對外政策當中已經鞏固起來而成爲習慣，在這一方面不至再引起任何懷疑的東西，對於我們整個的國家機關而言，它至少也是同樣適用的（而且我認爲，它還更加適用得多）。而工農檢查院，則與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來往接頭，發生關係，因此，它的活動，也應當毫無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的國家機關：地方的、中央的、商業的、純官方的、教育的、檔案的、戲劇的，等等——一句話，所有一切機關，毫無例外。

那麼，試問對於活動如此廣泛的一個機關，——除此以外，它的活動形式還需要極度的靈活性，——爲什麼不應允許有黨的監察機關與蘇維埃監察機關之特殊的合併呢？

據我看，對於這種合併，是沒有任何阻礙存在的。並且不僅此也，我還認爲這樣的合併，乃是使我們工作得到成功的唯一保證。我認爲，在這一方面的一切懷疑，只有在我們國家機關當中之最守舊的角落裏才會發生，而對這種懷疑只有報之以嘲笑而已。

×            ×            ×

另一種懷疑是：將教育的活動與官方的行政的活動結合起來，這是否便利呢？我認爲，這不僅是便利，而且是應當的。一般地說來，不管我們對於西歐的國家形式採取如何革命的態度，但是，我們却讓我們自己沾染上了許多最有害的和最可笑的偏見，而且部份地是我們的親愛的官僚主義者曾經有意地使我們沾染上這些偏見，這般官僚主義者從事投機，以爲在這些偏見的混水中他們可以一再撈魚的；他們的混水撈魚，已經達到了這種地步，就是只有盲目的人，才會看不到，這種混水撈魚行動，是在如何廣泛地進行着。

在社會關係、經濟關係、以及政治關係底一切領域裏面，我們都是『極端』革命的。但是，在敬重職位、在遵從日常事務形式與儀式底領域內，我們的『革命性』却往往被最陳腐的墨守舊習主義所代替了。在這裏，不僅一次

地可以看到極有趣的現象，即：在社會生活中偉大的躍進，却伴以對最小變化底極度的畏怯。

這種情形是自然而然的，最勇敢的前進步驟，大抵是在曾經長期成爲理論領域的那種領域以內，是在主要地甚至差不多是完全地在理論上培植起來的領域以內。俄國人對於國內可恥的官僚主義的現實往往以非常勇敢的理論建設爲慰藉，因此，這種非常勇敢的理論建設，便在我們之間，獲得了那種不平常的片面性。在我們之間，一般建設上的理論上的勇敢性，却跟對於某些極小的日常事務的改良底可驚的怯懦性同時並存的。偉大的普遍的土地革命，是以在任何別的國家當中空前未有的英勇氣概完成的，但是在同時，在行政的日常事務上，却連實施十分之一的改良的幻想或意念都沒有；一般的論則，當應用到一般問題上去時，曾經產生了如此『光輝的』結果，但是在同時，將這些論則應用到行政日常事務的改良上去的幻想或耐心，却依然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社會生活，在其自身中會結合着無上的不畏一切的英勇氣概和對微小改變底心意上的畏縮怯懦。

我認爲，在任何真正偉大的革命當中，是不能不如此的，因爲真正偉大的革命，是從舊的——守舊的傾向——與抽象的追求新的傾向——它必須是如此之新，以至於在其中連一點舊的東西也都沒有的——之間的矛盾中產生的。

這一革命愈是急劇，則許多這些矛盾保持的時間亦將

愈加長久。

× × ×

現在我們社會生活底一般特徵，就是以下這些：我們已經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工業，而且曾經試圖澈底破壞中世紀制度，地主土地佔有制；在它的基礎上面，我們曾經創立了小農和極小農，這些農民，是跟在無產階級後面前進的，因為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底結果，是抱着信心的。可是，僅僅依賴這種信心的幫助，要一直堅持到社會主義革命在比較發展的國家裏面獲得勝利為止，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些小農和極小農，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由於經濟上的必要，而不得不保持在極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之上。是的，國際環境曾引起了這樣一種形勢，即現在將俄羅斯拉向後退，整個說起來，現在我們人民勞動底生產率大大地降低到戰前的水平以下。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部份地是有意識的，部份地是自發的——曾經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拉我們向後退，用盡一切可能來利用俄羅斯國內戰爭的因素，以便儘可能地更多地予這個國度以破壞。正是此種脫出帝國主義戰爭的方法，看來才好像是具備很大的利益似的：『即使我們不推翻俄國的革命制度，那麼，無論如何，我們也要使它的向着社會主義的發展困難起來。』——這些列強大概都是這樣設想的，而且從它們的觀點看起來，它是不能不如此設想的。但是結果，它們的任務却只解決了一半。它們雖沒有推翻革命所創造的新制度，但是它們也沒有給這個新制度

以立即採取這樣的一種前進步驟的可能——就是這種步驟底採用，將會證明社會主義者預言的正確，它將會使社會主義者得以以極大的速度去發展生產力，發展那可以融合起來而成爲社會主義的一切可能，它將會鮮明地、有力地向一切各式各樣的人證明：社會主義，在它自身當中包含着巨大力量，而人類現時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具有異常光輝的可能性的發展階段了。

國際關係體系，現在已經成了這樣一種情形，就是在歐洲，一個國家——即德國——竟被戰勝國所奴役了。其次，西方一些國家，並且是一些最古老的國家，由於它們獲得勝利的原故，已經處在這種條件之下了，就是它們可以利用這種勝利對於它們的被壓迫階級作一些無關重要的讓步，這些無關重要的讓步，仍可以延遲這些國家當中的革命運動，而創造出某種具有『社會和平』的外表的東西來。

同時，正是由於上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結果，好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都已經完完全全地脫出它們的常規了。它們的發展，都是完完全全地依照歐洲一般資本主義的標準來進行了。一般歐洲的不安情形，在它們裏面也都已經開始了。現在全世界都可以看清楚：它們已經被引入到這樣的一種發展裏面去了，這種發展，它勢必要使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走上危機。

這樣，我們在目前是站在這樣的一個問題前面，就是：在我們的小農生產與極小農生產之下，在我們的目前



這種破產狀態之下，我們能否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它們到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時候呢？可是它們（指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譯者註）並不是依着像我們在先前所預期的那種方式來完成這種發展的。它們並不是用社會主義在它們裏面均平的『成熟』的方法，而是用某些國家榨取另外一些國家的方法，用榨取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戰敗的第一個國家，並加上榨取整個東方的方法，來完成這一發展的。在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個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東方已經完完全全地捲入到革命運動裏面了，已經被完完全全地捲入到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漩渦裏面了。

這種形勢，規定我們的國家需要採取怎樣的策略呢？顯然它是這樣的：我們必須以極端的慎重態度，來保存我們的工人政權，並將我們的小農與極小農，保持在它的威權與領導之下。在我們方面，有一種優點，就是：全世界，現在都正在轉入於這樣一種運動之中，這種運動，一定要引起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同時，我們方面又有一種缺點，就是：帝國主義者，已經將全世界分裂為兩個營壘；而且此種分裂，由於以下這個事實，弄得更加複雜起來了，就是，德國——一個真正先進的、文化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度，現在要挺立起來，乃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情了。被稱為所謂『西方』的一切資本主義列強，都在啄着它，攻擊着它，不讓它抬起頭來。在另一方面，整個的東方，它和的被剝削人民底好幾萬萬勞苦羣衆——他們已經達到在人類能夠忍受的最後程度上了，——已經

被迫陷於這樣一種條件之下了，就是它們的體力的和物質的力量，簡直與西歐任何較小的國家底體力的、物質的、和軍事的力量，都不能加以對比了。

我們能不能夠從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底迫在眉睫的衝突當中，把我們自己救出來呢？我們是不是可以作如下的希望，即西方昌盛的帝國主義國家與東方昌盛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會給予我們以第二次的拖延時間，如像它們第一次所給與的，當時，西歐反革命勢力援助俄國反革命的出兵，曾由於西方與東方反革命者營壘裏面、東方剝削者與西方剝削者營壘裏面、日本與美國營壘裏面的矛盾而瓦解了。

我認爲，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這樣的，即：這個答覆，依賴於很多的情況，而就整個說起來，鬭爭底結局，只有根據下面一點，才能預言出來，即地球上巨大的多數人民，歸根結底，終究要被資本主義本身加以教育和訓練而使之鬭爭的。

歸根結底，這個鬭爭底結局，將決定於以下這個事實，即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了地球上人口底絕大多數。而正是這個人口底大多數，在最近數年來，已經以非常的速度被捲入在爭取他們自身解放的鬭爭中了，因此，在這一點上看起來，世界鬭爭底最終結果將是怎樣的，實在不能有任何絲毫可以懷疑的地方了。在這種意義上說來，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是完全地和絕對地有保證的。

但是，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却並不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這種不可避免性。我們所感興趣的是，我們俄國共產黨，我們俄國蘇維埃政權，應當採取怎樣的策略，以便使西歐那些反革命的國家，不能夠來撲滅我們。爲了保證我們的生存，直到下次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西方，與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東方之間，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與東方式的落後的國家——它們雖然落後，然而却是大多數——之間的軍事衝突爲止，這個大多數則須要文明起來。同樣的，我們也缺乏可以直接轉到社會主義的文明，雖然我們對於這一點有着政治上的先決條件。爲了救助我們自己起見，我們必須採用以下的策略，或者實行下面的政策。

我們必須努力建成這樣的國家，在這種國家裏面，工人階級可以保持自己對於農民的領導，可以保持農民對於工人階級的信任，並能以最經濟的辦法，從我們的社會關係當中消除任何多餘東西底痕跡。

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國家機關，減少到最經濟的限度。我們必須把它裏面的一切多餘東西底痕跡驅逐出去——這些多餘的東西，從沙皇的俄國遺留下來的，從它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遺留下來的，竟有如此之多。

這會不會成爲農民狹隘性底王國呢？

不會的。如果我們保持了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權，那麼我們就可以獲得一種可能，以最大最大的節省我們國家經濟之代價達到這一點，即利用一切微小的儲蓄，來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事業及水力開採泥

炭業，並來建築伏爾克霍夫水電廠\*。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只有在這裏。只有那個時候，打個比方，我們才能够放下這個馬而改乘別的馬，就是放下農民的、村夫的、貧困的馬，放下依靠於一個破產的農民國度的經濟底馬，來改乘無產階級所尋求，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改乘大機器工業的、電氣化的、伏爾克霍夫水電廠等等的馬。

我就是這樣的在我的念頭裏面，把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策略、我們的戰略底一般計劃，跟改組了的工農檢查院底任務聯繫起來的。所以，我主張我們必須對工農檢查院予以特別的關心，予以特別的注意，將它提高到異常高度的水平上面，而給它以擁有中央委員會權利的領導地位等等的正當理由，就在這裏。

而此種正當理由就在於，只有最大限度地清洗我們國家機關，只有最大限度縮減並非絕對必要的一切東西，我們才能够有把握地繼續堅持下去。而且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將能够繼續堅持下去，但不是在小農國度的水平上面，不是在此種普遍狹隘性的水平上面，而是在不斷提高到大機器工業的水平上。

這些就是我為工農檢查院所夢想到的崇高的任務。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正在計劃着要使最有權威的黨的上層機關，和一個『平常的』人民委員部合併起來的理由。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

\* 這個水電廠位於伏爾克霍夫河上，靠近列寧格勒，為蘇聯所建造的頭一個大水電廠，於一九二二年動工，至一九二七年完成。

## 論 合 作 社

### (一)

我認爲，我們對於合作社運動的注意，還是不夠的。並不是人人都理解：現在即自十月革命以來，而且與新經濟政策無關（相反的，關於這，我們必須指出，正是由於新經濟政策），我們的合作社曾經獲得了特殊重要的意義。在舊的合作社運動者的夢中，有許多東西是空想的。有時他們簡直空想得可笑。但是請問他們的空想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不懂得工人階級爲推翻剝削者底統治而進行的政治鬭爭底基本意義。此種推翻的事業，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而在舊的合作社運動者的夢中，那許多空想的、甚至浪漫、而且甚至是庸俗的東西，現在都變成了最質樸無飾的現實了。

事實上，我們的國家政權既然是掌握在工人階級底手中，生活手段既然屬於這個國家政權所有，那麼真正留待我們來完成的唯一任務，就只有人民底合作社化了。在人口最大限度的合作社化的條件之下，在先前爲公正地相信

階級鬭爭必要、相信奪取政權鬭爭必要的這般人所正當地嘲笑、輕蔑、鄙視的社會主義，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它底目的了。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已經體會和認識到俄羅斯底合作社化在目前獲得了如何巨大的、無限的意義。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一種讓步，向私人貿易底原則作了一種讓步。正是由於這種理由，合作社才獲得了這樣重大的意義（這和某些人所想的，是恰恰相反的）。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面，十分廣泛而深入地將俄國人口組織在合作社裏面，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事情，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確定了將私人利益，將私人貿易利益，將國家對於私人貿易利益的檢查與統制配合起來的程度，使私人貿易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的程度——這個問題，在先前對於很多社會主義者，乃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物。在事實上，國家對於一切大規模生產手段底掌有，國家政權底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個無產階級底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之聯盟，這個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領導權之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經合作社——而且單單經合作社（在以前，我們是把它當作小買賣看待的，而且從某種方面看起來，我們現在在新經濟政策下面是有權利把它這樣看待的）——來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嗎？這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底完成，但是這是為完成這一建設所必要而充足的條件。

我們很多實際的工作人員，正是對於這種情形估價過低了。在我們中間是有人輕視合作社的，他們不理解：第

一，從原則方面(生產手段是歸國家所有的)，以及第二，從採用對農民盡可能是最簡單、最容易、和最易解的方法和手段以過渡到新秩序的方面看來，這一合作社有着如何重大的意義。

但是這又是最重要的事情。幻想藉各式各種工人的團體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而在實踐上學會這樣建成社會主義，即使每個小農都可以參加這種建設工作，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在目前所已經達到的，就是這種階段。然而毫無疑問的，我們雖已達到了這個階段，可是我們利用它的却太少了。

在運用新經濟政策上，我們有點矯枉過正了，這並不在於我們太過於重視自由產業及自由貿易的原則；在運用新經濟政策上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於我們曾經忘記了想到合作社，是在於我們現在對合作社估價過低，是在於我們已經開始忘掉了合作社在上述兩方面的的巨大的意義。

我現在想與讀者討論一下，根據此種『合作社』原則，現在在實際上能夠做而且應該做的究竟是那些事情。現在用什麼手段，我們能夠而且應當開始發展這種『合作社』原則，以便一切的人都可以明白它的社會主義的意義？

在政治上，我們要將合作社安置在這樣一種地位上，就是一般說來，合作社不僅永久享有某種特權；而且這些特權必須是純粹的財產的特權（銀行利率，等等）。我們必須以這樣的國家款項貸予合作社，這種款項，即是數額

不大，但亦須超過我們所貸與私人企業的數目，超過那些即令是從事經營重工業者的數目，等等。

每種社會制度，都只是在一個一定的階級之財政上的援助之下而興起的。那『自由的』資本主義底產生所費的千百萬萬盧布這裏就無需乎說到了。現在，我們必須要意識和見諸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必須特別加以協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但是要在援助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上去支持合作社，換一句話說：將這一援助理解為對於任何合作社商業的援助，是不夠的；將這一援助應理解為對於這種合作社商業的援助，就是在這種合作社裏面確有真正的人·民·大·衆·之·參·加。對於參加合作社商業的農民給予一種獎勵，這是一種絕對正確的方式；但是全部問題底要點，却在於檢查此種參加，檢查這一參加的覺悟程度，和這種參加的良好品質。嚴格地說起來，當一個合作社社員跑到一個鄉村裏面去開辦起合作社商店的時候，老百姓是絕不會參加的；但是在同時，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計，却急於試一下。

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從『文明的』（首先，是識字的，有教育的）歐洲人底觀點看來，爲了使人人都能參加合作社事業，而且都能積極地、而不是被動地消極地參加，我們還須要作的是很少很少了。老實地說，我們所需要作的，『只』有一件事情了，這就是說；要使我們的人民變成如此『文明的』人民，以致於他們都能夠理解人人參加合作社事業的利益，並且都能夠調整此種參加，『只是』這



一點而已。現在爲了轉到社會主義，我們不需要其它任何賢明的辦法了。但是爲了要達到這『只是』一點起見，却需要來一個完全的變革，却需要一個全體人民大衆底文化發展之整個時代。因此，我們的規則應該是：要儘可能減少哲理的空談和聰明手腕的使用，在這一關係上說起來，新經濟政策乃是一種進步，因爲新經濟政策適應於最普遍的農民意水平，因爲新經濟政策並不要求任何高於最普遍的農民之上的東西。但是，爲了使全體人民人人都能經過新經濟政策來參加合作社事業，那就需要一個整個的歷史時代。我們在一二十年之內，就可以很好地渡過這一時代。但是，這仍將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沒有這個歷史的時代，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識字教育，沒有充足程度的工作效能，沒有充分的訓練全國人民使其獲得讀書的習慣，而且沒有爲作到這一步的物質的基礎，沒有對於——例如說——歉收、飢餓、等等的相當的預防，那麼我們將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全部的問題就在於善於將我們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並且獲得了完全成功的這種革命的行動範圍，——這種革命的熱誠——能夠將這些和（這是我幾乎隨時可以說出的）作一個力能勝任的受過教育的商人的技能，——這足以使人們成爲一個好的合作社經營者——結合起來。所謂作商人的技能，我是指作一個有教養的文明的商人而言的。讓那般以爲他們從事經商，即會作商人的俄國人，或者簡單地只是農民，好好地想一下這一點吧。事實上，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他雖然在做生意，但是

這距作一個文明商人的技能還遠得很。現在，他是以亞細亞的方式從事經商的；爲了善於作商人起見，則須要以歐洲的方式來從事經商。然而這中間隔着一個整個的時代。

要之：對於合作社必須予以經濟上的、財政上的、以及銀行的種種特權——這乃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組織全國人口的新原則所必須給予的援助。但是這還只是一般地描畫出了這個任務底輪廓，因爲任務底全部內容，在實踐上還依然是沒有詳細規定，沒有詳細描述過的，——這就是說，我們要善於尋找出我們爲了組織合作社而要給予的那種『獎勵』形式（以及給予它此種獎勵的條件），要善於尋找出我們可以充分幫助合作社的那種獎勵形式，要善於尋找出我們藉此可以得到有文化素養的合作社經營者的那種獎勵形式。而在生產手段社會共有制之下，在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之下，文明的合作社社員制度，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 （二）

每當我寫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總引證我在一九一八年寫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那篇文章\*。這曾經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幾個青年同志底懷疑。但是他們的懷疑，主要地是關於抽象的政治問題的。

在他們看起來，生產手段屬於工人階級所有，而國家

---

\*即『論「左」罷病和小資產階級性』，見中文本『列寧選集』第十三卷。——譯者註

政權則歸這個工人階級所掌握的制度是不能叫做國家資本主義的。可是他們却不曾注意到：我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是爲了將我們目前的地位與我在和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中所保持的地位作一歷史的聯繫；而且就在當時，我就已經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是高出於現代經濟制度的；對我重要的是在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跟我在導引讀者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所說的那種不平常的，甚至是很不平常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建立一種連續的聯繫。第二，我總是經常着重於實踐的目的。而我們新經濟政策之實踐目的，就在於租讓權之獲得；毫無疑義的，在我們的條件下面，租讓權乃是一種純粹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所設想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議論。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在這一方面，我們還可能需要國家資本主義，或至少是需要某種與國家資本主義相並行的東西。這就是合作社的問題。

毫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底環境之下，合作社乃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同樣沒有疑義的，在我們目前的經濟活動底環境下面，當我們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雖然這是私人的企業，然而它却是位置在公共土地之上，而且是在屬於工人階級所有的國家政權底統制之下——跟澈底社會主義型的企業（屬於國家所有的生產手段，企業位置於其上的土地，以及一切整個的企業）結合起來的時候，那麼，這裏還發生了關於第三種企業的問題：這種第三種企業，在以前，從原則的觀點看來，並不是獨立的，

這就是合作社的企業。在私有的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之區別，猶如集產企業與私人企業之區別一樣。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亦有不同，這第一，因為它們乃是私人的企業；第二，因為它們乃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之下，合作社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是不同的，這因為它們乃是集體企業的緣故；但是，如果它們是位置在上面的土地以及生產手段，都屬於國家所有，都屬於工人階級所有的話，那麼它們和社會主義的企業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當討論到合作社問題的時候，我們對於這種情況正沒有充分地考慮到。人們忘記了：由於我們國家制度底特徵之故，我們的合作社遂獲得了一種全然不同的非常的意義。如果將我們的未曾獲得任何可觀的巨大發展的租讓事業丟開不談，那麼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社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對於這個意思，我需要加以解釋。自歐文（Robert Owen）起，舊的合作社運動者，其計劃底空想性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夢想要用社會主義來和平的刷新現代社會，而沒有考慮到像階級鬭爭、工人階級奪取政治權力、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這一種基本問題。所以，我們將此種『合作社』社會主義，視為一種完全空想的東西，將那想用簡單的人民合作社化的辦法把階級敵人轉化為階級合作者，把階級鬭爭轉化為階級和平（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看作浪漫的、甚至庸俗的東西，我們是對的。毫無

疑義的。從現代底基本任務底觀點看來，我們是對的，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沒有奪取國家政治權力的階級鬭爭，那社會主義是不能够建立起來的。

但是看一看吧，在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之後，在剝削者底政治權力被推翻之後，在一切生產手段（工人國家自願地、有條件地，以租讓的形式暫時讓給剝削者的那些生產手段除外）都歸工人階級所有之後，事情便如何的發生變化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對於我們，合作制底單純的增長（除上述的『小小的』例外之外），與社會主義底增長乃是同一回事，而同時，我們則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觀點底根本的改變。這一根本的改變，就在於：從前我們是將重心放在，而且不得不放在，政治鬭爭上，放在革命上，放在奪取政權上等等；而現在，我們却不得不將重心移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文化』的工作上面來了。如果不是爲了我們的國際關係，如果不是爲了國際關係，不是爲了爭取我們世界範圍內的地位的義務，那麼我簡直就可以說：我們的重心已經轉移到文化工作上面來了。如果我們將這一點撇開不談，只以國內的經濟關係爲限的話，那麼我們現在確確實實是把工作底重心轉移到文化工作上面來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個主要的構成時代的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的機關，這種機關是完全不適用的，是我們自前一個時代，完整地接受過來的；在

鬭爭的五年當中，我們不會，而且不能對它加以任何認真的重大的改變。第二個任務，就在於對農民生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間的文化工作，正如經濟上的目的一樣，正是合作社化。如果在農民完全合作社化底條件之下，那我們便能夠堅實地以兩足矗立在社會主義底地基之上了。然這種農民完全合作社化的條件，就包含有農民（而且正是由於在作為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底文化水平在內，因為如果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麼這種完全的合作社化，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們的反對者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說，我們是在從事於一種輕率而鹵莽的事業，就是：要將社會主義移植在文化發展不足的國度裏面。但是他們却錯誤了，因為我們並不是從根據理論（各式各種迂腐的理論）所假定的那種終點着手的，而且我們的政治的與社會的變革曾作了文化變革。文化的革命底前驅，這種文化革命，現在正擺在我們的面前。

現在這種文化革命實足以把我們轉變為一個完全地社會主義的國度，但是這一文化革命，對於我們却是純粹文化性質（因為我們是目不識丁、無學無識的緣故）以及物質性質（因為要作一個有修養的人，則須要有物質生產手段之相當的發展，則須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底莫大困難。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至六日



第四篇  
論社會主義勞動



## 怎樣組織競賽？

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曾經寫了而且還正在寫着山一樣的紙張，讚美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秩序底競爭、私人的企業精神、以及其他的剛勇與美點。他們攻擊社會主義者，說社會主義者不願了解這些剛勇底意義，不願顧及到『人類底天性』。在實際上，資本主義老早就已經廢棄了小規模的獨立的商品生產，——在這種生產之下，競爭能夠以相當廣大的規模來培養企業精神、精力、及獨創底勇敢性——而代之以大規模的及極大規模的工廠生產、股份企業、新迪加、以及其他的獨佔。在這樣一種資本主義之下，競爭是表示對於人民大眾、人民底絕對大多數、勞苦大眾百分之九十九底企業精神、精力、與勇敢的獨創性，加以空前未有的殘酷的壓服，並表示以金融的欺詐主義、專橫、對社會上層份子的服務來代替競爭。

社會主義不僅沒有消滅競爭；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第一次創造了能夠真正廣泛地和真正以大衆的規模來應用競爭之可能性，把真正人民大多數吸引到勞動舞台來的可

能性，在這種舞台上，勞動者能夠表現他們自己，能夠展開自己的能力，顯示自己的天才；在人民中間是有無限的能力和天才的，可是這些能力和天才被資本主義成千成萬地所撲滅、所壓制、所絞殺了。

在社會主義政府掌握政權的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組織競賽。

資產階級底隨從和寄生者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爲一種千篇一律的形式的、單調的、灰色的兵營制度。錢袋底僕從，剝削者底奴才——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老爺們——拿社會主義來恐嚇人民，而人民正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被判定做苦工和住無限的單調勞動、半飢餓生活、嚴重貧困之兵營。要把人民從這種苦工之下解放出來，其第一步驟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工人監督工業，土地收歸國有。其以後諸步驟是將工廠與工場收歸國有，全體人口強制組織爲消費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同時又是出售生產品的合作社——壟斷穀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貿易之國家專賣制。

能夠發揮企業心、競爭、及勇敢的創造性之可能，只有現在才廣泛的眞正羣衆的造成了。每一個把資本家趕跑了或者至少是由眞正的工人管理所控制的工廠，每一個把地主剝削者趕跑而將其土地沒收的農村，現在是，而且只有在現在才變成了這樣的一個競技場，在那裏勞動之人，能夠表現自己，能夠略略伸直脊背，能夠直立起來，感覺他是一個人。在好多世紀爲別人而工作、爲剝削者而做奴隸工作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才有爲自己而工作之可能，而

且這一工作是憑藉於最新技術與文化之一切成就的。

當然，做奴隸式的勞動之被爲自己而工作的勞動所代替，人類歷史上這樣一個極偉大的變革，不能不碰到一些磨擦、困難、衝突的，不能不用暴力來對付無可救藥的懶惰者及其隨從們的。不論那一個工人關於這點都沒有什麼幻想的：被多年多年爲剝削者做苦工所鍛鍊、被剝削者底無數侮辱與嘲弄所鍛鍊、以及被貧困所鍛鍊的工人和貧農，他們都知道，要打破剝削者底抵抗是需要時間的。工人和農民，毫不受知識份子老爺們、『新生命』派整批人物、以及其他的沒有骨頭的人們底感傷主義的幻想所感染，這些沒有骨頭的人物，聲嘶力竭地『高喊』反對資本家，『裝腔作勢』地反對他們，『責難』他們，可是當要行動時、要實行把威嚇資本家的話兌現時、要在實踐上執行更換資本家時，却又像挨了打的小孩子一樣哭泣起來了。

從做奴隸式的工作到爲自己工作，到在巨大的全國的（在一定範圍內是國際的、世界的）規模上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勞動，這樣的大變革，並需要——除了採取軍事的措置以鎮壓剝削者底抵抗之外——無產階級與貧農方面底巨大的有組織的努力。組織方面的任務，與用軍事的方法對昨日的奴隸主人（資本家）及其僕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老爺們——加以無情鎮壓的任務，是密切地互相交織在一起而爲一個不可分的整體。昨天的奴隸主及其奴才們——知識份子——這樣說着和想着：『我們過去總是組織者和首領，我們總是發號施令的，我們要仍舊做這樣的

人，我們不願聽從「普通人民」——工人和農民，我們不願服從他們，我們要把知識變為保衛錢袋特權與資本對人民的統治權之武器。』

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就是這樣在說着、想着、行動着。從利己的觀點來看，他們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封建地主底僕從們和寄生者——教士、錄事、果戈里所描寫的那樣的官僚、痛惡伯林斯基 (Belinsky)\* 的『知識份子』——也都覺得與農奴制度分手『很難』。但是剝削者及其知識份子僕從們底事業乃是沒有希望的事業。工人和農民正在打破着他們的反抗——可惜還不够堅定、堅決和無情——但是他們正在打破着他們的反抗。

『他們』以為『普通的人民』，『普通的』工人和貧農，不能應付社會主義革命所加在勞動者肩上的偉大的、真正英雄的——照其世界歷史的字義上說——組織性的任務。那些慣於為資本家及資本主義國家效勞的知識份子，常常這樣安慰自己：熊吧，『沒有我們是不成的』。但是他們的傲慢的估計是要落空的：有教養的人們現在已經分化出來，而轉到人民這方面來、到勞動者這方面來、幫助打破資本奴才們底反抗了。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間，組織天才是很多的，而這種天才只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偉大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工

\* 伯林斯基是俄國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著名文藝批評家，對於當時俄國農奴制度曾給以嚴酷的批評。

作，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

現在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任務的話——是盡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一般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創性。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舊的、謬誤的、野蠻的、可鄙、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只有富者或只有經過富者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管理國家，才能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個偏見，它被腐舊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慣、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在管理時進行掠奪，又在掠奪時進行管理——所保持。不是的，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需要的是知識底力量。正如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空前未有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產階級中間是沒有迷惑的、也是不能有的。但是，每一個普通的工人和農民，能夠讀和寫的，能夠判別人物的，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做組織者的工作的。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輕視和所取笑的『普通人民』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在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中間，這樣的才能，還是一個沒有開放過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現在是個統治的階級；他們還不够堅決。千千萬萬的人民，他們畢生是被飢寒交迫而不得不在棍棒之下工作；革命不能一下子就在這些人民中間造出這些品質來。可是一九

一七年十月革命底力量、其生氣、其不可戰敗性，正在這裏，即十月革命喚醒了這些品質，打破了舊的障礙物，卸去了腐朽的鎖鑰，並領導勞苦大眾踏上了獨立創造新生活之路。

核算與監督——這就是每一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底主要的經濟任務，是每一個消費合作社、每一個供給組合或供給委員會、每一個職工會、工廠委員會、或一般工人監督機關底主要的經濟任務。

反對舊習慣——即從被壓迫的人們之觀點來看勞動尺度，來看生產手段的習慣，譬如不願多担負一點負擔，想法從資產階級那裏盡量多取一點東西——的鬭爭是很必要的。先進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已經開始了這一鬭爭。有好多新加入工廠生活的人——他們在大戰時期特別衆多——現在依舊從『多剝去一塊然後逃之夭夭』的這種唯一念頭之觀點來看人民的工廠，來看已歸人民所有的工廠，先進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對於這樣的新來的人物已給以堅決的抵抗了。凡農民當中和勞苦大眾中間一切有階級覺悟的、忠實的和有思想的人，在這一鬭爭中都站在先進工人方面了。

核算與監督，如果它們是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以最高的國家政權之資格來執行的，或根據這個政權之指示、委託來執行的，如果核算和監督是廣泛的、一般的、普遍的，如果對勞動數量與生產品之分配加以核算和監督，那麼，這就是社會主義革新底本質，因為無產階級底政治

的統治已經創造出來了，而且已經鞏固了。

凡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所必要的核算和監督，只能是羣衆的。只有工人和農民羣衆之自願而忠誠的、以革命熱忱實行合作，對富者、騙子手、懶惰者和無賴漢，加以核算和監督，才能戰勝可咒詛的資本主義社會底這些殘餘，人類底這種廢物，這些腐爛而萎縮的肢體，這種資本遺留給社會主義的毒瘡。

工人與農民，勞苦者與被剝削者！土地、銀行、工廠和作坊，現在都歸全體人民所有了！自己從事對生產品之生產與分配實行分配和監督吧！——達到社會主義勝利之路，社會主義勝利之保證，戰勝一切剝削、戰勝一切貧乏與窮困之保障，就在這裏，也只有在這裏！因為在俄國，麵包、鐵、木材、羊毛、棉花、麻，一切的一切，都是應有盡有的，只要勞動及生產品分配得當，只要對於這種分配確立一種全體人民的、實事求是的、實際的監督，只要能夠不只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上，戰勝人民之敵——富者及其僕從、乃至騙子、懶惰者、和無賴就好了。

對於這些人民底敵人，社會主義底敵人，勞苦者底敵人，毫不憐惜！跟富人及其僕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你死我活的戰爭，跟騙子、懶惰者、和無賴作戰！不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資本主義底產兒，都是貴族的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底後裔，在這樣的社會裏邊，區區少數掠奪人民，侮辱人民；在這樣的社會裏面，貧乏

窮困迫使成千的人跑上無賴、腐敗、欺詐、忘記作人之路；在這樣的社會裏邊，不可避免地，在勞動羣衆當中要培養成這樣的願望：用欺騙手段逃避剝削，逃避可恥的工作，即使一分鐘也好，不拘任何方法，不拘任何代價，設法弄得一點麵包，以便不要挨餓，以便使自己及其親近的人們不要感受飢餓之苦。

富人與騙子，乃是同一塊徽章底兩面，乃是資本主義所培養的寄生蟲底兩個主要範疇，乃是社會主義底主要敵人。把這些敵人，應置在全體人民底特別監視之下；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底法律和規則，如稍有違犯，應當無情地加以懲罰。在這一關係上，任何的柔弱、任何的動搖、或感情主義，都是對於社會主義犯了極重大的罪惡。

爲了使社會主義社會不要受這些寄生蟲的害處，應當對勞動數量，對生產品之生產與分配，組織全體人民的、由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自願地、有力地、並以革命熱情支持的核算與監督制度。爲了組織這種爲每一個忠實的、有知識的、和會管理的工人農民所能做到的核算和監督，那就應當喚起他們自己的從他們環境中間產生的組織人材，應當鼓勵——並在全國範圍內加以調整——他們的關於組織成就之競爭，應當使工人農民能夠清楚地明白：一個有教養的人底必要的勸告與『普通的』工人農民對有教養的人所常有的懶散毛病加以必要的監督，這兩者之間有所不同。

這種懶散情形、隨隨便便、潦草塞責、凌亂不堪、迫



不及待、以討論代替行動、以空談代替工作的傾向，願意延攬世上一切事情而沒有一樣能幹到底的傾向，——這些品質乃是『有教養者』底特性之一；這些特性並不是從他們的壞的天性中來的，更不是從惡意中來的；而是從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從他們的勞動環境中，從過度的疲勞中，從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之不正常的分離中等等來的。

在我們革命底錯誤、缺點、與疏忽中，由於我們中間的知識份子底這些可悲的——但是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特性而產生以及由於工人方面對於知識份子底組織工作缺少充分的監督而產生的錯誤等等會起有不小的作用。

工人與農民還在『怕羞』；他們應當擺脫這一點，而且毫不庸置疑地，他們應當擺脫這一點。沒有有教養的人們、知識份子、專家之勸告，沒有他們的領導性的指示，那是不行的。凡稍微頭腦清楚的工人農民都知道有教養的人們之這種優點，我們中間的知識份子，不能責備工人農民對他們不注意或沒有同志的敬重。但是提供意見和指導性的指示是一回事，而組織實際的核算與監督是另一回事。知識份子往往提供很好的意見與指導性的指示，但是要執行這個意見與指導性的指示，要實行實際的監督，以期將言變為行，那却『笨拙』得可笑、妄誕、可恥，而且沒有能力執行了。

因之，沒有『人民』，沒有工人與勞苦農民中間來的實際組織者之幫助與領導作用；那是絕對不行的。『製鍋的不是神』——這句真理，工人農民要好好記住。他們應當

懂得：現在，整個的問題是實踐，現在已到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理論要轉變成為實踐，理論要由實踐給它以生命，要由實踐加以糾正，要由實踐加以檢驗了，這時馬克思底兩句話：『實踐運動底每一步驟則比一打綱領還要重要。』特別顯得正確了。我們可以說，對於富者和騙子，加以實際的真正的控制、縮減及充分的核算與監督，在這一方面之每一步驟，比一打最好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議論要重要的多。因為，『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但生活這顆萬年樹却是綠色的。』

應當組織工人和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者之相互競賽。應當反對知識份子所喜歡的由上確立單一形式的呆板方法和企圖。不論呆板方法或由上確立單一形式，都是與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毫無共同之點的。在基本上、在根本上、在本質上的統一性，並沒有被細目上、各地特徵上、處理問題方法上、實行監督方式上、消滅寄生蟲和使寄生蟲（富人和騙子，潦草塞責者和歇斯特里的知識份子等等）變成無害之方法上的多樣性所破壞，反而得其保證。

巴黎公社是一個偉大的榜樣，它告訴我們如何把創造性、獨立性、行動自由、和下層的擺動力，與自願的集中制——不受固定的形式所束縛——結合起來。我們的蘇維埃就是學這個榜樣的。但是，它們還是在『怕羞』，它們還沒有展開，他們還沒有深入於他們的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的、偉大的、創造的工作之中。應當使蘇維埃更勇

敢更自動地担負起事情來。應當使每一個『公社』，——任何工廠、任何鄉村、任何消費合作社、任何供給委員會——作為核算和監督勞動和生產品分配底實際組織者，相互進行競賽。這種核算和監督底綱領是簡單、明瞭、為人人所理解的：即使人人都有麪包吃；人人都有堅牢的皮鞋和好的衣服穿，人人都有溫暖的房子住，人人都忠誠地工作，不要讓一個騙子（包括那些逃避工作的人）逍遙自在，而把他關在監牢中或處罰以最艱苦的強制工作，也不要讓一個違犯社會主義法律和規則的富翁，能逃避騙子底命運，騙子底命運應該是富人底命運才公道。『不做工者不得食』——這便是社會主義底實踐的誠條。這就是在實踐上應該加以調整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的『公社』和我們的工人和農民組織者，特別是知識份子中間的組織者，所應當引為自傲的實踐的成就（因為他們是太慣於、非常慣於以他們的一般的指示和決議自傲的）。

對富翁、騙子、和懶漢實行核算和監督之成千的形式和方式，應該在實踐上由公社自己、由城市及鄉村中的小細胞製定出來，並加以考驗。在這裏多樣性是富有生氣底保證，是達到共同目標——即掃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跳蚤、騙子、臭蟲、富翁，等等——成功之保證。在一個地方監禁上幾十個富翁、一打騙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彼得格勒有許多排字工人，尤其是在黨的印刷廠中的排字工人，像流氓一樣地逃避工作）。在另外一個地方，叫他們打掃廁所。在第三個地方，他們監禁期限滿

後，給他們各發一張『黃執照』★，以便一切人民在他們悔過自新以前，把他們當作有害的人，加以監視。在第四個地方，每十個懶漢當中，應當拿出一人出來就地槍斃。在第五個地方，想法採用各種混合的方式，例如，用緩刑辦法，使富翁、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騙子、和無賴中間的可以改過的份子能有迅速改過之機會。樣式越多、則一般的經驗越好越多；一般的經驗越多，則社會主義之勝利就越有把握越迅速；因之，實踐製定最好的鬭爭方法和手段也就越容易。

在那一個公社裏面、在大城市底那一個弄堂裏面、在那一個工廠裏邊、在那一個農村裏面，沒有挨餓的人、沒有失業的人、沒有懶惰的富翁、沒有資產階級僕從出身的奴才、自稱為知識份子的怠工者呢？在什麼地方，曾經用了最大的力量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給貧民建築了好的新房子，叫貧人住在富翁的屋子裏呢？給貧人家庭底每一個嬰兒適當的供給一瓶牛乳呢？這就是在怎樣的問題上應當展開各公社、各團體、各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間競賽。這就是在怎樣的工作中，應當在實踐上選擇和提拔組織人材，到全國管理機關裏去。在人民之間，這種人材是很多很多的。不過，他們是被壓抑住罷了。應該幫助他們開展起來。他們，也只有他們，在民衆

★在沙皇政府時代，娼妓一定要帶着黃色的特別的護照。

---

支持之下，才能够挽救俄國，才能够挽救社會主義事業。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 偉大的開端

——後方勞動者 所表現的英勇氣概

——論『共產主義禮拜六』★

報界報導了許多關於紅軍士兵所表現的英勇事蹟的實例和模範。在反對高爾察克份子、鄧尼金份子、以及地主與資本家底其他軍隊的鬪爭中，工人和農民常常表現出了英勇與堅忍底奇蹟，堅持了社會主義革命底果實。游擊主義的根絕、對疲憊和渙散性底克服，雖然進行的很緩慢和困難，然而這一克服，總是在不顧一切地向前進行着。自覺地爲社會主義勝利底事業而犧牲的勞苦羣衆底英勇氣概——乃是在紅軍中的新的、同志的紀律底基礎，乃是它的再生、鞏固與生長底基礎。

---

★係自俄文『Subbota』一字而來，意即禮拜六，或安息日。『共產主義禮拜六』，即指在平常的勞動時間以後，無報償地、無代價地進行的自願勞動而言，在原先，這種勞動都是在禮拜六進行的。到後來，這個名詞已適用於在每星期中其餘的日子或任何一天所進行的同樣的工作。這種工作通常包括：清理鐵軌、裝運或卸貨車、幫助集體農場工作或建設事業等，如『在全莫斯科幫助之下建成了的』莫斯科地下鐵道，即其一例。——英文版編輯部註

後方工人所表現的英勇氣概，也同樣地值得我們注意。在這一方面說來，工人們根據他們自身的倡導而組織起來的『共產主義禮拜六』，確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顯然地，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但是這却是一個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的開端。這是這樣的一種變革底開端，這一變革，比較推翻資產階級更加困難，更加重大，更加激烈，更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為這是戰勝遲鈍性、渙散性、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一種勝利，這是戰勝該詛咒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遺產而留給工人和農民的這些習慣的一種勝利。唯有在鞏固了這種勝利的時候，才能夠創立新的社會紀律，即社會主義的紀律；也只有在那個時候，資本主義的復辟才成為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共產主義才真正成為不能被戰勝的制度了。

在五月十七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A·J·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一個共產主義的禮拜六）』。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我們把它全部轉載於此。

### 『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

#### ——一個共產主義的禮拜六——

『俄共中央委員會關於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的信，對於共產黨的組織和共產黨員，給了一個強有力的刺激。一般的熱情，曾使許多鐵路工人共產

黨員，奔赴前綫，但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不能丟下責任重大的工作位置，而不得不尋求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去從事工作的新方式。各地動員工作緩慢的消息，及行政工作上的官僚習氣，迫使莫斯科·卡桑鐵路分區，不得不去注意鐵路管理底機構。結果判明：由於勞動的缺乏以及勞動緊張性的薄弱，限期的定貨以及對於火車頭的修理，都受到阻礙。莫斯科·卡桑鐵路分區共產黨員與同情份子，在五月七日舉行了全體大會，在大會上，曾提出了一個由空言幫助戰勝高爾察克轉到實際行動的問題。當時提出的決議說道：

「由於嚴重的國內和國外形勢，共產黨員與同情份子，爲了戰勝階級敵人起見，必須重新鞭策自己，從自己的休息時間中拿出工作時間一小時，也就是說，將自己的勞動日延長一小時，將這些小時加在一起，而在禮拜六一下子從事體力勞動六小時，以便能立即創造一批現實的價值出來。既認爲共產黨員爲了革命底利益起見，不應憐惜自己的健康與生命，那麼從事此種工作者，則是沒有任何報酬或代價的。全分區應當實行共產主義的禮拜六，一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

在稍許遲疑之後，這個決議即經全體一致通過了。

在五月十日禮拜六這一天下午六點鐘，共產黨員與同情份子，像兵士一樣的出發工作，他們排列成隊



伍，毫不慌亂地由工匠帶到各地去工作。

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的成績，是很顯然的。關於工作底地點，以及工作底性質，俱見下表。

工作地點	工作底名稱	使用的人數	工作時 按每人 計算	數總計	所完成的 工作
莫斯科機 車修理廠 總廠	爲皮洛偓、姆洛姆	48	5	240	裝載了 7,500
	、阿拉土耳其與蘇斯 蘭裝運鐵路用材料	21	3	93	普特 卸除了 1,800
	，修理機車及貨車 用零件	5	4	20	普特
莫斯科客 車場	對托洛茨基及其他 號列車車頭之複雜 而即時的修理	26	5	130	共計修理 了一個半 車頭
莫斯科整 理站	對於車頭之即時的 修理	24	6	144	完成了兩 個車  頭卸除了 四個車頭 上需待修 理的零件
莫斯科車 箱部	對於客車的即時的 修理	12	6	72	兩個三等 車的車箱
『皮洛偓』 車箱修理 廠總廠	在禮拜六及禮拜日	46	5	236	12輛有頂 貨車及兩 輛無頂貨 車
	對於車輛及零件的 修理	23	5	115	
總	計.....	205	—	1,014	共計完成 了四輛車 頭十六輛 車廂裝載 和卸除了 93,000普 特

依照平常應支付的工資計算起來，這次所進行的工作底總價值，合計五百萬盧布，如依照超額工作時間應給付的工資額計算起來，則其價值要多一倍半。

向貨車裝載貨物的勞動底強度，較普通工人的同種勞動，要高出百分之二百七十。其他工作的勞動底強度，亦大約與此相同。

因勞動缺乏和官僚習氣而將定貨積壓七天乃至三個月的情形（限期的），則完全剷除了。

工作是在設備不佳的狀態（這是容易補救的）之中進行的，因之，某些部份的工作則被阻滯了三十至四十分鐘之久。

特地留下來領導工作的行政機關，竟來不及準備新的工匠；當一個老工匠曾說，在這一次「共產主義禮拜六」所作的工作，相當於缺乏階級覺悟和遲鈍的工人在一週內所完成的工作，這也許有一點點誇張吧。

由於蘇維埃政權底熱誠的擁護者都參加工作，並且預料將有更多的此種份子要參加以後的禮拜六工作，同時，由於其他各區也願意倣效莫斯科·卡桑鐵路的鐵路工人共產黨員底榜樣，我根據從各地方收到的報告，對於這種工作底組織方面，可詳細地說幾句。

在參加工作者當中，百分之十乃是在地方上經常工作的共產黨員。其餘的參加者，則是担負重要工作職務的人，以及被選來參加的人，從鐵路上的政治委員起到單個企業的政治委員為止，還有職工會的代

表，及交通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

在工作中所表現出的熱誠與親睦，是空前未有的。工人們和機關的工作人員，既不相罵，又不吵嘴，像勤勉的螞蟻似的，紛紛將客車車頭用的重四十普特的鐵輪，滾轉到應放置它的地方，這時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因集體勞動而產生了熱烈的喜悅之情；人們關於工人階級勝利之不可動搖的信心，都大大加強了。世界的強盜們，是不能窒死勝利的工人的；國內的怠工者，今後再不會看見高爾察克了。

當工作完畢之後，在場的人們都親眼看到了一種空前未有的場面：疲乏的，然而在他們的眼睛裏却閃耀着喜悅的光輝的幾百個共產黨員，都高唱「國際歌」的凱旋的調子，以祝賀這次工作的順利成功。看起來，好像這個勝利的讚美歌底勝利的波浪，要湧到工人的莫斯科底牆頭似的，而且正像拋石入池所引起的波紋似的，這種歌聲要越來越廣地擴展到整個的工人的俄羅斯，振奮起所有疲憊不堪與工作遲鈍的人們的。

### A·J·J

在評價此種非凡的『值得模倣的榜樣』時，五月二十日的『真理報』在N·R·同志底一篇文章裏面在這個同樣的標題之下寫道：

『共產黨員底這樣工作的例子，並不是稀有的事情。我知道，一所電廠和許多鐵路上也有這樣的事

情。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鐵路上，共產黨員們曾經爲了抬起一個陷入到修理坑去的火車頭，連做好幾夜的額外工作。在北方鐵路上，在冬季，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份子，做好幾個禮拜天的工，以掃除鐵軌上的積雪；許多貨站上的共產黨支部，則在夜間放哨，防守貨站，以避免貨物之失竊，——不過這一工作，會是臨時性的，沒有系統的。在莫斯科·卡桑鐵路上工作的同志們，他們所作的新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使這種工作成爲系統的，經常的了。莫斯科·卡桑鐵路的同志們，曾經決議：「一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爲止」，他們的工作底意義，即在於此。他們決定在軍事期間，將共產黨員和同情份子的勞動日延長一小時；同時，他們表現了有效工作底模範。

這一模範已經引起了而且應當引起進一步的做效。亞力山大洛夫斯基鐵路上的共產黨員與同情份子全體大會，在討論了目前的軍事形勢和莫斯科·卡桑鐵路上的同志們所通過的決議之後，當即決定：（一）亞力山大洛夫斯基鐵路上的共產黨員和同情份子，實行「共產主義禮拜六」；第一個禮拜六，定於五月十七日舉行；（二）將共產黨員和同情份子組織成爲模範突擊隊，這種突擊隊必須向工人們表明：怎樣從事工作，並向他們表明：用現有的材料和工具，以及在目前這種食物之下，究竟能夠真正做出些什麼工作出來。

據莫斯科·卡桑鐵路的同志們說，他們的實例已

經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期望在下禮拜六有大量的非黨工人，也要來參加這種工作的。在我寫這篇東西的時候，亞力山大洛夫斯基鐵路工場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額外工作還沒有開始，但是當他們要進行這樣工作的謠言傳播出去以後，非黨工人羣衆都興高采烈地紛紛談論起來：「昨天我們還不知道這件事，否則的話，我們也準備停當這樣去工作的！」「在下禮拜六，我們一定要去的。」——像這樣的話，我們從四面八方都可以聽到。這種工作所產生的印象，是非常之大的。

莫斯科·卡桑鐵路的同志們所創立的這種模範，應爲後方所有共產黨員支部所熱心做法。不僅莫斯科的共產黨支部，即俄國的全部黨的組織，也都做做這種榜樣。在農村區域裏面，共產黨支部應當首先代紅軍士兵耕種田地，並幫助其家屬。

莫斯科·卡桑鐵路上的同志們，以歡唱「國際歌」結束了他們第一次的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工作。如果全俄國的共產黨組織，都能相繼做法這種榜樣，並能不屈不撓地作下去，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將會在全國勞動者歡唱「國際歌」的響亮的歌聲中，順利地渡過最近嚴重的數月的。……

工作吧！共產黨員同志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真理報』有一段消息說道。

『亞力山大洛夫斯基鐵路在五月十七日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禮拜六。根據他們全體大會底決議，九十八個共產黨員和同情份子無酬地做了五小時的額外工作；他們所得到的，只是用現錢再度吃飯的權利而已，並且因為他們是體力勞動者，在用現錢吃飯時，得給他們每人半磅麵包。』

雖然這種工作曾經準備的不好和組織的不好，然而勞動生產率則比較普通的要大兩倍和三倍。

這裏再舉一些實例於下：

五個旋盤工，在四小時內做成了八十個紡錘。跟平常的出產率比較為百分之二一三。

二十個普通勞動者，在四小時內收集了總重六〇〇普特的碎片材料和七十個包以薄片的車廂用的彈簧，每個彈簧重三普特又二分之一，兩者總計八五〇普特。跟平常的比較，生產率為百分之三〇〇。

『同志們都拿以下這個事實來說明這一點，即在平時，他們的工作是很乏味無趣的，而在這裏，他們工作時却帶着一種實行的熱心和無上的熱誠。可是現在，如果他們在平時所作的，竟低於他們在共產主義禮拜六所作的，那他們就會感到這是一種恥辱。

現在許多非黨的工人羣衆都聲稱，他們極願意參加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工作。火車頭突擊隊都紛紛要把一些火車頭從『墳地』取出、放在禮拜六，加以修理，使能行駛。

據報告，這樣的共產主義禮拜六，在烏雅斯瑪鐵路上也組織起來了。』

至於這些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工作是如何進行的，則A·賈清柯同志在六月七日『真理報』的一篇文章裏對此曾有所描述，其標題爲『一個禮拜六工作者的記述』，茲將其中的主要部份轉引於此：

『依照黨底鐵路分區底決議，我以愉快的心情，會同一些同志去參加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工作，我可以得到幾小時的時間使我的腦筋得以休息，使我的筋肉得以伸縮運動。……我們被派到鐵路的木坊裏去工作。當大家都到了，彼此問好道安，笑聲歡騰，共計我們的力量，有三十個人。在我們面前躺着一個「怪物」，一個重量不下於六百或七百普特的蒸汽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它「移」到差不多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俄里遠的月台上去。我們都有些懷疑起來。……可是我們終於動手了，有些同志將木轆轤放在蒸汽鍋下面，在鍋上拴了兩根繩子，工作開始了。……蒸汽鍋看起來似乎不大願意挪動，但最後它終於移動了。我們都高興起來，我們的人數又是很少的，三倍於我們的共產黨員工人，差不多把這個鍋本身已經抬了兩個星期了，但是它一直停在那兒不動，直到我們來時才開始移動起來。……我們在我們的「工頭」的「一、二、三」口令之下，用力地親睦地工作了一個鐘頭，蒸汽鍋逐漸移動，突然間，發生了一陣混亂。許多同

志都突然地可笑地翻倒在地上，原來是我們手中的繩子「叛變」了。不過只是片刻間的耽誤，隨即我們又拴了一根新的繩子。……黃昏的時候，天已經慢慢黑起來了，但是我們還需要克服一個小小的山坡，然後我們的工作就算完結。我們的臂膀酸痛，我們的掌心滾燙，我們熱得滿頭大汗，我們用盡全副的力量向前拉——工作就是這樣繼續進行着。「指揮」站在一邊，好像由於我們的成功而感到有點慚愧，他也不知不覺地走來握住繩子：「幫幫忙啊，你真做得恰是時候！」一個紅軍士兵正在注視着我們的勞動。他的手裏拿着手風琴。他在想什麼呢？這些是些什麼人呢？爲什麼在禮拜六當人人在家休息的時候，他們要出來作工呢？我解透了他的心中之謎，就對他說：「同志！爲我們彈一個快樂的調子吧。我們不是普通的職員，我們都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你瞧，我們的手裏工作進行得多麼熱烈啊！我們不是懶惰的人，我們是在用盡我們全副的力量拉東西啊！」爲着響應我們，這位紅軍弟兄小心地把他的手風琴放在地上，趕忙走來抓住了繩子。

突然間，U同志用優美的次高音開始唱着「杜賓呶什卡」歌曲，我們大家也都隨聲附和一齊歌唱這首工人歌中的詞句：「哎，杜賓呶什卡，Ukhnem, podyernyem, podyernyem ……。」

由於不習慣於這種工作，我們的筋肉感到疲憊不



堪，我們的肩膀酸痛，我們的背脊……但是明天是閒暇的日子，是我們的休息日，我們願意的話，可以整天地睡覺。目的地靠近了，在經過少許的動搖之後，我們的「怪物」幾乎已經滾轉到它的月台傍邊了。「支幾塊木板；把它扛上月台啊！」——讓這個蒸汽鍋去做對它期望已久的工作吧。我們一大羣人向着該地方支部的「俱樂部」走去，屋子裏的燈光很亮；牆壁上飾着許多標語；在屋子的周圍堆着來福槍，在雄壯地唱過「國際歌」之後，我們享有一盃茶和「甜酒」，甚而還有麵包。當地同志們對於我們的這種款待，在我們艱苦的勞作之後，是再好沒有了。我們熱誠地向我們這些同志們道別，排起隊來回家。革命底歌曲，在深夜的寂靜裏，響徹了沉睡着的街頭，整齊的步伐同歌聲諧和着。我們唱的是「同志們，號角在鳴叫」；「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以及其它的國際歌和勞動歌。

一禮拜過去了。我們的手臂和肩膀已經休息過來，我們現在又參加「禮拜六」了，是到距離九俄里遠的一個地方去修理車廂。這個地點就在皮洛憐。同志們爬上了一個美國式的火車頂上，和諧而高興地唱着「國際歌」。火車上的人們，都傾聽着歌聲，顯然是感到驚奇了。車輪開始在奏着有韻律的節拍，我們當中那些沒有來的及爬到車頂上去的同志，都掛在車的階梯上，假裝作「失望」的乘客。到站了！我們已

經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穿過一個長的車道，政治委員 G·同志笑容可掬地走來歡迎我們。

「工作多得很——他說——只是人太少了！總共只有三十個人，在六小時之內，需要修理好十三輛車廂！這裏有好多車輪排列着，其中不僅有空的車廂，而且有一個裝滿了水的水槽，然而不要緊，我們會『把它完成的』，同志們！」

工作在緊張地進行着。我和其他五位同志是用起重機工作。在我們的臂力和兩個起重機的壓力之下，在我們的「工頭」的指揮之下，六十至七十普特重的一對一對的車輪，便以最活躍的姿態從一付鐵軌跳越到另一付鐵軌上了。一對不見了，另一對又滾轉到它原來的地方去了。最後，一切車輪都被放置在所指定的地點了，我們便很迅速地沿着鐵軌將這些磨損的古董移到了一個車房裏去了。一、二、三——它們就被一個迴旋的鐵的起重機所舉起，頃刻間鐵軌上已經沒有它們。……在那一邊，在黑暗中，我們可以聽到鐵鏈的急速的鏈擊聲；那裏的同志們像蜜蜂似的圍住他們的「病」車工作着。有的在做木工。有的在塗漆，還有的在蓋車頂，這一切都使得那位政治委員同志和我們自己感到無限歡欣。鍛冶工人也請求我們予以援助。在一個可以移動的鍛冶場裏，一個燒得白熱的連接鉤正在發光；由於將火車移於側綫時的不慎，這個連接鉤被弄得彎曲了。它被放置在鐵砧上，在我們的

敏捷的鎚擊之下，散射着火花，在有經驗的一位同志指導之下，它又成了原來的適當的形狀。當它還白紅的時候，我們已經把它擱上肩膀，迅速地送到應安置它的地方去，放在鐵的凹陷處，再敲上幾鐵鎚，就把它裝好了。我們在火車底下匍匐而行。火車的連接鉤結構，並不像所看到的那樣簡單；那裏是一個完整的帶着帽釘和彈簧的體系。……工作是在緊張中繼續着，夜在發黑着，火炬似乎比剛才更顯得亮些。很快地完工了。有一些同志「依靠」在輪胎邊上，「品」着熱茶。五月裏的夜是很清新的，一鉤新月像鐮刀似的在天空中美麗地照耀着。在我們的週遭，我們可以聽到談諧的話語、笑聲、和健全的幽默的語調。

「完工了，G同志，十三輛車廂已經弄好了！」

但是G同志還是不滿足似的。

「我們喝完了茶，唱着我們的凱旋之歌，朝着歸路回來了。……」

贊成組織『共產主義禮拜六』的運動，並不僅限於莫斯科。在六月六日的『真理報』上，有下面一段記載：

『五月三十一日特維爾第一次共產主義禮拜六。在鐵路上工作的有一百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在三小時半的時間裏邊，他們裝載和卸除了十四輛貨車的貨物，修理了三個車頭，鋸了十俄尺木材，此外並完成了其它的工作。熟練的共產黨員工人的勞動緊張性，高於普通的生產率十三倍。』

其次，我們在六月八日的『真理報』上，又讀到下面一段消息：

『共產主義禮拜六

薩拉托夫，六月五日。爲了響應莫斯科同志們的號召起見，這裏的共產黨員鐵路工人，在黨的全體大會上決議：無報酬地在禮拜六從事五小時的超額工作，以便協助國民經濟。』

× × ×

我在上面最完全地、最詳盡地敘述了關於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報導，因爲在這裏，我們無疑義地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建設底最重要的一方面，然而對於這一方面，我們的報界至今還沒有給以足够的注意，同時，我們大家對於它也還沒有足够的認識和估計。

少吹政治的牛皮，要多多注意最簡單而生動的、從生活中得來、又爲現實生活所檢驗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這是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的作家、鼓動家、宣傳家、組織家等等所應當經常再三復述的口號。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我們首先應當加以注意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務，乃是：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戰勝剝削者，壓服他們的陰謀（如像欲投降而委棄彼得格勒的『奴隸主底陰謀』之類，在這個陰謀當中，所有的人，從黑色百人團和立憲民主黨人到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是一概參加的），這一點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和這個任務並列而同樣不可免地要提出別一個

任務，即——愈往後愈加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來——積極的共產主義建設底更重大的任務，創造新的經濟關係，創造新社會的任務。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特別是我於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勒工農兵蘇維埃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是對剝削者底暴力，而且甚至主要的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的暴力底經濟基礎，它底生氣勃勃和成功底保證，乃是無產階級代表並且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問題底本質，就在這裏。共產主義底力量之源泉和共產主義必然的、完全的勝利底保證，便在這裏。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是建立在棍棒底紀律上面，並且是在勞苦羣衆底極端無知和被壓制的狀態之下，勞苦羣衆被區區少數地主所掠奪和凌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則是建立在飢餓底紀律上面，不管資產階級的文化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底一切進步是如何如何，但是即使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面，廣大的勞苦羣衆，仍舊不外是無知的、被壓制與被蹂躪的僱傭奴隸羣，或被壓抑的農民羣，他們爲區區少數資本家所掠奪與凌辱。而共產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它的第一步是社會主義——，則是建立在——而且隨着時間的演進，愈往後將愈

\* 即『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關於人民委員會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報告』，見全集第二十四卷三二—三七頁  
——校閱者

多的建立在——勞動者自己底自由的與自覺的紀律上面，這些勞動者，正就是那些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底羈絆的人們。

這種新的紀律，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不是從人們善良的願望中產生出來的，這種紀律、是從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而且也只有從這種條件中，生長起來的。沒有此種物質條件，它的產生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這種物質條件底擔負者或其前導者，則是一個一定的歷史的階級，一個為資本主義大生產所創造、所組織、所團結、所訓練、所教育、所鍛鍊出來的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如果我們將『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哲學的術語，翻譯成更簡單的文字，則其意義，有如下述：

只有一個一定的階級，即城市的和一般產業工人，能够在推翻資本底羈絆的鬭爭中，能够在這個推翻的過程中，能够在保持和鞏固這種勝利的鬭爭中，能够在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底工作中，能够在為完全消滅階級而進行的全部鬭爭中，領導全體的勞苦大眾和被剝削者（我們順便在這裏指出的，即：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唯一科學的區別，只是在於前者係表示從資本主義生長起來的新社會底第一個階級，而後者則表示新社會底較高的、進一步的階段）。

『百恩』黃色國際所犯的錯誤，就在於：它的領袖們

僅在口頭上、僅在字面上承認階級鬭爭與無產階級底領導作用，他們害怕把這一點思索到底，他們害怕那個爲資產階級所特別恐怖、爲資產階級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的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鬭爭底一個時期，而在階級未消滅時期，階級鬭爭乃是不可避免的；階級鬭爭僅僅改變了它的形式，在推翻資本後的第一個時期中，階級鬭爭更其殘酷和更其具有特性了。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治權力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鬭爭，而是仍在繼續着階級鬭爭，一直到階級完全被消滅時爲止——自然，這種階級鬭爭乃是在另一種情況之下，以另一種形式，用另一種手段來進行罷了。

『階級底消滅』，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所有那些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都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最終目標，然而絕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思了它的意義。所謂階級者，即大的人們集團之謂，這種集團是按照人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有的地位，按照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份是在法律上固定了和規定了的），按照人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從而，按照人們獲取他們所握有的社會財富的方式及所佔的比例之大小而分別的。所謂階級，乃是這樣一種人們底集團，其中一個集團由於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中所佔地位之不同，而得以掠取別一集團底勞動。

很明白的，爲了完全消滅階級起見，不僅須要推翻剝削者、推翻地主與資本家，不僅須要廢除他們的財產，而

且還須要廢除生產手段的一切私有權，還須要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差別，以及體力勞動者與精神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爲了達到這一點起見，須要採取巨大的步驟來發展生產力；須要克服小生產底許多殘餘底反抗（這種反抗常常是消極的，但是它特別頑強，特別難於克服）；須要克服和這些殘餘相聯繫着的習慣與保守性底巨大力量。

認爲所有的『勞動者』都同樣地能夠從事於完成這種工作的那種假定，只是一句空話，或者只是一個陳腐的人，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底幻想。因爲這種能力，並不是從它自身產生的，而是歷史地生長起來的，並且它也只有從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才能够生長出來。只有無產階級，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開始時，才握有這種能力。無產階級能夠完成擺在這個道路上的巨大任務，第一，因爲它是文明社會中的最強大的與最先進的階級；第二，因爲它在最發達的國度裏邊構成人口底大多數；第三，因爲在像俄羅斯這種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中，人口底大多數乃是由半無產者構成的，即是由那些在一年的某些時間內經常地過着無產階級生活，在某些時間內，經常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僱傭工作以謀生的人們所構成的。

誰想從關於自由、平等、民主一般，以及以勞動、民主、平等，等等的一般詞句爲出發，來解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任務（如考茨基、馬爾托夫以及『百恩』



黃色國際底其他英雄們所作者)，那誰就因此而暴露了他們的在思想關係上奴隸式地跟着資產階級背後的小資產者、庸人俗子、市儈本質罷了。只有對於取得的政權的獨特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與勞動人口中的全體非無產階級以至半無產階級羣衆之間的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是在幻想地協調的『理想』條件當中形成起來的，而是在資產階級底凶猛的與多方面的反抗之現實環境中形成起來的——加以具體的研究，才能正確的解決這一任務。

任何資本主義國度，連俄羅斯在內，其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同樣也是勞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已經不止千萬次地由親身和其親朋處，體驗了資本主義底壓迫，體驗了資本主義底無恥掠奪與各種各樣的暴行。帝國主義戰爭，這就是說，爲了決定究竟是英國資本，還是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霸權這個問題而進行的對於數千萬人民的大屠殺，更空前未有地增強了、擴大了、加深了這一體驗，它強迫着人民不能不來認識這一點。因此，絕大多數的人民，特別是廣大的勞苦羣衆，就必然地表現了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同情；因爲無產階級，以無比的英勇和革命的無情推翻了資本金底羈絆，推翻了剝削者，壓服了他們的反抗，無產階級以自己的鮮血，鋪成了創造新社會的道路，而在這個新社會當中，是沒有剝削者存在的餘地的。

不論勞動人民之中的非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羣衆，在資產階級的『庇護』之下，他們向着資產階級『秩序』方面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與搖擺性，是多麼巨大和如何

不可避免，但是他們却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權威，——無產階級不僅可以推翻剝削者，壓服他們的反抗，並且也會建立新的、更高級的社會聯繫、社會紀律；有階級覺悟的和親密團結的工作人員底紀律，這些工作人員不知道什麼是壓迫，並且，除了他們自己的團結，除了他們自己的具有更高級覺悟程度的、勇敢的、結實的、革命的、和可靠的先鋒隊底權力之外，他們不知道更有其它權力。

無產階級爲了取得勝利，爲了建立與鞏固社會主義起見，它必須完成以下的兩重的或雙重的任務：第一，以其反對資本的革命鬪爭之無比的英勇氣概，去吸引全體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羣衆，吸引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來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的壓服資產階級的反抗；第二，領導全體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羣衆，以及所有的小資產者階層，踏上新經濟建設的道路，踏上創造新的社會聯繫，新的勞動紀律與新的勞動組織——它將把最近代的科學和最新的資本主義技術，跟從事於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之有階級覺悟的工作人員羣衆團體結合起來——的道路。

第一個任務比第二個任務要難些，因爲這個任務不能由個別突發底英勇氣概來完成；它須要最長久、最頑強和最艱苦的羣衆工作與日常工作底英雄主義。但是這個任務，比起第一個任務來則更加重大，因爲，歸根結底，唯有新的更高級的社會生產方式，唯有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和 small 資產階級的生產，唯有這一點，

才能够作為戰勝資產階級的力量底最深的源泉，才能够作為這種勝利底堅實性與永久性底唯一保證。

× × ×

『共產主義禮拜六』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歷史的意義，正是因為它表明了工人在發展勞動生產率上、在採用新的勞動紀律上、在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與生活條件上的自覺的與自願的主動性。

J·雅各比，是德國區區少數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之一——在事實上，說得正確些，應該說他是德國例外的罕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之一——，他在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教訓之後，不但沒有跑到沙文主義或國家自由主義那方面去，反而跑到社會主義這方面來了。他曾經說過：一個職工會底成立，比之薩多瓦 (Sadowa) 戰役還具有更大的歷史的意義。這是對的。薩多瓦戰役，曾經決定了以下這個問題，即：在建立一個民族的德意志資本主義國家一事上，奧地利與普魯士這兩個資產階級君主國，究竟那一個將在其中取得領導權。而一個職工會之成立，則是表示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小小進步。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莫斯科·卡桑鐵路工人，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在莫斯科所組織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禮拜六，較之興登堡、或福煦、或英人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具有更偉大的歷史意義。帝國主義者底勝利，不過是爲了英、美、法財閥底利潤而對於千百萬工人之屠殺行爲；它正表現了

衰老的、過飽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底殘暴性。而莫斯科·卡桑鐵路工人底共產主義禮拜六，則是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細胞之一，這個社會會把全地球上的一切人民，從資本主義底羈絆之下和戰爭中解放出來了。

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及其僕從，包括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在內，慣於自命爲『輿論』底代表；自然，他們對於共產黨人底希望，加以嘲笑，把這種希望叫做『在木犀草花盆中的一株木棉樹』，他們譏笑跟大量發生的偷竊、懶惰、生產力降低、損壞原料、以及毀壞製成品等等事情比較起來而爲數微少的共產主義禮拜六。我們答覆這些老爺們說：如果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以他們的知識和學問來幫助勞動者，而不是幫助俄國的以及外國的資本家去恢復他們的政權，那麼，革命還迅速得多、更和平得多。但是這只是空想而已，因爲問題是由階級鬭爭來決定的，而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則傾向資產階級那方面去了。無產階級不是在知識份子的援助之下，而是在不顧知識份子的反抗（至少在大多數場合之下，是這樣的情形）之下得到勝利的，它驅除了那些難以矯正的、固執不移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把那些動搖的知識份子加以改造、重新教育，使之服從自己，而逐漸地爭取更多更多的知識份子到自己方面來。對革命底困難與挫折之幸災樂禍，狼狽情緒之撒佈，復古之宣傳——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運用的階級鬭爭的武器和方法。無產階級是決不會讓它自己被這些東西所欺騙的。

就問題底本質來說，難道在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即新的生產方式，不經過很多次的挫折、錯誤與倒退，而能够立即根深蒂固嗎？在農奴制度廢除以後有半世紀之久，在俄國的農村裏，還依然留存着不少的農奴制度底殘餘。在美國廢除了黑人奴隸制度後有半世紀之久，黑人底地位，還往往是半奴隸制的。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包括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他們在給資本服務上面，在保存澈頭澈尾的虛偽的論據上面是忠於他們自己的；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前他們却非難我們爲烏托邦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他們要求我們幻想地迅速的消滅過去底痕跡。

但是我們却不是空想家，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的『論據』底真正價格；我們也知道，在革命過後的某些時間當中，在道德上舊東西之遺跡不可避免地會凌駕於新東西之幼芽以上。當新東西剛剛生出的時候，在相當時期以內，舊東西總是保留着，且比新東西更強大些，這種情形，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當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對於新東西嫩芽底軟弱所加的嘲笑，低廉的知識份子的懷疑主義、以及其他等等，所有這些，在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之方法，都是保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我們須要細心地研究新東西底嫩芽，須要對它們加以最大的注意，用儘一切方法去扶植它們的生長，並加以『撫育』。其中，有些嫩芽將不可避免地要死亡的。我們還不能絕對地担保說，『共產主義禮拜六』將會起特別重

要的作用。但是，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要培養新東西底一切嫩芽；而生活將會選擇其中最富有生氣的、最適於生存的。如果一個日本的科學家，爲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起見，曾經耐心地作六百零五次的藥品試驗直到他製出可以滿足某種要求的六零六藥品爲止，那麼，誰要解決一個更困難的戰勝資本主義的任務，誰就應當具有千百次地試驗鬪爭底新方法、新手段、和新武器的頑強性，以便能從其中製成最合用的東西。

『共產主義禮拜六』之所以具有這樣的重要性，是因爲它是由絲毫沒有享受到例外地良好的生活條件的工人所開始的，是由各種專業的工人，甚至無專業的不熟練的處在平常的條件之下，亦即處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之下的工人所首創起來的。

我們都深知，不僅在俄國一國可以看到，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可以看到，勞動生產率降低底主要條件，乃是：破產與貧困，由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怨恨與疲憊，疾病與飢餓。就重要性說，後者尤其佔有首要的地位。飢餓——這一點乃是它的主要原因。而爲了消除飢餓的現象，我們就必須在農業中，在運輸業中，在工業中提高勞動底生產率。因之，這樣，便造成了一種有害的循環：爲了提高勞動生產率起見，我們必須從飢餓中把自己拯救出來，而爲了從飢餓中把自己拯救出來起見，我們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家都知道，這樣的矛盾，只有在實踐當中，用突破

這種有害的循環，用轉變羣衆情緒，用個別團體底英勇的倡導等方法——這種倡導或創造性，在羣衆情緒的轉變上，往往起着決定的作用——才能解決的。莫斯科的不熟練勞動者和鐵路工人（自然，我們是指他們的大多數而言，而不是指那些極少數的牟利之徒、官僚份子，以及其他的白黨匪徒而言），是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生活着的勞動者。他們經常是半飽半餓的，而在目前，在農產物新收穫之前，在糧食情勢一般地愈加惡化的情況之下，他們是真正地陷於飢餓狀態中了。然而這些陷於飢餓狀態中的工人，在資產階級——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惡意的、反革命的煽惑與鼓動底包圍之中，却組織了『共產主義禮拜六』，不受任何報酬地從事於額外工作，並且不管他們如何疲憊不堪，如何爲飢餓弄得極爲痛苦和精疲力竭，然而他們竟能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難道這還不是偉大的英勇氣概嗎？難道這還不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底開端嗎？

歸根結底，勞動生產率乃是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底最重要、最主要的因素。資本主義曾經創造了爲農奴制度所不能想像到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社會主義創造一種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能够徹底被戰勝，而且它將要徹底被戰勝了。這是一件很困難和費時很久的事情；但是它已經開始了，——而這一點，便是問題底主要點。如果在飢餓的莫斯科，在一九一九年夏季，經歷了四個艱苦年頭的帝國主義戰爭和一年半更加艱苦的國

內戰爭的飢餓的工人，能夠開始這樣偉大的工作，那麼，到了後來，當我們在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並贏得了和平的時候，它以後更將要怎樣的發展下去呢？

和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比較起來，共產主義乃是自願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團結起來的、使用進步技術的、工人底更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禮拜六』之所以異常珍貴，就在於它是共產主義之實際的開始；而這一點，却是很稀有的事情，因為我們現時正是處在『只是作了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初步』（正如我們的黨綱所正確指出的）的階段當中。

當普通工人關於提高勞動生產率，關於保護每一普特五穀、煤、鐵、以及其他生產物，表現出可以克服一切障礙的自我犧牲的關心時，共產主義就開始了；他們所保護下來的東西，並非歸於工作者個人及其『近親』所有，這些東西是歸於他們的『遠親』，也就是說，歸於整個的社會，歸於千千萬萬的人民所有的，——這些人民起初是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就成爲一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了。

在『資本論』裏面，卡爾·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關於自由與人權的誇張的和華而不實的大憲章，曾加以嘲笑，對於關於一般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這些詞句，曾加以嘲笑，這些詞句，曾經迷惑了一切國家的小資產階級和庸人們，連目前的可鄙的『百恩』國際底可鄙的英雄們，也包括在內。馬克思則以簡單的、樸實的、實事求是的、日



常的無產階級提出問題的方法：在立法上規定縮短勞動日——這是無產階級提出問題的一個標本的例子——跟這種華而不實的權利宣言對立起來。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展開得愈多，則馬克思的觀察底敏銳性與深刻性，在我們的面前顯露得亦愈加清楚，愈加明顯。真正的共產主義底『公式』，和考茨基、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他們的『百恩』國際的親愛的『弟兄們』底華而不實的、雜亂的、伴爲莊重的玩弄詞句不同之處，就在於：這些『公式』，把每一件事情都歸結於勞動底條件。還是少說些什麼『產業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治政府』，以及類似這種胡說空談吧！我們這個時代的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在這些誇張的詞句裏面是很容易地辨別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虛偽與不忠實的，正如具有常識與經驗的普通人，把一個『偽君子』底『油滑的』面貌和外表瞥一下，就一下子毫無錯誤的確定他『十之八九是一個騙子手』。

少說些美麗的空話，多作些簡單而日常的事情，多多關心每一普特的穀物和每一普特的煤炭吧！對於飢餓的工人和襁褓的、赤足的農民所需要的這種每一普特的穀物和煤炭之供給要更多的予以注意，但這種供給，却不應用講價錢的方法，不應用資本主義式地來完成，而應該用像莫斯科·卡桑鐵路不熟練勞動者和鐵路工人那樣的單純勞動者底階級覺悟的、自願的、無比英勇的工作來完成。

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玩弄

詞句的態度來處理革命問題的遺跡，現時在每一步的工作上，在任何地方，甚至於在我們自己的隊伍當中，都顯露出來了。譬如說，我們的報紙，對於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過去底這種腐朽殘餘，很少加以反對；對於真正的共產主義底單純的、質樸的、日常發生的、然而生氣勃勃的幼芽，很少予以幫助。

試就婦女的地位來說。不論在全世界上，或在最先進的某一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在幾十年來，不論那一個民主主義的政黨，在這一方面，都沒有作過我們在取得政權後第一年中所作的百分之十的事情。照字面的意義來說，我們對於那些將婦女放在比男子更低一等地位的卑劣的法律，對於那些限制離婚的法律，對於那些與離婚相聯繫的，諸種醜惡形式的法律，對於那些不承認私生子的法律，對於探索私生子父親的法律等等，並未留下絲毫的遺跡，在一切文明的國度中，這些法律底殘餘，是極其衆多的，這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底恥辱。我們實在有權利可以自己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自豪。但是我們將舊的資產階級的法律及制度底垃圾，從地上掃的越乾淨，那麼，我們對於下面看的也越發清楚：這只是爲新的建築清除地基；而這種建築本身還沒有開始呢。

不論所通過的一切解放婦女的法律如何如何，但婦女還仍然是家庭的奴婢，因爲：瑣屑的家事，還在壓制着她，窒息着她，使她變爲愚蠢，使她退步，把她束縛在廚房中和對於兒女的哺育上，把她的勞動，浪費在極端不生

產的，瑣屑的、絞碎神經的、令人愚蠢的、令人遲鈍的工作上面。只有反對此種瑣屑的家務的羣衆鬭爭（爲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開始的時候，或者毋寧說，只有把這種對瑣屑的家務，加以大規模的改造而成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真正的婦女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才會開始的。

我們在實踐當中，對於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無可置辯的——是否予以充分的注意呢？自然，沒有。我們對於現在在這一領域內已經有的共產主義的幻芽，是否予以足够的注意和關懷呢？我們必須再一次強調地指出：還是沒有！公共食堂、托兒所、幼稚園——這些東西，正是這種幼芽底雛型，正是單純的平常的手段，這種手段並沒有帶着絲毫浮誇的、虛有其表的、華而不實的性質，但是它們却能夠在事實上解放婦女，它們能夠在事實上減少並消滅就婦女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說來她們與男子不平等的那種情形。這些手段，並不是新的，它們（正如社會主義底一切物質先決條件一樣）是由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但是在資本主義下面，第一，這些手段，還仍然是稀有的東西，第二，——特別重要——這些手段，不是牟利的企業（隨之而來的，便是投機、謀利、欺詐、詭騙等等惡劣的方面，樣樣俱全），便是『資產階級慈善底把戲』，優秀的工人都是憤恨和蔑視此種東西的，那是很對的。

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這類機關逐漸增加起來了，而且

它們的性質，正在開始改變着。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握有組織才能的人，遠較我們所知道的爲多，這一點也是毫無疑義的，這些人們握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她們能夠爲着這個目的很實際地組織並吸收大量的工人和更大數量的消費者，並沒有很多的空談、紛擾、喧嚷、關於計劃、制度的廢話等等——而這些東西，却正是自滿的『知識份子』或未成熟的『共產黨員』所『害』的毛病。但是，我們却没有以足夠的關心來培育這些幼芽。

看一看資產階級吧！關於它所需要的東西，它善於作出多麼好的廣告啊！凡在資本家眼中認爲『模範的』企業，是怎樣的在他們的千百萬份的報紙上備加讚揚啊！試看『模範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如何地變成了國民的驕傲底對象啊！而我們的報紙，却不關心於，或差不多完全不關心於描述我們最好的公共食堂或托兒所，以便藉每日的、經常的激勵，使其中某些食堂或托兒所，能夠變爲模範，並宣揚它們詳盡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之下，能夠怎樣節省人的勞動，能夠怎樣爲消費者謀取便利，能夠怎樣節省生產物，能夠怎樣使婦女從家庭奴隸狀態之下解放出來，並能夠怎樣使衛生無條件獲得改善，詳盡地描述這一切都可做到，都可普及於全社會，普及於全體勞動者。

模範的生產，模範的共產主義禮拜六，在獲得和分配每一普特穀物時足資模範的關注和大公無私的態度，以及模範的公共食堂，某某工人公共宿舍、或某某弄堂底模範的清潔等等——對於所有這些東西，我們的報紙，以及每

一個工人和農民的組織，都應當予以比現在更多十倍的注意和關注。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共產主義底幼芽；而哺育和培養這些幼芽，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責任。不論我們的糧食情形和生產情形如何困難，但是在布爾塞維克掌握政權的一年半的期間，在一切戰綫上，無可置疑的，都是有進步的。穀物的收集，已從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自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加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菓蔬生產已經增加了；未播種、糧食不足的情形已經減少了，不管燃料的困難如何巨大，但鐵路運輸已開始有所改善了，等等，等等。在這種一般的背景和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支持和幫助之下，這些共產主義底幼芽，是不會凋謝下去的；它們將日益生長、開花、而成爲完全的共產主義。

× × ×

對於『共產主義禮拜六』的意義，我們必須好好地加以思索，以便從這個偉大的開端中作出非常重要的實踐的教訓，而且這些教訓正在作着。

第一個和主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對於這種開端必須予以全面的幫助。我們中間把『公社』這個字，應用得太隨便了。由共產黨人所主持、或在他們參加下的一切企業，往往都立即被宣稱爲『公社』，並且往往忘掉了：這個光榮的稱號，是應當由長久而頑強的努力來取得的，是應當由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的實際的成就來取得的。

所以，在我的意見看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人頭腦中已經成熟的那種廢除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公社』稱號命令的決定——是很對的。讓它們的名稱更簡單一些吧！順便說一句，新的組織工作底第一階段上底缺陷與弱點，就不致再歸之於『公社』，而應（最公平地說來，它們也應當）歸之於壞的共產黨員了。把『公社』這個字從日常的使用中捨去不用，禁止每一個初來的人攫取和使用這個字眼，或者只承認真正的公社，始能具有這個稱號——這種真正的公社，須在實踐上證明（並經周圍的全體居民一致加以證實）它們善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處理事物的能力，如果我們這樣做時，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首先要證明：你能够為全社會底利益，為全體勞動者底利益而無報償地從事工作的能力，證明你能够『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的能力，你能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能够以模範的方法處理事物的能力，然後再伸出你的手來接受『公社』這個光榮的稱號吧！

在這一方面說來，『共產主義禮拜六』乃是一個最可貴的例外；因為莫斯科·卡桑鐵路上的不熟練勞動者和鐵路工人，首先用行動表明了他們能够當作一個共產主義者而從事工作，後來他們才給自己的開端取了『共產主義禮拜六』這個名稱。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將來，凡是將他的企業、機關或事業稱作『公社』，而沒有用堅苦的勞動和長久勞動的實際成就，用模範的和真正共產主義處理事物的方法證明的人，對他都要無情地加以譏笑和污辱，把他視作

騙子或空談家。

『共產主義禮拜六』底這種偉大的開端，在別的關係上，在清黨上，也應當加以利用。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中，大批『忠實的』和具有庸俗情緒的人們特別胆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然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也包括在內——人人都實行怠工，而卑躬屈膝於資產階級之前，在這種時候，投機家以及其他有害的份子，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夠避免這種情形的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全部的問題是在於：這個當政的政黨，要能夠依賴於一個健全的和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它自己的隊伍。

在這一關係上，我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這種工作了。我們還須要不屈不撓地並不疲倦地把這種工作繼續下去。動員共產黨員上前綫作戰這件事情，曾經幫助我們把胆怯的人和一些無賴的傢伙都從黨內趕出去了。眼中釘除去了！黨員數量的這一減少，乃是黨的力量與勢力底巨大的增加。我們應當利用『共產主義禮拜六』底開端繼續實行清黨，只有在經過六個月的（譬如說）『考驗期』或『試驗期』之後而『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的人，始得吸收其入黨。所有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入黨，而沒有經某種特殊勞動或服務，證明自己絕對可靠、忠實、並可以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黨員，都必須加以這同樣的檢查。

爲了不屈不撓地提高黨的關於真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

求而實行清黨，將會改善國家政權機關，而且它將會更加接近於使農民最後地過渡到革命的無產階級這方面來。

『共產主義禮拜六』把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機關底階級性質，更加明顯地顯露出來了。黨底中央委員會草擬了一封關於『以革命的態度和方式從事工作』的指示信\*。而這個意見，乃是由擁有十萬到二十萬黨員的黨底中央委員會提出來的（我現在假定這個數字是在澈底清黨以後所留下的數字；在目前，黨員的數目比這要大些）。

這個意見，為組織在職工會裏的工人所贊成。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他們的數目，約達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的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國家，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二十萬人與四百萬人：這就是『齒輪』底相互關係（如果人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以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幾千萬的農民，這些農民已經分裂為三個主要的集團，即：首為數量最多、與無產階級最接近的半無產者或貧農；次為中農；最後，則為數量很少的富農或農村資產階級。

只要買賣穀物和在飢荒中買空賣空的可能性存在一天，那麼，農民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相當時期之內，這是不可避免的）仍為半勞苦者和半投機營利者。作為一個投機營利者，他是敵視我們，敵視無產階級國家的；他是傾向於跟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忠實的走卒贊成穀物貿易自由的——直到孟塞維克謝爾，或社會革命黨人車爾南柯夫

\*即『俄共（布）中央關於東綫形勢提綱』，見全集二二四——二二六頁——校閱者



爲止——相妥協的。但是作爲一個勞苦者，農民却是無產階級國家底朋友，却是工人在反對地主與反對資本家的鬭爭中的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爲一個勞苦者的農民，作爲勞苦者的廣大的農民羣衆，對於由十萬或二十萬人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個先鋒隊是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構成的——所領導的國家『機器』，是會予以支持的。

一個更民主的國家——在民主這個字的真正的意義上說——，一個與勞苦和被剝削羣衆更密切聯繫的國家，在世界上還是沒有過的。

正是此種被稱爲『共產主義禮拜六』而且實行於生活的無產階級的工作，澈底鞏固了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尊崇與愛護。這樣的工作，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工作，才使農民澈底信服了我們的正當，信服了共產主義的正當，而使農民成爲我們的熱誠的同道者，這就是說，這樣的工作將使糧食困難要全部克服，將在穀物生產與分配問題上使共產主義要完全戰勝資本主義；將使共產主義要絕對鞏固起來的。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從破壞數百年來的舊制度 到創造新制度

我們的報紙曾經討論了共產主義勞動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首先，應當好好地弄清楚，這個問題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只有在把地主與資本家剝奪之後，只有在取得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決定地戰勝了那些組織着死命的反抗、反革命的叛變、和國內戰爭剝削者之後，才能够在實踐上提出來。

在一九一八年初，這樣的時期好像是已經到來了，而且事實上在德國帝國主義進攻俄羅斯的二月（一九一八年）出兵之後，也確實到來了。不過那個時期來的極為短促，以致新的、更凶猛的、反革命的叛變和襲擊浪潮又迅速爆發了，使蘇維埃政權沒有可能仔細地和頑強地研究和建設問題。

現在我們曾經經歷了二年飢荒、貧困、災難之空前未有的，且令人難以置信的諸困難，同時，也經歷了紅軍對

國際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集團空前未有的勝利。

現在，有着嚴重的機會，令人希望（如果法國資本家不鼓動波蘭對我們作戰）我們可以得到更固定更長久的和平了。

在這二年中間，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上面我們已經有了若干建設經驗。關於共產主義勞動的問題，或者，更正確些說，不是關於共產主義勞動的問題而是關於社會主義勞動的問題，可以而且應當直接提出了，因為我們不是就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新社會制度底最高發展階段，而是就這個新社會制度底最低階段，初步發展階段來說的。

共產主義的勞動，照這個名詞底較狹的和較嚴格的意義來說，乃是為社會的利益而做的不取報償的勞動，不是為了服一定的義務，也不是為了獲得若干生產品的權利，也不是依照了事先規定的和法定的比率而進行的勞動，而是一種自願的勞動，無比率的勞動，不希冀報酬，無報酬條件的勞動，習慣於為了共同利益並根據為共同利益而勞動之必要性的自覺的態度而進行的勞動，作為健康身體底要求而進行的勞動。

人人都明白：我們，即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制度，距這種勞動底廣泛的真正羣衆性的應用還是很遠很遠的。

但是前進的無產階級全體（共產黨與職工會）及國家政權已經提出這個問題，這一點，乃是這條道路上的前進一步。

為要作更大的事情，應當從小的事情着手。

在另一方面，在『大事情』之後，在推翻資本家底私有財產制而將政權交給無產階級的國家變革之後，在新的基礎上建設經濟生活，只有從小的事情才能着手。

共產主義禮拜六，勞動軍、勞動服務——這便是社會主義勞動與共產主義勞動底在不同的形態上的實行。

在這一實行中還有許多的缺點。只有那些完全不會思考的人們，才能够以這些缺點作為嘲笑的材料，關於資本主義底辯護士，就不用說了。

在這樣嶄新的、這樣困難的、和這樣偉大的事情上面，缺點、錯誤、過失是免不了的。誰害怕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誰如果被這些困難所嚇倒，誰灰心喪志或驚惶失措，那誰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建立新的勞動紀律，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繫之新形式，建立吸引人們從事勞動新的形式與新的方法——這是一種需要好多年、乃至高好幾十年的工作。

這是一種最高尚最高尚的工作。

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壓服了資產階級的反抗，而能够給自己取得在其上可以進行這種工作的地盤，這是我們的幸運。

我們將用我們全部力量來進行這一工作，堅忍、堅決、心中意願、決心、不惜千百次試驗千百次改正、以期無論如何達到目的的能力——這些品質，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前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中所鍛鍊成的，它是在十月革命後二年間遭受空前未有的困苦、飢餓、破產與災

---

難，而鍛鍊了這些品質。

無產階級底這些品質，乃是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保證。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

## 第五篇

關於改善國家機關  
與反對官僚主義和  
官僚習氣底鬭爭

(劉記與信件)

## 蘇維埃機關行政條例草案

### (一)

各蘇維埃機關中一切行政問題的集體討論與決定，應隨以確定担任蘇維埃職務的每個人員底最確切的負責制度，以完成一定的、明白規定了的任務與實際工作。

這個條例——要是沒有這個條例，則對每一個職務和每一個工作實施真正的監督，對每一個職務和每一個工作選擇最適當的人選是不可能的——從即日起務須要絕對執行。

因此，每一個蘇維埃參事會(Collegium)和每一個蘇維埃機關，務須毫無例外地立即：

第一，通過一個決議，以便將工作和責任準確地分配給參事會底一切委員或公務人員。

第二，極明確地規定那些執行個別任務——不論這是什麼樣的任務，特別是有關於迅速而適當地徵集和分配物資與生產品的任務——的人們底責任。

這項條例，凡一切蘇維埃機關，特別是地方的、縣

的、及城市等等的國民經濟會議和執行委員會底經濟部，都務須絕對執行。這些經濟部和國民經濟會議，務須立即委派一定的人員，令其負責迅速而適當地徵集爲人民所需的每一種原料和生產物。

一切居於領導地位的蘇維埃機關，如像執行委員會，省的及市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等等，爲了將認真監督切實實行中央當局及地方機關底決議一事放在首位起見，均務須立即將自己的工作加以改組，至於其他種類的工作，則應儘量移交給由各該機關少數工作人員所組成的輔助委員會去處理。

## (二)

爲了反對官僚習氣，爲了更能有成效地發現濫用職權，並爲了揭露和排除混入蘇維埃機關裏來的不良公務人員起見，特規定以下的條例：

每個蘇維埃機關，爲了使人人不用通行證都可入內起見，不僅在其辦公室內面，而且在外面，均須張貼接見公衆日期與時間的規則。會客室底佈置，務須使人得自由入內，決不需任何通行證。

每一個蘇維埃機關，都須設置一本來賓登記簿，以便以最簡略的形式，將來者姓名、意見要點及接洽事項登記下來。

星期日及假日，亦須規定接見人民的時間。

在接見人民時，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公務人員得有權



出席，並負有隨時巡視接見、檢閱來賓登記簿、編寫關於巡視、檢閱來賓登記簿、以及公衆質問等報告之義務。

勞動、國家監察、司法等人民委員部務須在各處設立問訊局——須將辦公日期和時間，通告人民，同時，一切人等皆可自由進出，無需通行證，亦不須交納費用——即星期日亦須辦公。

這些問訊局不僅須答覆人民的一切詢問——口頭的或書面的，並須替不識字者及不會寫明白的陳訴書者，免費代寫書面的陳訴書。凡允許參加蘇維埃的一切黨派底代表——未參加政府的各黨，尤須吸引參加——以及非黨的職工會及非黨的知識份子聯合會底代表，均須吸引參加這種問訊局的工作。

### (三)

保衛蘇維埃共和國底事情，迫切地要求我們要最大限度地來節省力量，並用最生產的方法來應用人民的勞動。

爲了達到這些目的起見，茲規定——首先是對一切蘇維埃機關，並適用於所有一切的企業與業務會議——如下：

(一) 所有一切蘇維埃機關底每一個稍微獨立的部門，須於三日之內關於以下幾點，向各地方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並須向司法人民委員部）呈交簡略的報告：  
(A) 機關名稱；(B) 部門名稱；(C) 其工作內容概述；  
(D) 處、事務或其他劃分底數目及其名稱表一份；(E)

男女兩性的工作人員數目；(F) 事務底全貌——就其譬如說，用事件底數目，通信底數量，凡類似標誌所能表現者。

各地方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須取得司法人民委員部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底同意）務須立即：（一）設法檢查上述條例底適當的與適時的執行情形；（二）在接到上述呈報後一星期之內，擬就調整、聯合、及合併處理同樣或同種事務的各部之計劃。

上述各機關指派執行此項任務的委員會，應包括內政、司法、國家監察、勞動等人民委員部底代表，如有必要時，其他各部代表亦可參加。此項委員會，關於合併同種部門以及節省勞動所進行的情形，每週務須作成簡要的報告，呈交人民委員會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二）有同種部門或機關——中央的、州的、市的、省的、縣的——的每一個城市裏，爲了最大限度地節省力量起見，應立即在最高機關之下，成立委員會，以調整和合併所有這些機關；此項委員會並須依照第一條所指出的條例與日期，進行工作。

（三）依同樣的理由，責成此項委員會（如第一點及第二點所指明者），採取迅速的辦法，盡量地以女性勞動來代替男性勞動，並將那些能夠調至軍隊中或在軍隊之下工作、或担任其他具有執行性質與實際性質而非辦公室的工作之男子，編成名冊。

(四) 取得俄國共產黨地方組織底同意，責成此項委員會（如第一點及第二點所指明者），進行這樣的人員調動，即僅將俄國共產黨黨員（黨齡不下於兩年者）留下担任領導的與負責的職位；而其餘的職位，則須由非黨的人們或其他黨派的黨員來充任，以便儘可能地將俄國共產黨黨員解放出來，担任其他工作。

俄國共產黨底一切組織，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這項命令後一星期以內，務須在所有的黨證及登記證上，填入該黨員係自何時起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材料。

沒有這樣的材料及無法收集這樣的材料時（這可由不下三個具有兩年黨齡的俄國共產黨黨員的簽字來審查），在每個黨證或黨員登記證上，應註明『何時入黨不明』的字樣。

凡担任某項蘇維埃職務的一切俄國共產黨黨員，務須立即在他們的黨證上簡單註明，在最近五年當中，該人曾屬於何黨或與何黨聯合過；這種註明，須經黨的組織底主席或書記加以證明。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給各人民委員部參事會  
一切委員及人民委員長

茲隨書附上『執行蘇維埃共和國底法律』小冊子一冊，請對該小冊子內所轉載的第六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法律，加以注意。

此項法律，有嚴格執行的絕對必要，切勿忘記。

人民委員會主席

烏理亞諾夫（列寧）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

## 關於職工會中的官僚主義問題

### 給 M. P. 湯姆斯基的信

湯姆斯基同志：

請將下面的信，轉交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及該會共產黨黨團。

親愛的同志們！

茲寄上關於揭發在最重要的實踐事實上所表現的驚人的官僚習氣、疏忽怠慢、官僚主義、對事無力勝任的報告一份。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在我們所有的一切人民委員部中，官僚主義還是很多的。

但是我却不曾想到，在職工會裏面，官僚主義也是不少的。

這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我誠懇地請求你們在全俄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將所有這些文件加以宣讀，並擬就實踐的辦法，以反對官僚主義、官僚習氣、懶惰和力不勝任的現象。

將這件事情的結果，務請告訴我。

麥爾尼昌斯基自己，曾以電話告訴我這一萬個金屬工人的事件。我曾向交通人民委員部大鬧了一次，可是現在，麥爾尼昌斯基同志却使我失望了。……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Y·烏理亞諾夫（列寧）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 關於草擬工農檢查人民 委員部條例給斯大林的信

斯大林同志鑒，並抄送阿範尼索夫、湯姆斯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奇斯烈夫均鑒：

余意應根據中央委員會所給予的指示，將三個草案合併爲一個。

余意再附加以下幾點：

（一）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工農檢查『處』，應當是一種暫時的機關，其任務爲將工農檢查制置在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底一切處裏面去，到那個時候，作爲一個單獨的處之它也就消滅了。

（二）目的：吸收一切勞動者，男性，特別是女子，來參加工農檢查底工作。

（三）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地方上應編成表冊（根據成份）等，將機關工作人員等等除外，至其餘一切人員，則須依次輪流參與工農檢查機關底工作。

（四）這一參加，應依據參加者底發展程度而採取各

種不同的形式：從不識字和完全不發展的工人和農民底『傳說』者或證明者或理解者或學徒之作用起，直至經過多少考驗的識字者、發展者底全部權利（或差不多全部的）為止。

（五）對於生產品、貨物、用品、工具、物材、燃料等等（特別是食堂，等等）之審核，須加以特殊的注意（可草擬嚴密的規則），而工農檢查機關則須對此實施更廣泛的統制和監督。

務須毫無例外地吸引婦女來參加這個工作。

（六）爲了不要因吸引大批人參加而發生混亂起見，應規定吸引底次序等並須縝密地想就參加底形式（一次只須吸收兩個或三個人即可；在罕有或特殊的場合之下，才可以使參加者多一點，以免轉移公務員對工作之視線）。

（七）應擬就詳細而周密的指示。

（八）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底官吏，第一，務須（依照特殊的指令）吸引工農檢查機關底代表（或團體）共同合作，參加他們各方面的工作；第二，務須向非黨的工農代表會議，發表演說（關於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原則及其方法的演說，此項演說須依照經過特別批准的綱領，而且是很通俗的：如不發表演說，則可宣讀我們行將出版的小冊子——即由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和阿範尼索夫在黨的特別協助之下將要出版的小冊子——以及對它的註解）。

（九）逐漸地邀請各地的農民（務須是非黨的農民）



來參加中央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起初可由每一省派一個或兩個人（如果不可能找到更多人的話），然後則依交通及其它條件而擴大其人數。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非黨的工人。

（十）逐漸地經過黨及職工會，實施檢查勞動者方面對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的參加情形，亦即經過黨和職工會來檢查是否人人都參加了這個工作，並從參加者學習管理國家大事的觀點看來檢查這種參加底成績如何。

列 寧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 關於用司法手段與官僚習氣 作鬭爭的問題給司法人民 委員長庫爾斯基的信

司法人民委員長庫爾斯基同志、副人民委員長及該部  
參事會全體委員鑒：

我曾經由人民委員會底總務主任將格拉夫邱教授底一  
份意見書及有關於官僚習氣的一些驚人的文件，送給你  
們。

這種官僚習氣，特別是在莫斯科及中央各機關中，乃  
是一種最普遍的事情。因此，在反對這種官僚習氣的鬭爭  
上應予以更多的注意。

我的印象是，司法人民委員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純  
粹形式的，換言之，在根本上是不正確的。

應當：

- (一) 將這種事件交給法庭去處理；
- (二) 在報紙上，對犯罪者痛加申斥，並予以嚴重的  
處罰；

(三) 經過中央委員會使法官們務須知道，對官僚習氣，要嚴厲地予以懲處；

(四) 舉行莫斯科人民法官及法院人員等等會議，以便製定反對官僚習氣的有效辦法；

(五) 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秋季和冬季，務須將莫斯科官僚習氣的案子四件至六件交到莫斯科法院去審判，並且要選擇『最惹人注目的』案件，並對每件案子加以政治上的審判；

(六) 至少從共產黨員中間找兩個或三個反對官僚習氣的最厲害與最強有力的精幹的『專家』（可以聘請索斯諾夫斯基），以便學習清除官僚習氣；

(七) 發表一封關於反對官僚習氣的很好的、有條理的、但不是官僚主義的信（司法人民委員部的通告）。

特將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給司法人民委員長及副人民委員長個人負責，並請將執行的情形經常地通知我。

人民委員會主席

列 寧

一九二一年九月三日

## 關於人民委員會及勞動國防會議工作底新佈置給茨魯巴的信

茨魯巴同志：

由於我們昨天在電話中的談話，以及你的嚴格遵行醫生指示的諾言，我們還須要將整個的工作制度精細地加以討論，且須好好地對這件事情想一下。

人民委員會及勞動國防會議底最基本的缺點，乃是對於工作執行底檢查之缺乏。污穢的官僚主義的泥沼，正在勾引我們去亂寫文件、清談法令及草擬法令，而重要的、生動的工作，則被淹沒在這種紙海裏面了。

聰明的怠工者，正在有意地把我們向這種紙泥沼裏拖曳。大多數的人民委員，以及其他位高職重的人，都不自覺地『向這個圈套鑽』。

你應當執行你的嚴格的療養辦法，不論如何，要丟開無謂的紛擾與忙碌、任命、清談文件、撰寫文件等等，而必須對工作制度加以縝密的考慮，以便根本對它加以改組。

這種改組我們的可厭惡地官僚主義的工作，反對官僚

主義與官僚習氣，檢查工作底執行情形，正是你的工作底重心。

檢查工作執行情形，檢查究竟在實際上作出了什麼工作，——這就是你的基本的與主要的任務；爲此目的，你應當成立一個小的機關（從四個到六個人），由完全經過考驗和可以信任的助手構成之（總務主任、副主任、祕書等等）。

爲了此目的，據我的意見，必須：

（一）將一切小問題，都轉交給小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會議底擴大會議去解決，以減輕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會議底重負。

這只是一個問題。但是，這在我們的可詛咒的奧布羅莫夫式的性格之下，如果對此不加以注意，不加以督促，不加以檢查，不鞭三鞭，那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會『鬆懈』的。

總務主任（以及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會議底祕書處），應慣於嚴格注意，不要使那些小問題，提交到人民委員會及勞動國防會議上去處理，而要使一切問題從頭起濾過三次（詢問各有關的人民委員部；它們的迅速的答覆；法典處亦然，等等，等等）。

應協同戈爾布諾夫★擬就提出及處理問題的書面條例，而每日你本人須至少親自檢查一次：這些條例是否遵

★ 再加上一個法典編纂者，加上一個小人民委員會的代表。

——列寧原註

守，是否達到目的，即：減少文件數量和官僚習氣。使各個人民委員長多加思考，多負責任，以謹慎、持久、認真檢查工作執行及檢查工作經驗，以確立個人負責制，來代替草率擬就的命令（實際上，我們的上級機關、各個人民委員部及其所屬各部門，都是完全沒有負責制的，因而怠工者則大大地利用了這一點；結果，遂產生了奧布洛莫夫主義，而這奧布洛莫夫主義正在毀滅着事情）。

我知道，這是極端困難的。但是正因為困難，所以你才應當完全致力於此。

因此：

（二）會議要盡量少開。次數：人民委員會每週開會一次，又勞動國防會議每週開會一次，會議時間每次各二小時。

（三）最高經濟委員會。它之下的一切分委員會，應從速解散，須要各人民委員長（每人）指定和委任負責的人來擬就草案，以代替這些分委員會，人民委員長則批准這種草案，本人於最短時間內，『取得有關的一切』人民委員長底同意，然後再提交勞動國防會議或人民委員會。

最高經濟委員會只是為了調整工作（整理使之法典化）以及由你與加米業夫予以簡略的檢查（蓋章確定）。

只是爲了這一點而已。

不是爲了清談。

也不是爲了討論。

（四）除了最高經濟委員會以外，你不應加入任何委

員會，堅決地不要加入任何一個。

(五) 制止委員會林立不良現象；用正式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寫成書面意見的辦法以代替之。

(六) 如此，你應當把自己從無謂的紛擾與忙碌中解脫出來（這種無謂的紛擾與忙碌，正在戕害着我們所有的人），以便保證自己能夠冷靜地去思索整個的、全盤的工作——尤其主要地是集中自己的力量去檢查工作執行的情形，反對官僚主義及官僚習氣。

請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考慮，並回覆我。 此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列 寧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第六篇  
社會主義建設  
與  
文化革命諸問題



## 論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所要談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基本任務是什麼，以及和這相關的——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裏面，青年組織一般說來應該是怎樣這個題目。

對於這個問題，更應當多談幾句，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底真正的任務正是擺在青年面前。因為很明顯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訓養出來的一代工人，充其量只能把消滅建立在剝削制度上的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底基礎之任務加以解決罷了。他們充其量只能解決創立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底任務，這制度可幫助無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一個堅固的基礎，而在這基礎上能夠從事建設的，則只有已經在新的條件之下，在人與人之間已沒有剝削關係這種環境之下從事工作的一代了。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討論關於青年任務的問題時，我就要說，這些一般青年尤其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一切其它組織底任務，可以用一句話表達出來，就是學習。

當然，這僅僅是『一句話』罷了。它對於學習什麼，怎樣學習這些主要的和最本質的問題，還沒有給一個答案。而在這兒，問題底焦點就在於：隨着舊的資本主義社會底革新，那將要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的新的後代之學習、訓練與教育，就不能按着舊的方法來施行了。青年底學習、訓練與教育，應當從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材料來出發。我們只有用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知識、組織和機關之總和，只有利用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人力與物力，才能建設共產主義。只有對青年底學習、組織與訓練事業，加以根本改造，我們才能達到這個地步，即青年後代努力底結果，會創造出一個與舊社會不同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所以，我們對於下面這個問題，即我們應該拿什麼去教育青年，而青年們如果真正想要作名符其實的共產主義青年，那麼他們應該怎樣學習，以及我們怎樣訓練青年，使他們能夠完成和解決那我們已經開始了的事業，須要詳細地說一說。

我應當說，第一個而且最自然的答案，似乎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一般凡願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切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不過『學習共產主義』這個答案太一般了。爲了學習共產主義，我們需要些什麼呢？爲了獲得共產主義底知識，我們需要從一般知識總和中分出一些什麼來呢？這裏有許多危險在威脅着我們：當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一不正確地提出來或太片面地來理解的時候，這些危險往往就

表露出來了。

自然，驟然看起來，腦中定會浮出這樣一種思想：所謂學習共產主義，就是攝取共產主義教科書、小冊子、和巨著裏面所闡釋的全部知識，但是對研究共產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那太粗淺太不夠了。如果研究共產主義，僅在於攝取共產主義著作、書籍與小冊子裏面所解釋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會造成共產主義的書呆子或空談家，而這一定要給我們以損害的，因為這些熟讀和背誦共產主義書籍和小冊子裏面所闡釋的人們，一定不會把這些知識融會貫通起來，不會依着共產主義所真正要求的那樣去行動的。

舊的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的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生活實踐底完全分離，因為我們所有的書，都寫的很好，但是這些書在多數場合之下都是些最討厭最虛偽的說謊，它們給我們很虛偽地敘述了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僅僅對關於共產主義的書籍中所說的書本的攝取，那是極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的演說和論文裏面，就沒有簡簡單單的重複從前關於共產主義所說的那回事了，因為我們的演說和論文都和日常的和各方面的工作聯繫起來了。沒有工作，沒有鬭爭，而只是從共產主義小冊子和著作裏面所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書本上的知識，是一文錢也不值的，因為這一知識仍繼續了舊的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這種舊的分離乃是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個最令人厭惡的特色。

要是我們只是開始攝取一些共產主義的口號，那更要危險了。如果我們不及時地認清這種危險，如果我們不把我們的全部工作集中於剷除這種危險，那麼，像這樣研究共產主義以後而把自己稱做共產主義者的青年男女，即使有五十或一百萬，而對共產主義事業僅會予以巨大的損害而已。

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怎樣把這一切配合起來去研究共產主義？我們從舊的學校裏面，從舊的科學中，需要採取一些什麼呢？舊的學校宣稱，它的目標是要造成各方面都有很好教養的人，它要教一般的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說謊的，因為整個社會是建立在並保持在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壓迫者這種基礎之上的。自然，一切舊的學校都是完完全全以階級精神來培養學生的，所以，它只是給資產階級的兒女以知識，它的每一句話都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偽造過的。在這些學校裏面，工人與農民子弟，與其說是受教育，毋寧說是受訓練，使之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它們是這樣的訓練工農子弟的，即：給資產階級造成有用的奴僕，這種奴僕能夠爲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攪他們的安閑生活。所以，在丟棄舊的學校時，我們的任務，只是從其中採取我們爲了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教育所需要的東西。

在這裏，我順便來談一下對於舊的學校底一些指責與非難，這些指責和非難，經常會聽到的，它們往往弄出完全不正確的解釋。人們都在說，舊的學校乃是一種讀死書

底學校，是一種循規蹈矩底學校，是一種機械學習底學校。這是對的，可是我們仍須把舊的學校裏面什麼是壞的，什麼對我們是有用的，加以區別，仍須善於從其中選擇共產主義所需要的東西。

舊的學業是一種讀死書底學校，它強迫人們去攝取一大堆無用的、冗贅的、死的知識，這種知識困累了人的頭腦，把青年人都變成了千篇一律的官吏。但是如果你由此想得這樣一個結論，說：不攝取人類知識所積蓄下來的東西，就可以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那就犯了很大的錯誤了。如果這樣想，以爲學些共產主義的口號，共產主義科學底結論就夠了，而不須攝取共產主義本身乃是其結果的那知識之總和，那就想錯了。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如何從人類知識底總和中產生的榜樣。

你們已經讀過，而且已經聽過，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科學，主要是馬克思所創造的，你們已讀過，而且已經聽過，這種馬克思主義底學說如何已經不再單單是十九世紀底天才的社會主義者底作品了，這一學說如何已經變成爲全世界千百萬無產者底學說了，這千百萬人民在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鬭爭中，正在使用着這一學說。如果你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馬克思底學說會抓住了最革命的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那你就只能得到一個答案：這所以如此者，是因爲馬克思是依靠於資本主義時代所獲得的人類知識底堅固基礎，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以後，馬克思曾懂得了，資本主義發展底必然性——走向共產主

義，而且主要的，他只是根據對這種資本主義社會底最精確、最詳細、最深刻的研究，並靠對於從前的科學所造成的一切東西之完全攝取，才證明了這一點。他把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都批判地加以改造，未加注意的沒有留下一項。他把人類思想所造成的一切，都加以改造，加以批判，根據工人運動加以檢查，而得出了被資產階級的偏狹性所限制或跟資產階級的偏見相聯繫的人們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 例如，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這更須牢記在心裏的。除非對下列一點有清楚的了解，即：只有運用全部人類發展所創造的文化之精確知識，只有把這個文化重行加以改造，才可以建設無產階級文化，除非了解這點，我們是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的。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誰也不知曉的地方跳出來的東西，也不是那些自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們之發明。這完全是胡說八道。無產階級的文化應當是那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之下所造成的知力底合規律的發展。所有這些大路和小徑，曾經、而且正在、並且仍在繼續導向無產階級文化，正像馬克思所改造過的政治經濟學，指示我們人類社會定要走向什麼道路，指出轉向階級鬭爭，轉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一樣。

在青年代表者中間，在擁護新教育的某些人們中間，我們常常聽到攻擊舊學校的言論，說舊學校乃是機械學習底學校，這時我們就告訴他們，我們應當採取舊的學校裏

邊所有的好的東西。我們不要從舊的學校裏邊採取那教青年人死記十分之九無用而十分之一歪曲的一大堆知識的辦法，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只限於共產主義的結論，只熟唸共產主義的口號就夠了，這樣做，你是不會建立共產主義的。只有用人類所造成的一切學識寶藏來豐富自己的意識的時候，你才可以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機械的學習方法，但是我們却需要用基本事業底知識來發展和改進每個學生底記憶，因爲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把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在他的意識中不加以改造，那他不過是一個吹法螺的人，而共產主義也就變成空談，變成了空洞的招牌。你們不僅應當攝取這些知識，而且要這樣的來攝取，即批判地對待它們，不要拿那些無用的材料來困累自己的智力，而要拿一個現代有教養的人所不可少的一切事實底知識來豐富自己的智力。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不進行極認真、極艱苦、極巨大的工作，不分析那些需要批判地處理的事實，只是根據他所獲的現成的結論，以共產主義誇耀，那麼這樣的一個共產主義者，是很可悲的，這樣的淺薄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我知道我知道的很少，那我就努力謀知道的更多些；但是如果一個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不需要知道什麼了，那麼他連一點共產主義者的氣息都不會有的。

舊的學校是製造了一些資本家們所需要的奴僕，舊的學校，把科學家變成應當爲取悅於資本家們而寫作和說話的人了。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清除它。但是清除它，應當

破壞它，這是不是說，我們不應當從其中採取由人類所積蓄下來的爲人類所必要的一切東西？這是不是說，我們不應當把什麼是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和什麼是共產主義所必要的加以區別？

我們可以拿工農底自覺的紀律，去代替那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違反多數人意志而進行的舊的循規蹈矩的方式，工農除了對舊社會的仇恨外，還有爲了這一鬪爭而團結與組織力量的決心、能力與志願，以便把分散在一個龐大的國度疆域裏千百萬民衆底意志造成一個統一的意志，因爲沒有這種統一的意志，那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打敗的。要是沒有工農底這種團結，沒有工農底這種自覺的紀律，那麼，我們的事業是沒有希望的。沒有這，那我們就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們了。我們甚至連這基礎也不能鞏固起來，更談不上在這一基礎上建設成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了。同樣的，我們在否定舊的學校時，在培養對這種舊學校的完全正當的和完全必要的仇恨時，在珍視毀壞舊學校底志願時，我們並須認清，爲了代替舊的讀死書辦法，舊的循規蹈矩辦法，舊的機械學習辦法，我們應當善於給自己採取人類知識底全部總合，並且要這樣的來採取，即使共產主義對你們不要成爲生吞活剝的東西，而要成爲你們自己所深思熟慮的東西，成爲從現代教育觀點上看來乃是必然的結論。

這就是當我們談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時所應當樹立的基本任務。



爲了向你們說明這一點，在同時講到怎樣學習這個問題時，我特舉一個實踐的例子。你們都知道，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在軍事任務——保護共和國底任務之後，還有一個經濟的任務。我們知道，除非復興工業和農業——而且不要照舊的方式去復興它們——那共產主義社會就不能建設成功的。應當在現代的、用最新的科學建設起來的基礎之上，去復興它們。你們知道，這個基礎就是電氣化，只有在全國、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都電氣化的時候，只有在你們熟悉了這個任務的時候，你們才能夠爲自己建設成前輩所不能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從經濟上復興全國，在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改造、恢復工業和農業，而這個基礎則又須依賴於現代的科學，現代的技術，依賴於電氣化。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不識字的人是不適宜解決電氣化的，而且在這裏僅僅識字也還是不夠的。在這裏僅僅懂得什麼是電氣化也還是不夠的，必須要知道在技術上怎樣把電氣應用於工業和農業，應用於工業和農業底各個部門。要自己來學習這一點，並且要教全體的青年勞動大眾來學習這一點。這就是擺在每個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擺在那凡願自稱爲共產主義者並清楚了解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後自己須擔負起幫助黨去建設共產主義和幫助一切青年人去創造共產主義社會任務的每個青年們面前的任務。他應當認清：只有在現代教育底基礎上面，他才能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獲得這種教育的話，那共產主義仍不過是一種願望罷了。

前一代人底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那時的主要任務是：批判資產階級，在羣衆中發展對資產階級的仇恨，發展階級意識，善於團結自己的力量。擺在新一代人面前的任務，則更加複雜了。你們單是把你們的力量團結起來以支持工農政權，反對資本家底進攻，那是不夠的。這是你們應當做的，他們也都很清楚地懂得這一點，每個共產主義者也明白這一點，但是這還是不夠的。你們應當建設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在許多方面，工作底前半部已經作完了。舊的應當加以破壞的已經破壞了，把它應當變爲一堆廢墟的它已成爲一堆廢墟了。地基也已經掃清了，在這地基之上，年青的共產主義一代，應當來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放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底任務，只有掌握了一切現代的知識，把共產主義從現成的念熟的公式、計劃、方案、法規、綱領等等，轉變爲聯合你們的直接工作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爲你們實踐工作底指針的時候，你們不能肩負得起這個任務的。

這就是你們的任務，在教育、訓練和喚醒一切年青人的事業上你們應當拿這一任務爲指針。每個青年男女都應該是共產主義社會底建設者，而在這千百萬建設者中間，你們應該是先鋒隊，不吸引全體工農青年大衆來參加這一共產主義建設工作，那麼你們就不能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的。

在這裏，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個問題，即我們應該怎樣來教共產主義，我們的教育方法底特點應當在什麼

地方？

我在這裏首先來談一談共產主義道德的問題。你們應當把你們自己訓練成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就是要這樣的來佈置自己的實踐活動，即：在學習、組織、團結、鬭爭時，這種青年要訓練自己和一切愛護他的人，要訓練共產主義者。要使現代青年底訓練、教育與學習事業成爲在他們中間的共產主義道德底訓練。

但是有沒有共產主義的倫理呢？有沒有共產主義道德呢？當然是有的。人們往往把事情弄成這樣，好像我們還沒有自己倫理似的，資產階級更常常責罵我們，說我們共產黨員是否定一切道德的。這是一種混淆黑白的方法，一種欺騙和蒙蔽工人和農民的方法。

在什麼意義上，我們否定倫理，否定道德呢？

是在資產階級所說教的那種意義上，資產階級是從上帝十誡中演繹出了這種道德。當然，我們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我們是不相信上帝的，並且我們知道的十分清楚，教士、地主、資產階級則假上帝之名說教，以便實行他們剝削者自己的利益，或者不是從道德底戒律中，從上帝十誡中得出這種倫理來，便是從觀念論或半觀念論的言詞中得出這種倫理，這些言詞總是歸結成很像上帝十誡的東西。

我們否定一切這樣的從超人的，超階級的概念中所得出的道德。我們說這是一種欺騙。這是爲了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而對工人和農民的一種愚民和蒙蔽政策。

我們說，我們的道德是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底階級鬭

爭之利益的，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底利益中產生出來的。

舊的社會是建立在地主與資本家對一切工農底壓迫之上。我們需要破壞這一點，應當拋棄這種壓迫，但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就應當建立團結。上帝是不會創造這種團結的。

只有工廠、作坊、只有受過訓練、從舊的沉睡中醒覺的無產階級，才能給予這樣的團結。只有在這一階級形成的時候，羣衆運動就開始了，這種羣衆運動就要達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結果——在最弱的國度當中之一個國度裏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這個國度，保衛自己抵抗全世界資產階級底攻擊已有三年之多了。我們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全世界上生長着。現在我們根據經驗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造成這樣團結的力量，渙散的農民也都追隨在這種力量之後前進着，這一力量抵抗了剝削者底一切攻擊。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幫助勞苦大衆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澈底堅持，澈底鞏固共產主義社會，澈底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

所以，我們說，在我們看來，超乎人類社會之外的道德是沒有的，那是一種欺騙。在我們看來，道德是服從於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之利益的。

這種階級鬥爭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推翻沙皇、推翻資本家、消滅資本家階級。

一般地說來，階級又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允許社會

底一部份人去掠取另一部份人的勞動的東西。如果社會底一部份人掠取了全部土地，那麼這就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如果社會底一部份人有着作坊和工廠，有着股票與資本，而另一部份人則在工廠裏作工，那麼這就是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

趕走沙皇是不難的——這需要幾天工夫就行了。趕走地主，也是不很難的——這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做到的，同樣，趕走資本家，也不是很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還不能消滅階級；工農的劃分還依然存在的。如果一個農民，耕種着個別的地塊，掠取多餘的穀物——即不論他自己或他的牲畜所都不需要的穀物——而其餘的人却不得不枵腹度日，那麼，這個農民已經變為剝削者了。他所保有的糧食愈多，則他愈覺得有利，至於別人哩，讓他們餓肚皮好了：『他們愈飢餓，我把這糧食賣得愈貴。』須要使人人按照一個共同的計劃，在共同的土地上，在共同的作坊和工廠裏，並且在共同的管理之下來工作。這是不是很容易辦到呢？瞧吧，這並不像驅逐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辦到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這裏就需要無產階級從新教育，從新訓練一部份農民，把那些是勞苦農民的人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以便消滅那些靠別人貧困而發財致富的農民之反抗。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鬭爭底任務，並不因我們已經趕走了沙皇、地主、資本家而完結，我們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秩序之任務，就在這裏。

階級鬭爭仍在繼續着，它不過改變了自己的形式而

已。這是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爲的使舊的剝削者不能復活，並使渙散愚昧的農民大眾聯合起來而成爲一個團體。階級鬥爭仍在繼續着，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這一鬥爭。我們並要使我們的共產主義的道德服從這個任務。我們說：所謂道德，就是用以破壞舊的剝削社會，把一切勞苦大眾團結在創造新的共產主義者社會的無產階級週圍的東西。

共產主義的道德，就是服從於這一鬥爭，把勞苦大眾團結起來，去反對一切剝削，去反對一切小私有產制度的東西，因爲小私有產制度，把整個社會勞動所創造的東西，放在單個私人手中了。

我們的土地，乃是公共的財產。

但是假如從這種公共財產當中我給自己取了若干塊，在其上種了二倍於我所需要的糧食，而用剩餘的糧食來投機漁利，這怎麼辦呢？假如我的算盤是：飢餓的人愈多，他們出的價錢也愈大，怎麼辦呢？我這樣的行爲是否還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呢？不，那是一個剝削者，是一個私有者。這是必須要加以反對的。如果我們允許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的話，那無異開倒車，回復了資本家底政權，回復了資產階級底政權了，這在以前的革命中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爲了使資本家與資產階級底政權不要重新復活起來，那就需要不允許有這種制度，需要使個別的人不要靠剝削其餘的人而自行致富，需要一切勞苦大眾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去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一切共產主義青年組織底基本任務之一個主要特徵。

舊的社會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的，即不是你掠奪別人，便是別人掠奪你，不是你替別人作工，便是別人替你作工，不是你是一個奴隸主人，便是你是一個奴隸。很自然的，在這種社會裏所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自吃娘奶起，就要具有了這樣的心理、習慣、觀念——不是一個奴隸主，就是一個奴隸，否則就是一個小有產者、一個小公務員、一個小官吏、一個知識份子，總之，一個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的人。

如果我只耕種這一塊土地，一點也不管他人的事；如果別人餓肚子，那更好，我把糧食可以賣得更貴些；如果我做一個醫生、工程師、教師、公務員，也只顧自己的小小位置，不管別人的事；或者我以政權獻媚、取悅於那些有錢的人，來保持自己的位置，甚至生活蒸蒸日上，而變成一個有產者。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不能有這種心理和這種情緒的。當工人和農民證明，他們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時候，那麼在這裏，新的共產主義的訓練也就開始了，在反對剝削者的鬭爭中的訓練，與無產者聯合起來以反對自利主義者和小有產者，反對只知謀利而不知有別人事的那樣的心理與習慣的訓練也就開始了。

這就是對青年後輩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這個問題的答案。

只有把自己的學習、訓練、與教育底每一步驟，跟無產者和勞苦大眾反對舊的剝削者社會底不斷的鬭爭聯繫起來，他們才能學習共產主義。當人們向我們談到道德的時候，我們說：對於一個共產主義者，全部道德就在於這種反對剝削者的團結一致的紀律和自覺的大眾鬭爭。我們不相信一種永久不變的道德，並要揭穿一切關於這道德的神話之欺騙。

道德的目的，就在於提高人類社會解除對勞動的剝削。

爲了實現這，那就需要有這樣的一代青年，就是他們在有紀律的卓絕的和資產階級作鬭爭的環境中開始變爲自覺的人們。在這一鬭爭中，他們培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一定要服從這個鬭爭，把自己的學習、教育和訓練上每一步驟都與這鬭爭聯繫起來。

對於共產主義青年的訓練，並不在於給他們作種種愉快的演說和關於道德的規則。訓練並不在於這裏。當人們看到，他們的父母是怎樣生活在地主和資本家壓迫之下，當他們自己參與了那發動了反對剝削者鬭爭的人們所遭受的痛苦的時候，當他們看到，爲了保衛已經獲得的勝利，繼續這種鬭爭，而要付出怎樣的犧牲，當他們看到，地主和資本家是怎樣瘋狂的敵人的時候，——這時，這些人們在這種環境裏就被鍛鍊成共產主義者了。

共產主義道德底基礎，就是力謀鞏固和完成共產主義的鬭爭。這也就是共產主義訓練、教育和學習底基礎。這



也就是對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問題的答案。

如果學習、訓練和教育，限於在學校裏面，而與沸騰的生活浪潮相脫離的話，那我們是不相信它們的。當工農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一日，當學校操在地主和資本家手裏一日，那青年人仍然是盲目無知的。

我們的學校應當教給青年以知識底概要，使他們自己造成共產主義觀點的能力；應當把他們造成有教育的人。同時，只要人們在學校裏學習一日，那麼我們的學校就應當把他們造成爲從剝削者下而解放出來而鬪爭底參加者。

只有共產主義青年團把自己的學習、訓練與教育上底每一步驟跟參加一切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總的鬪爭聯繫起來的時候，它才能對共產主義青年團這個名稱當之而無愧了。因爲你們知道得十分清楚，只要俄羅斯一天還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國，而舊的資產階級制度在世界其餘的地方還一天存在着的時候，我們便要弱於它們，我們時時有遭受新的襲擊的威脅，只要我們學會精誠團結，那我們在以後的鬪爭中就會獲得勝利，日益強盛，而成爲真正不可戰敗的了。

所以，作一個共產主義者，那就是說，組織和團結一切青年，造成在這個鬪爭中的訓練與紀律底模範。那時，你們才能開始建造共產社會的大廈，而且能澈底完成。

爲了使大家更明白這一點起見，我願引一個實例。我們自稱爲做共產主義者。但是什麼是共產主義者呢？

『共產主義者』這是一個拉丁字。共產主義社會是

說：一切共有——土地、工廠、共同勞動，——這就是共產主義。

如果各人都經營一塊土地，那勞動能否共同的呢？共同勞動是不能一下子造成的，這是不可能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需要吃苦、耐勞、創造，這是在鬭爭過程中造成的。舊的書本在這兒沒有用處，——沒有人會相信書本的。這兒需要人們自己的生活的經驗。

當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從西伯利亞和南方進攻的時候，農民都是站在他們方面的。他們不喜歡布爾塞維主義，因為布爾塞維克是照一定價格來買糧食的。但是當農民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經歷過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政權以後，他們就認清了沒有選擇的餘地：或者跟着資本家走，那他立刻就把你交給地主去作奴隸；或者跟着工人走——不錯，工人並不會答應給一個仙境，在艱苦的鬭爭中他要求遵守鐵的紀律、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是他可以使你脫離資本家和地主的奴隸制度的。

當甚至無知的農民根據自己的經驗了解和認清了這點的時候，那時他們就成了自覺的經過嚴格學校的共產主義擁護者了。這樣的經驗，應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一切活動底基礎。

關於我們應當學什麼，從舊的學校，舊的科學中我們應當採取什麼這些問題，我已經答覆過了。現在我試來回答需要怎樣來學習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學校裏面活動底每一步驟，把訓練、教育與學習底每一步驟跟勞

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鬪爭不可分地聯繫起來。

我想從某些青年組織底工作經驗中再舉幾個例子 藉以證明，共產主義底這種訓練應當怎樣去進行。

人人都在說掃除文盲。你們知道，在一個文盲的國度裏，是不能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單是蘇維埃政權發出一個命令，或者黨提出一個特定的口號，或者指定若干優秀的工作人員去做這一工作，那都是不夠的。爲了這一點，需要青年自己担負起這個事業。

共產主義就在於，那加入青年團的男女青年們都能說：這是我們的事業，我們聯合起來，到鄉村裏去掃除文盲，使我們的青年沒有不識字的。我們要竭力使青年把他們的活動貢獻於這個事業。

你們知道，要很快地把俄國從一個愚昧的目不識丁的國度，變爲一個識字的國度，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團能担負起這個工作，如果全體青年能爲全體的利益而工作，那麼，有着四十萬男女團員的青年團，就可以把自己叫作共產主義青年團而無愧色了。青年團底另外一個任務，就在於在攝取某一知識時，要幫助那自己不能從文盲的黑暗中解放出來的青年。

作一個青年團員，意思就是說要這樣地來進行工作，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力量供獻於公共事業。共產主義的訓練也就在這裏。只有在這種工作中，一個青年男子或女子才能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只有在他們用這種工作能達到實際效果的場合之下，他們才會變成共產主義

者。

就拿近郊菜園裏的工作爲例子吧。難道這不是一種事業嗎？這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之一。人民在餓着肚子，作坊和工廠裏也都在鬧着飢荒。爲了使免除飢餓，應當發展菜園，可是農業還是照舊的方法經營的。

因此，要有更覺悟的份子去擔任這種工作，那時你們就會看到，菜園的數目就要增加起來，它們的面積就要擴大起來，成績也要改善起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積極的參加這個工作。青年團底每一單位和每個支部，都應該把這一工作當作自己的事情。

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是一個突擊隊，幫助一切工作，並表現自己的自動性與活躍性。青年團應該成爲這樣一個團體，即使每個工人都可以看到它裏面的份子，其學說他也許不懂，其學說他也許不會一下子就相信，可是根據他們的活的工作，根據他們的活動，他可以看到，這真正是可以給他們指出正確道路的人們。

如果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各方面不能這樣來佈置自己的工作，那麼這是說它陷於舊的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了。

我們的訓練務須跟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底鬪爭聯合起來，以便幫助前者去解決那從共產主義學說中所產生的任務。

青年團底團員，應該把自己每一個空閑的鐘點，用於改進菜園，或用於在某個作坊或工廠裏組織青年的學習等等。

我們要把俄羅斯從一個貧困之國度，變成一個富裕的國度，需要共產主義青年團把自己的教育、訓導與培養，跟工人和農民底勞動聯繫起來，不要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學校裏面，不要僅僅只限於閱讀共產主義的書籍與小冊子。

只有跟工農一塊兒勞動，才可以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須要使人人都看到，凡加入青年團的都是有知識的，同時又都是能勞動的。當人人都能看明白，我們曾經怎樣從舊的學校中趕走了舊的強迫制度，而代以自覺的紀律，都能看明白，一切青年男女如何參加共產主義禮拜六勞動，都能看到，他們怎樣在利用每個近郊菜園以幫助人民的時候——人們就不像從前那樣來看勞動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就在於在鄉村或自己所住的弄堂裏從事幫助這種事情，如清潔事宜和分配食物。

這在資本主義的舊的社會裏面是怎樣做的呢？

人人都是單單爲他自己而工作，沒有一個人會留意到這裏有沒有老者和病人，或者是一切家庭工作都壓在婦女肩上，因此之故使婦女完全處在被壓抑和被奴役的狀態中，誰應當反對這呢？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它們應當說：我們要把這加以改變，我們要組織青年隊伍，這些隊伍將幫助清潔事宜或擔負食物的分配，有系統地按戶考察，這些隊伍將有組織地爲全社會的利益而行動，適當地分配力量，並且要表明勞動一定要成爲有組織的勞動。

現在大約五十歲左右的一代人，已經沒有希望看到共

產主義社會了。這一代人在此以前就要死去的。而現在十五歲的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他們自己將要來建設這一社會的。他們應當認清，他們一生的整個任務，就是要建設這個社會。

在舊的社會裏邊，勞動是由個別的家庭來進行的，除了壓迫人民大眾的地主和資本家以外，沒有人把它聯合起來的。我們應當把一切勞動——不管它是多麼污穢多麼艱苦的——組織成這樣，即每個工人和每個農民都這樣來看自己：就是偉大的自由勞動軍底一份子，自己能夠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建設自己的生活，自己能夠建立共產主義制度。

共產主義青年團從年青的時候起，從十二歲起，就應當以自覺的和紀律化的勞動來訓練羣衆。

只有這樣辦理，我們才能夠期望，把現在所提出的那些任務加以解決。

我們應當估計到，要使全國電氣化，使我們貧窮的土地能夠利用最新的技術成就，至少還需十年的工夫。因此，現在十五歲左右及一二十年後將生活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代人，應當這樣的來佈置自己的學習任務，即在每個鄉村，每個城市裏，一個青年每天都應當在實踐上來解決共同勞動底某一個任務，不論這一任務是如何的細小，如何的簡單。

隨着上述工作在每個鄉村裏的進行，隨着共產主義競賽的發展，隨着青年們證明他們能夠把自己勞動聯合起

來，共產主義建設底勝利才會有保證的。

只有從這一建設勝利底觀點上，去審查自己的每一步驟，只有問自己我們是否已經盡了最大力量使自己成爲團結的自覺的勞動者，只有在這個長期過程中間，共產主義青年團才能够做到，把自己的五十萬團員結合起來成爲一支勞動軍，而喚起普遍的尊敬。

## 論無產階級的文化

從十月八日的『消息報』上可以看出，盧那察爾斯基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和昨天我們跟他所商定的，正好相反。

須要十二分迅速地（爲這次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大會）準備一個決議案草案，經中央委員會通過，並將它從速交付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大會的這一次會議。這個決議案，須在今天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交教育人民委員部參事會及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大會，因爲這個大會在今天就要閉幕了。

### 決議案草案

（一）在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裏面，教育事情底全部佈置，不論是在一般的政治教育領域方面，或是特殊地在藝術領域方面，都必須灌注以無產階級爲順利地實現它專政的目的，換言之，爲推翻資產階級，爲消滅階級，以及爲剷除人對人的一切剝削所進行的階級鬭爭的精神。



(二) 因此，無產階級，不論以其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面目出現，或以各式各種的一般無產階級組織的面目出現，都必須積極地參加國民教育工作，並在其中起領導的作用。

(三) 近代史底全部經驗，特別是自『共產黨宣言』出世後，世界一切國度無產階級底半個世紀以上的革命鬭爭，都曾經無可爭辯地證明了，惟有馬克思主義底世界觀乃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利益、觀點、與文化之正確的表現。

(四) 馬克思主義由於以下這個事實，爲自己爭得了作爲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之全世界歷史的意義，這個事實就是：它——馬克思主義並不把資產階級時代底最珍貴的獲得物完全拋棄，相反地，而是把人類思想及文化底兩千年以上的發展中的有價值的一切東西，加以攝取與改造。唯有在這種基礎以及在這個方向上的更進一步的工作——這種工作被當作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底最後鬭爭的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踐）經驗所鼓舞——，才能够被認爲是真正無產階級文化底發展。

(五) 全俄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大會，堅持這一原則的觀點，堅決地反對想發明自己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將自己封鎖在自己的孤立的組織以內、將教育人民委員部及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工作領域分別開來，或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內部再設立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自治』等事，在理論上錯誤而在實踐上有害的一切企圖。相反地，代表大會特

以以下的絕對的義務，加在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底一切組織底身上，這就是說，它們應把它們自己完全看成為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系統中之輔助機關，須在蘇維埃政權（特別是教育人民委員部）以及俄國共產黨底總的領導之下，當作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底一部份，來實現自己的任務。

× × ×

盧那察爾斯基同志說，人們把他的意思曲解了。然而這一點，却使得這個決議案益加顯得迫切地需要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八日

## 日 記 的 一 頁

以一九二〇年的戶口調查為根據，日前發表的俄國人口識字普及程度報告書（『俄國識字普及程度』，中央統計局，國民教育處，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出版），乃是一種很重要的出版物。

茲從該報告書中摘引一八九七年及一九二〇年俄國人口中識字普及程度一表於下：

	每千男性 中識字者		每千女性 中識字者		每千兩性 中識字者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歐 俄	326	422	136	225	229	330
2、北高加索	241	357	56	215	150	281
3、西伯利亞	170	307	46	134	108	218
（西 部）	——	——	——	——	——	——
總 計	318	409	131	244	223	319

當我們談論到無產階級文化以及它對於資產階級文化的關係時，事實却以一些數目字呈諸我們的眼前，這些數

目字表明，甚至就資產階級的文化而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形也還是差得很遠的。結果判明——正如我們所期待的一樣——，在普遍的識字教育上，我們依然是非常落後的，甚至我們的進步，和沙皇時代（一八九七年）比較起來，也是非常緩慢的。這對於那般過去及現在遨遊於『無產階級文化』仙境裏的人們，乃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和指責；這表明：爲了要達到西歐一個平常的文明國家底水平，還有何等迫切的草創工作正在等待我們去作啊。其次它並表明：爲了在我們的無產階級獲得物底基礎上面達到某種真正的文化水平，現在還有多少巨大的工作，需待我們去作啊。

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己限制在這個無可爭辯但却十分理論的命題上面。在最近訂正我們的每季預算時，我們必須很實際地來處理這件事情。當然，首先應當加以裁減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底經費，而是其他各官廳底經費，以便將節餘下來的款項，撥充教育人民委員部底需要。對於今年增加發給學校教師的麵包額一事，切勿吝惜，因爲本年我們對他們的供應，總還算不錯。

一般地說來，目前在國民教育領域內所進行的工作，還不能說是太狹窄的。在提拔老的教師，吸收他們來參與新的任務，使他們對於教育學底新的提法發生興趣，並使他們對於像宗教問題這一類的問題發生興趣等方面，已經作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們還沒有作主要的工作。我們對於將國民教

師提高到應有的水準一點，我們並沒有加以關心，或關心的十分不夠，沒有這一水準，不論任何文化：無產階級的文化也好，或者甚至資產階級的文化也好，都是談不到的。我們必須牢記着那種缺乏文化的半亞細亞式的狀態，我們至今還不曾跳出這種落後的狀態，而且如果沒有認真的努力，也是不可能跳出的，雖然我們具有着跳出這種狀態的可能，——因為：不論那個地方的人民大眾，都沒有像在我國這樣關心於真正的文化，沒有一個地方，這一文化底諸問題，像在我國提出得這樣深入、澈底和堅實；不論在任何地方，不論在那一國度中，國家政權都不是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而大體上說來，工人階級是能夠充分地認識自己的缺點的——我不是指文化而言，而是指識字普及程度而言的；不論在任何地方，工人階級都沒有像在我們國度裏這樣爲了改善自己的地位而甘願犧牲的，而且實際上已在從事於這樣大的犧牲的。

我們對於將我們的全部國家預算，轉向於首先去滿足初等國民教育底需要的方面一點，作的還太少，而且少得無比了。甚至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內，我們往往也可以看到，某一國家出版局底過分膨脹的職員，都對這個事實絲毫不關心，即：國家首先應當關注的事情，並不是要有出版局，而是要使得人們能夠讀書，要使得有更多的能夠讀書的去讀書，要使未來的俄國底出版事業有着更廣大的政治的規模。我們至今還遵循着那種舊的（惡劣的）習慣，對於技術問題像出版事業問題之類，反比對於國民識字普

及程度底一般政治問題，花費了更多的時間。

比如以職業教育總局爲例，我担保，在這裏可以找出許多許多多餘的人，他們爲本機關利益所脹大，而是不適應於廣大的、國民教育底需要的。在職業教育總局裏面，並非是人人都有着合法的願望——開始提高我們的工廠青年底教育，並給以實際的、具體的方向——來證明其正當的。如果將職業教育總局底全體職員仔細地考察一下，那麼我們就可以發見，從這種觀點看來，其中有好多好多乃是過於膨大和虛設的，是應加以裁減的。在工農國家裏邊，其實，有好多好多還可以節省下來，而且應當節省下來，用以發展國民的識字事業，其辦法就是把所有以下這些機關加以封閉——這些機關，它們或者是半貴族式的玩具，或者是在統計數字所顯示出的那種人民識字普及程度的狀態之下無它尙可而且將來長久無它亦可、並且應當無它則可的機關。

我們把國民教師應當提高到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面所從沒有而且也決不會有的水平之上。這是一個不需加以證明的真理。我們應當用提高教員精神或政治水平、對他們加以全面的訓練、使他們爲他們的真正崇高的職業而奮鬥、尤其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是提高他們的物質地位——這種有系統的、切實的、堅持的方法，來力求達到這個目的。

要有系統地加強組織小學教師的工作，以便使他們從資產階級制度底堡壘——迄今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中，

毫無例外地，他們都是資產階級制度底堡壘——成爲蘇維埃制度底堡壘，以便經過他們的媒介，來爭取農民，使農民脫離與資產階級的聯盟，並吸引他們與無產階級結成聯盟。

簡略地說：有系統的下鄉工作，在這一點上應起一種特別的作用；這種下鄉工作，我們已經作過了，然而還只是偶然的，對此，我們還應當有計劃地加以擴展。對於像這種下鄉工作的這些辦法，不要吝惜金錢；我們往往無益地把錢浪費在差不多完全屬於舊的歷史時代的國家機關上面去了。

我曾經搜集了些材料，準備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於城市工人對於鄉村居民的指導問題，作一次演說。這些材料的一部份，是由柯多洛夫斯基同志供給我的，既然我本人未來得及研究這個題目，而經過蘇維埃代表大會把它公開發表，那麼現在我就要求同志們來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和研究吧。

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城市對鄉村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整個的革命，有着決定的意義。資產階級的國家有系統地用盡一切力量來麻醉城市工人，並且利用由國家、沙皇的以及資產階級的政黨財力所出版的一切刊物，以期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則可以而且應當使用我們的權力，真正地使城市工人成爲將共產主義的觀念輸送到農村無產階級中去的嚮導者。

我雖說了『共產主義的』一句話，但是我急於要作一

個保留，怕引起誤會，或者怕會太被從字面的意義上去了解它。不論如何，都絕不應當把這一點了解成這樣：彷彿我們必須立即把純粹的、和狹義的共產主義的觀念傳播到鄉村裏去。只要我們的鄉村裏面一天沒有共產主義底物質基礎，那麼這種作法，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這對共產主義乃是一種致命傷。

不是的。應先從建立城市與鄉村間的來往開始，不要存着一種把共產主義傳播到鄉村裏去的預定的目的。這樣一種目的，在目前是不能够達到的。這樣一種目的，是不合時宜的。這樣一種目的的提出，對於事業，非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

但是，建立城市工人與鄉村勞動者之間的來往，在他們二者之間建立一種他們之間易於創造起來的同志關係底形式，乃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這也是現在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之一。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組成許多種工廠工人的組織（黨的、職工會的以及私人的），這些組織，可以有系統地去幫助鄉村文化底發展。

將所有的城市支部同所有的鄉村支部『結合』起來，以便『結合』於某一鄉村支部的每一個工人支部，可以有系統地留心一切機會，去滿足與它相結合的那個支部底各種文化上的需要，——這種做法是否可能呢？或者可以找到其它的聯繫形式？這裏我只限於提出這個問題，以便引起同志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以便指出西部西伯利亞之已有的可資利用的經驗（這一經驗是柯多洛夫斯基同志告



訴我的)，以便將這個偉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問題，在其全面性上提出來。

除了我們官方的預算之外，或除了我們官方的關係之外，我們對於鄉村幾乎任何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是的，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在我們是，它們自身就具有着，而且必不可免地具有着一種不同的性質。在資本主義之下，城市給予鄉村的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身體上、以及其它等等方面都使它敗壞了。而我們的城市，則自動地開始給予農村以完全相反的東西。但是所有這些，都是自動地、自發地作的：所有這一切，要是在這一工作中能灌輸以意識、計劃性和系統性，那更可以大大地加強的（到後來，就可以增加到一百倍）。

只有我們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的時候，只有我們成立各式各種的工人團體——要用盡一切力量和方法去防止這些團體底官僚主義化——來處理這個問題，對它加以討論，並把它轉化為事業的時候，我們才能够開始有所進步（並且能够以百倍的速度前進）。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

## 中央委員會給教育人民委員部 內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指示

(一) 黨無條件地站在黨綱關於工藝教育所規定的立場(見黨綱中論及國民教育部份的第一及第八兩條)之上，應將一般教育及工藝教育的學齡自十七歲減至十五歲這件事情，完全視作一種實際的暫時的措置，這種實際的必要，是由協約國強加於我國的戰爭所招致之國家的貧困與破毀所引起的。

對於十五歲以上的人，實行職業教育與『一般工藝教育』的『聯繫』(見俄國共產黨黨綱中前已指出的部份之第八條)這一點，在任何地方，只要具有實現它的最小的機會存在時，都須絕對遵行。

(二) 教育人民委員部底基本缺點，是在於實事求是精神與實踐性之缺乏，對於實際經驗審核與檢查之不足，在運用這種經驗教訓上系統性之缺乏，以及一般議論與抽象口號之盛行。教育人民委員長及教育人民委員部參事會，其主要的注意力應當集中於和這些缺點進行鬭爭。

(三) 吸收專門家——，亦即吸收具有理論修養與經過長時期的實際訓練的教育家及在職業技術教育（農業教育亦包括在內）方面具有此種訓練與修養的人們，來參與中央機關的工作，這一點，一般地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內，特別是在職業教育總局內，還組織得不當。

務須立即進行對於這些工作人員的登記，研究他們的服務期限、檢查他們工作的成績，並且有系統地吸收他們來參加在地方工作中、特別是在中央工作中的負責的職務。如果不採納這些專門家底意見，如果沒有取得這些專門家的經常的合作，那任何一個重大的辦法，都不應執行的。

不用說，吸收專門家來參加工作這件事情，應在以下這兩個必須有的條件之下來進行的，即：第一，非共產黨員的專門家，須在共產黨員監督之下去工作；第二，教材內容，其有關於一般教育科目者，特別是關於哲學、社會科學、以及共產主義修養者，應僅由共產黨員來決定。

(四) 教育人民委員長及教育人民委員部參事會，應擬就並認可基本型的學校以及訓練班、講演、閱讀、討論和實用科目應用的各綱領。

(五) 單一勞動學校部，特別是職業教育總局，對於更加廣泛和有系統地吸收一切適宜的技術的與農業的力量來參加職業技術及工藝教育一事，須加以更大的注意，並跟利用每一設備比較完善的工業企業與農業企業（國營農場、農業試驗站、組織完善的農莊等等、電力站，等等）

一事聯繫起來。

爲工藝教育而利用經濟機關或企業的形式與程序，須會同各該有關的經濟機關共同決定之，以免妨礙到生產底正常進行。

(六) 必須製定具體的、很扼要的、但明白而確切的報告形式，以便能夠估計與检查工作底範圍和成績。在這一關係上，教育人民委員部內工作的佈置，是極端令人不能滿意的。

(七) 對於學校內的以及學校以外的圖書館與閱覽室、報紙、小冊子、雜誌以及書籍的分配一事，也是令人極不能滿意的。其結果是，僅有一小部份蘇維埃公務員能夠得到報紙和書籍，而工人和農民所得到的，則是非常之少。這件事情，必須從基本上加以改組。

一九二一年二月

## 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同志們！我非常快樂地慶祝這次的女工代表會議。我不打算講到那些關於麵包和我們軍事形勢的問題了，自然，這些問題在目前是使勞苦大眾當中每個女工和每個覺悟的人都最受激動的。因為我從報紙上關於你們大會的報告中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兒，在軍事方面，已由托洛茨基同志詳盡地講過了，在麵包方面，已由雅可夫里失與史維德爾斯基同志詳盡地講到了，所以讓我不要提到這些問題了。

我只想關於蘇維埃共和國內女工運動底一般任務，即與一般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有聯系以及在目前特別迫切地提到第一位的那些任務，稍微講幾句。同志們，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一開始時就被蘇維埃政權提出來了。我以為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國家底任務將有兩種。這一任務底第一部份，是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它是和把婦女置在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舊法律相關連着的。

很久很久以前，西歐一切解放運動底代表者，不僅在幾十年間，而且在幾個世紀裏面就曾經提出了取消這些陳舊法律、而在法律上使婦女與男性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民主國家，沒有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能夠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凡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地方，凡保存着土地私有制、保存着工廠作坊私有制的地方，凡保存着資本政權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權的。在俄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只是因為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起，在這裏建立了工人政權。蘇維埃政權從最開頭起，就以當作敵視任何剝削的勞動者政權而存在一事為自己的任務的。它是以消滅勞動者受資本家地主剝削的可能性、消滅資本底統治為自己的任務的。蘇維埃政權所力謀達到的，就在於使勞動者去建設自己的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工廠作坊私有制，一句話，沒有這樣一種私有制的生活，這種私有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完全的政治自由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邊，在實際上曾把勞動者置於貧困與僱傭奴隸制底地位，而將婦女置於雙重奴隸制底地位。

蘇維埃政權乃是勞動者底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數月，在關於婦女的立法上，就進行了最果決的改革。將婦女置於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特別利用婦女的較弱的地位而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甚至往往置於屈辱地位的法律，亦即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關於婦女要求兒女贍養費

權利的法律等。

正是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立法，可以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裏邊，也利用婦女底比較弱小的地位，將她們置於不平等乃至屈辱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則澈底消滅了舊的、不公平的、對於勞苦羣衆代表者不堪忍受的法律，未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跡。現在我們可以十分驕傲而絲毫不誇張地說，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以外，那實行婦女完全平等、將婦女不置於屈辱地位——這在日常的、家庭的生活中特別感覺得到——的國家，在世界上找不出一個來。這是我們頭等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如果你們有機會同那些仇視布爾塞維克的政黨接觸一下，或者如果你們把高爾察克或鄧尼金所佔領的區域內所出版的俄文報紙看一下，或者同贊成這些報紙觀點的人談一談，那麼你往往就會聽到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誣蔑——說它破壞了民主。

人們經常指責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代表者，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底擁護者，說我們破壞了民主，他們提出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一事，作為這一誣蔑底證據。我們平常對這些指責答覆如下：在土地私有制存在之下，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凡擁有資本的是主人，而其餘的人，都是他的勞動者，都是他的僱傭奴隸，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民主和立憲會議，對於我們是毫無價值的。這樣的民主，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是掩蔽奴隸制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只有在民主可以改善勞動者與

被剝削者地位的範圍以內，才是民主底擁護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是以反對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爲自己的任務的。凡給被剝削者、給被置於不平等地位的人們服務的那種民主，才對我們有着真實的意義。假使不勞動者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不勞動者是不應當吃飯的。我們在答覆這些指責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就是在某個國家裏民主是如何實現的？我們在一切民主共和國裏看到，名義上是宣佈了平等，但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地位的法律上——就婦女在家庭裏她所處地位，就離婚上的意義說——我們處處都看到了婦女底不平等與屈辱，我們說，在對被壓迫者的關係上這正是破壞了民主。蘇維埃政權比其餘一切最先進的國家，都更澈底，它實行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婦女不平等底痕跡了。我再重複說一句：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民主的立法，對婦女曾做到像蘇維埃政權在其存在底最初數月中所做底一半。

當然，僅僅一個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並不以我們在立法領域以內所說的爲滿足，但是在使婦女地位與男子平等上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我們却都已經做到了，我們是可以以此自傲的。現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底地位是這樣的，就是從最先進國家的觀點看來，它是最理想的了。不過我們對自己說：自然，這還不過是開步走罷了。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和與男性底真正平等，則需



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

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指在勞動底生產率上、在勞動底份量上、在工作日底長短上、在勞動底條件上，……使婦女與男子平等起來等等而言，而是指婦女不受與男性不同的經濟地位之壓迫而言。你們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之下，婦女底這種事實上的被壓抑情形依舊是存在着的，因為一切家務都是放在她們身上的。婦女所操作的這種家務，大抵都是最不生產、最粗野、最艱苦的。這是一種瑣碎細小、本身不包含有任何可以促進婦女發展的東西的勞動。

我們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是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這裏對於婦女便開闢了一個很大的工作場所。我們現在正在鄭重地做着為社會主義建設清洗地盤的準備工作；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本身，只有在我們做到婦女底完全平等，而與解除了這種瑣碎的、愚鈍的、不生產的工作的婦女一道擔負起新工作的那個時候，才會開始的。這一工作要使我们花費好多好多年的光陰。這一工作是不能給與這樣迅速的結果，也不會產生這樣光輝的效果的。

我們正在創辦模範機關、食堂、托兒所，這些機關可使婦女從家務之下解放出來的。正是婦女應比任何人都多擔負起建設所有這些機關的工作。應當說，現在在俄國能夠幫助婦女脫離這種家庭奴婢狀態的這樣的機關還是很少的。

它們只有微少的數量，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軍事的與食物的條件——關於這些，別的同志在這裏已經給你們詳細說過了——是在阻礙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然而，仍應當說，這些可把婦女從家庭奴婢地位拯救出來的機關，到處都發生了，只要這些地方稍有一點點可能的話。我們說，工人底解放應當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同樣，我們應當說，女工底解放也應當由女工自己來進行的。女工自己應關心這些機關底發展，婦女底這一活動，可以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舊地位發生完全的轉變。

要從事政治，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需要特殊的準備，因為婦女底參與政治，甚至在最前進和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政治成爲每個勞動婦女所可達到的事情。自從土地與工廠底私有制被消滅及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被推翻的時候起，政治底任務，對於勞苦大眾與勞動婦女，便成爲簡單、明瞭、及人人可以達到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曾被置於這樣的無權無利的地位，就是使得她們底參加政治，同男性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了。爲了使這種地位轉變過來，則需要勞動者底政權，——那個時候，政治底主要任務將構成與勞動者本身命運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了。

這時，不僅黨的與覺悟的女工，就是非黨的與最不覺悟的女工，其參加政治都是必要的了。這時，蘇維埃政權便對於女工開關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我們反對敵視蘇維埃俄羅斯的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大舉進攻它——底鬪爭，是很艱苦的。在軍事方面我們與以戰爭來反對勞動者政權的那些力量底鬪爭，在糧食方面反對投機商底鬪爭，都是很艱苦的，因為誠心誠意地以自己的勞動來幫助我們的人們之數目——勞動者數目，還是不夠大的。在這兒，蘇維埃政權對於廣大的非黨的女工羣衆底幫助，最爲重視。她們應當曉得，在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要參加政治活動，則非有複雜的準備不可，而這正是婦女所不能做到的。但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政治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同地主、資本家作鬪爭，爲消滅剝削而鬪爭，因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給婦女開闢了政治活動的場所，這個活動就在於婦女以其組織的智慧來幫助男性。

我們不僅需要包括數百萬人的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我們也需要極小規模的使婦女也有工作可能的組織工作。婦女在軍事條件之下亦可工作。那時她們可以幫助軍隊、在軍隊中間作鼓動工作。婦女應當積極參加所有這些工作，爲的使紅軍可以看到，對於他們是在關心着，是在照料着。婦女在糧食方面也可以工作，——如分配生產品、改善羣衆食物、發展那種現在在彼得格勒廣泛在創辦的公共食堂。

女工底活動，在那一方面可以獲得真正的組織意義，便如上述。在創立大規模的試驗企業和對這些企業的監督上，婦女底參加也是必要的，因為這種事業在我們並不是單個的事業而已。如果沒有大量勞動婦女底參加此項事

業，那它便不會完成的了。而且，就監督生產品底分配以及監督生產品底易於供給兩點說來，女工擔負此項工作也是很適宜的。這一任務，對於非黨的女工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同時這個任務底實現首先將會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的。

自廢止土地私有制及幾乎完全廢止工廠作坊底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便力謀使所有勞動者——不僅黨的，而且非黨的，不僅男性，而且婦女，都要積極參加這種經濟建設。這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工作，只有在全俄國，不是數百個婦女，而是千百萬婦女參加這一工作的時候，才能够向前推進的。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牢不可破了。那個時候，勞動者會證明，他們沒有地主與資本家，也是能够生活，能够管理的。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鞏固如金湯，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任何別國底外部敵人和俄國內部的敵人，都不害怕了。

## 國際勞動婦女節

布爾塞維主義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中，主要而基本的便是把那些在資本主義下最受壓迫的人們，吸引到政治中來一事。不論在君主政體之下也罷，或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罷，都是資本家壓迫他們、欺騙他們、掠奪他們的。只要土地、工廠、工場底私有制存在一天，這種壓迫，這種欺騙，這種資本家對人民勞動底掠奪，就一天都不可避免的。

布爾塞維主義底實質，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揭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底奸詐與虛偽，在於廢除土地、工廠與工場底私有制，在於將全部國家政權集中在勞動者與被壓迫羣衆底手中。這些勞動羣衆，他們自己把政治即建設新社會的事業，取到他們自己的手中。這是一樁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勞苦羣衆曾爲資本主義所壓迫和蹂躪，但是打破僱傭奴隸制，打破資本家底奴隸制底別的出路，却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要吸引勞苦羣衆參加政治，如果不吸引婦女參加政

治，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佔人類半數的女性，是受着雙重地壓迫的。工人婦女和農民婦女受着資本的壓迫；但是更甚於此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第一，她們仍是處在毫無權利的地位，因為法律不給她們以與男子平等之權；第二，這是最主要的，婦女是處在『家庭的奴隸制』中，她們是家庭的奴婢，她們被那些最瑣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單個的家務所壓碎。

布爾塞維克的、蘇維埃的革命，曾深深地剷除了婦女底被壓迫和不平等底根源，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次革命都沒有敢這樣摧毀過這種根源。在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的痕跡，這一點兒都沒有遺留下了。那在婚姻與家庭權利上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特別虛偽的不平等，那在對小孩關係上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所澈底消滅了。

這只是婦女解放底第一步罷了。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使是最民主的也罷，曾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他們之所以不敢作，是因為顧慮到『神聖的私有財產權』。

第二個步驟，同時也是主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土地、工廠與工場私有制底廢除。這一點，而且惟有這一點，才能給完全而真正的婦女解放，——由瑣碎的、單個的家庭經濟，轉變為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開闢一條道路。

這一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在這兒事情是在於改造那最根深蒂固，而已經成了習慣和已經硬化了的『制度』（更真切地來說，那是『醜惡和野蠻』而非『制度』）。但是這一轉變已經開始了。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路程了。

在國際勞動婦女節日，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裏，在無數的勞動婦女的集會上，她們將都要向蘇維埃俄羅斯致送敬意的，因為蘇維埃俄羅斯已經開始了空前艱難與艱苦的，但却偉大的、全世界性地偉大的和真正解放的事業。她們並將發出雄壯的號召，教人們不要在狂暴的、而且往往殘酷的資產階級反動底面前喪失鬪志。資產階級國家，越是『自由』或『民主』，則反對工人革命的資本家匪幫越發狂暴和殘酷；民主共和國的北美合衆國，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工人大衆已經覺醒了。帝國主義大戰已經最後喚醒了美洲、歐洲、以及落後的亞洲底睡着的、半睡覺的、死氣沉沉的大衆。

全世界各地的冰凍都已經被打破了。

各民族從帝國主義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事業，男女工人從資本底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正在不可阻止地向前發展着。這種事業已經在領導千百萬和成萬萬的工人和女工、農民和農婦在向前邁進着。因之，這一勞動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在全世界上一定要獲得勝利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

## 論我們報紙底性質

對於舊题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多了。對新生活底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關於像資產階級的僕從——孟塞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英日爲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衆皆週知的、明瞭的、爲羣衆所大抵知曉的現象，爲什麼不說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二百行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的每一件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以『電訊方式』，印下舊的、衆已週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並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私人經濟中的

---

★ 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

——俄文版編者



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是應當根本丟掉這種習慣的。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的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如像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它應有的變化那樣。

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歸結成了兩個營壘：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區區少數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孟塞維克等為止）底鬪爭。再重複說一句，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當講的很短很短。

多談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考察、知識份子計劃及其它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縝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底真正建設底各種事實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份子的諾言（『調整』、『擬就計劃』、『運用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庸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吹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是怎樣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收歸國有之後，落後的工廠會成了分崩離析、藏污納垢、流氓行爲、及懶惰成性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應上『黑牌』，但是這種『黑牌』是在那兒呢？它還是沒有的。但是這樣的工廠却是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

義傳統底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沉默、容忍這樣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便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鬭爭。請回想一下吧，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地在報紙上獵獲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鬭爭，不在於保護工人階級底利益，以防備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些工作並做的壞些，而從『它』多拿些錢——的區區少數工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夫斯基與普極洛甫斯基工廠底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蟲是很少嗎？我們獵獲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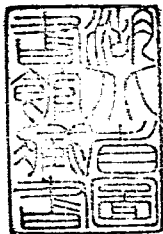
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樣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的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懶漢底反抗，將被鐵拳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查辦過懦怯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獵獲』過？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革命的戰爭。我們還很少用生活各方面底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

衆——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底主要任務。我們還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最需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最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揚，多多加以社會的批評，最需要痛責無用份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份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檢查這種新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 列寧選集(17)

---

1949. 9. 初版 長. 1—5 000

基本定價：—660元

---

列寧選集 (17)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

---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

1949. 9. 初版 長 1—5,000

